

獨白下的傳統



李敖 著

獨白下的傳統 ■

獨白下的傳統



李敖 著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責任編輯 蔡嘉蘋

封面設計 彭若東

書 名 獨白下的傳統

著 者 李 敖

出版發行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域多利皇后街九號

JOINT PUBLISHING (H.K.) CO., LTD.

9 Queen Victoria Street, Hong Kong

印 刷 陽光印刷製本廠

香港柴灣安業街三號七樓

版 次 2000年11月香港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規 格 特16開（150×210mm）192面

國際書號 ISBN 962·04·1891·3

© 2000 Joint Publishing (H.K.) Co., Ltd.

Published & Printed in Hong Kong



李敖

五十年來和五百年內，
中國人寫白話文的前三
名是李敖，李敖，李敖，
嘴巴上罵我吹牛的人，
心裡都爲我供了牌位。

——李敖

總序

作品精選集，古人本來是沒有的，此即明代唐顯悅所說“文古無選，自昭明（昭明文選）始，而後世因有選體。”“選體”看來簡單，其實有時選文比寫作還難。唐顯悅認為“選之難，倍於作”。認為比寫作難上一倍，這話別人不懂，李敖最懂了。因為李敖是五十年來五百年內中國人寫白話文的前三名包辦者，不但白話文寫得出神入化，在內容上也一應俱全。舉凡思想、歷史、自傳、人物、小說、雜文、隨筆、評論、札記、語錄、書信、談話、演說、乃至詩歌等等等等，都自成一家，並且是大家。六百零九年的唐宋兩代才不過出了八大家，但是六十歲不足五十九歲有餘的李敖卻以一當八，早已超邁古人今人。正因李敖的白話文如此篇篇精彩，所以要再精選，自然就“選之難，倍於作”了。桂冠老闆賴阿勝老弟佯裝不明此理，硬要李敖以作品精選集問世，屈從之下，累死我也！

一九九四年十月十三日

目錄

快看《獨白下的傳統》…………… (1)

第一輯

一 直筆——“亂臣賊子懼”…………… (3)

二 避諱——“非常不敢說”…………… (12)

三 諫諍——“寧鳴而死，不默而生！”…………… (20)

四 傳令——全國大跑馬…………… (29)

五 新聞——報紙像雜誌…………… (37)

六 徵兆——來頭可不小…………… (46)

七 吃人——動物吃人，人也吃人…………… (54)

八 喝酒——喝也不行，不喝也不行…………… (63)

九 音樂——華夷交響樂…………… (72)

一〇 家族——人越多越好…………… (81)

一一 女性——牌坊要大，金蓮要小…………… (90)

第二輯

一二 光緒朝對節婦貞女的旌表…………… (101)

一三 從高玉樹爲兒子“冥婚”看中國
兩面文化…………… (107)

一四 歡喜佛…………… (112)

一五 中國民族“性”…………… (118)

一六 人能感動蝙蝠論…………… (129)

一七 人能感動老虎論…………… (134)

一八 鼓聲鑿鑿的中國之音…………… (138)

一九 一種失傳了的言論道具…………… (151)

二〇 記一個不合作主義者…………… (156)

快看《獨白下的傳統》

寫這本書的目的，是幫助中國人了解中國，幫助非中國人——洋鬼子、東洋鬼子、假洋鬼子——別再誤解中國。

中國人不了解中國。爲什麼？中國太難了解了。中國是一個龐然大物，在世界古國中，它是唯一香火不斷的金身。巴比倫古國、埃及古國，早就亡於波斯；印度古國，早就亡於回回。只有中國壽比南山，沒有間斷。沒有間斷，就有累積。有累積，就越累積越多，就越難了解。

從地下挖出的“北京人”起算，已遠在五十萬年以前；從地下挖出的“山頂洞人”起算，已遠在兩萬五千年以前；從地下挖出的彩陶文化起算，已遠在四千五百年以前；從地下挖出的黑陶文化起算，已遠在三千五百年以前。這時候，已經跟地下挖出的商朝文化接龍，史實開始明確；從紀元前八四一年（周朝共和元年）起，中國人有了每一年都查得出來的記錄；從紀元前七二二年（周平王四十九年）起，中國人有了每一月都查得出來的記錄。中國人有排排坐的文字歷史，已長達兩千八百多年。

在長達兩千一百多年的時候，一位殉道者文天祥，被帶到

抓殉道者的元朝博羅丞相面前，他告訴博羅：“自古有興有廢，帝王將相，挨殺的多了，請你早點殺我算了。”博羅說：“你說有興有廢，請問從盤古開天闢地到今天，有幾帝幾王？我弄不清楚，你給我說說看。”文天祥說：“一部十七史，從何處說起？”

三百多年過去了，十七史變成了二十一史，一位不同黑暗統治者合作的大思想家黃宗羲，回憶說：“我十九、二十歲的時候看二十一史，每天清早看一本，看了兩年。可是我很笨，常常一篇還沒看完，已經搞不清那些人名了。”

三百多年又過去了，二十一史變成了二十五史。書更多了，人更忙了，歷史更長了。一部二十五史，從何處說起？

何況，中國歷史又不只二十五史。二十五史只是史部書中的正史。正史以外，還有其他十四類歷史書。最有名的《資治通鑑》，就是一個例子。司馬光寫《資治通鑑》，參考正史以外，參考了三百二十二種其他的歷史書，寫成二百九十四卷，前後花了十九年。大功告成以後，他回憶，只有他一個朋友王勝之看了一遍，別的人看了一頁，就愛睏了。

一部中國史，從何處說起？

何況，中國書又不只歷史書，歷史書只是經史子集四庫分類中的一部份，清朝的史學家主張“六經皆史”，這下子經書又變成了歷史書。其實凡書皆史才對，中國人面對的，已不是歷史書的問題，而是古書的問題。

古書有多少呢？

古書多得嚇人。

古書不只什麼《古文觀止》《唐詩三百首》，它們只不過佔

兩種；古書不只什麼四書五經，它們只不過佔九種；古書不只什麼二十五史，它們只不過佔二十五種。古書遠超過這些，超過十倍一百倍一千倍，也超過兩千倍，而是三千倍，古書有——十萬種！

嚇人吧？

這還是客氣的。本來有二十五萬種呢！幸虧歷代戰亂，把五分之三的古書給弄丟了，不然的話，更給中國人好看！

又何況，還不止於古書呢！還有古物和古蹟，有書本以外的大量殘碑斷簡、大量手澤宗卷、大量玉器石鼓、大量故壘孤墳，和陸續不斷的大量考古出土。……要了解中國，更難上加難了。

又何況，一個人想一輩子獻身從事這種“白首窮經”的工作，也不見得有好成績。多少學究花一輩子時間去在古書裡打滾，寫出來的，不過是“斷爛朝報”；了解的，不過是“瞎子摸象”。中國太難了解了。

古人實在不能了解中國，因為他們缺乏方法訓練，笨頭笨腦的。明末清初第一流的大學者顧炎武，他翻破了古書，找了一百六十二條證據來證明“服”字古音唸“逼”，但他空忙了一場，他始終沒弄清“逼”字到底怎麼唸，也不知道問問吃狗肉的老廣怎麼唸。顧炎武如此誤入歧途，勞而無功，而他卻還算是第一流的經世致用的知識份子！又如清朝第一流的大學者俞正燮，他研究了中國文化好多年，竟下結論中國人肺有六葉，洋鬼子四葉；中國人心有七竅，洋鬼子四竅；中國人肝在心左邊，洋鬼子肝在右邊；中國人睪丸有二個，洋鬼子睪丸有四個。……並且，中國人信天主教的，是他內臟數目不全的緣

故！俞正燮如此誤入歧途，勞而無功，而他卻還算是第一流的經世致用的知識份子！

二十世紀以後，中國第一流的知識份子，在了解中國方面，有沒有新的進度與境界呢？有。他們的方法比較講究了，頭腦比較新派了，他們從象鼻子、象腿、象尾巴開始朝上摸了。最後寫出來的成績如何呢？很糟。除了極少數的例外，他們只是一羣新學究。西學爲體，中學爲用。其實天知道他們通了多少西學，天知道他們看了多少中學。他們是羣居動物，很會壟斷學術，專賣學術，和拙劣宣傳他們定義下的學術。於是，在他們多年的烏煙瘴氣下，中國的真面目，還是土臉與灰頭。

中國這個龐然大物，還在霧裡。

做爲一個中國人，要想了解中國，簡直沒有合適的書看。古代的知識份子沒有留下合適的，現代的知識份子不能寫出合適的。中國人要想了解中國，只有標準本教科書，只有《薛仁貴征東》《薛丁山征西》《呼延慶征南》《羅通掃北》，只有大戲考中的《一捧雪》《二進宮》《三擊掌》《四進士》《五人義》《六月雪》《七擒孟獲》《八大槌》《九江口》《十老安劉》。……這太可悲了。

中國的真象不在這裡，中國的真象不是這樣的，中國的真象既沒有這樣簡單，也沒有這樣“春秋配”。

中國沒能被了解——全盤的了解。中國被誤解了。中國是龐然大物，中國被瞎子摸象。

就說被摸的象吧。中國人一直以爲象是“南越大獸”，以爲是南方泰國、緬甸、印度的產物。中國人喜歡這個和氣的大

傢伙，酒杯上用牠，叫“象尊”；御車上用牠，叫“象輦”；遊戲裡用牠，叫“象棋”；最有緣的，在文字裡用牠，代表了六書中的第一種——“象形”。象形就是根據象而畫出來的形，人一看到就知道是象，又大又好畫，大家都喜歡畫牠，越畫越像，所以這個“像”的字，就從這個動物演變出來。



現在我們寫“爲者常成”的“爲”字，古字中象形寫法見上圖：下邊的象形是手，上邊的象形是象，“爲”字的原始意思就是“用手牽象”。牽象幹什麼？打仗、做工，都是最起碼的。中國人在用牛用馬以前，早就用到了象。象不是外國貨，最早在黃河流域，就有這種龐然大物。後來，黃河流域氣溫變涼了，象開始南下，出國了。在古人寫古書的時候，已經看不到牠了。所以《韓非子》裡說：

“人希見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按其圖以想其生也。

故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謂之象也。”

當象再回國的時候，中國人不認識牠了，以爲牠是外國貨，把牠當成“南越大獸”了，象以珍禽異獸姿態出現，讓中國人瞎摸了。

中國人不了解中國。不了解中國有什麼。

中國人對中國無知，這是中國知識份子的失敗。中國人“希見生象”，又不能“得死象之骨，按其圖以想其生”，所以只是瞎摸、瞎摸。瞎摸到生象，還算是“摸象”；瞎摸到死象，就完全是“摸骨”了。中國人對中國的了解，實在還是龍海山人關西摸骨的水準，中國人真可憐！

問題出在中國知識份子。

中國知識份子是中国最可恥的一個階級。這個階級夾在統治者和老百姓之間，上下其手。他們之中不是沒有特立獨行的好貨，可是只佔千萬分之一，其他都是“小人儒”。庸德之行，庸言之謹，讀書不化，守舊而頑固。中國知識份子堅守他們在統治者和老百姓中間的夾層地位，誤盡蒼生。當特立獨行的王安石搞變法，想直接授惠於老百姓的時候，文彥博站出來向皇帝說話了，他說：“陛下是同士大夫治天下，不是同老百姓治天下。”王安石想越過這批攔路虎，可是他碰到了絆腳石。

中國知識份子失敗了。有兩大方面的失敗：一方面是品格上的，一方面是思想上的。思想上失敗的特色是：他們很混、很糊塗、很笨。他們以知識為專業，結果卻頭腦不清，文章不行。這種特色不但使他們品格諸善莫做，並且扶同為惡而不自知；在思想上也不能深入羣衆，影響普遍的中國人。他們寫的東西，只能自我陶醉，或者給互相捧場的同流貨色一起陶醉，實際上，實在不成東西。對絕大部份中國知識份子的作品，我看來看去，只是可憐的“小腳作品”。它們的集體悲劇，乃是在不論它們的呈現方式是什麼，它們所遭遇的共同命運，都是“被層層桎梏”的命運。不論它們的呈現方式是“散文”“駢文”“時文”“八股文”“語體文”，是“論辨”“序跋”“誌傳”

“奏議”“哀祭”“書牘”“詔令”“論文”，是“詩”“詞”“歌”“賦”“頌贊”“箴銘”“彈詞”“小說”，是“氣”“骨”“神”“勢”“實”“虛”“韻”“逸”“用典”“白描”，是“簡潔”“蔓衍”“談理”“抒情”“剛健”“優柔”“平樸”“絢麗”，或是“革新”“守舊”“創新”“追摹”“獨造”。……不論從那一路的進退衝守，都是“小腳如來”的“掌心行者”，都不能逃開共同被傳統“桎梏”“修理”的命運。在這共同命運之下，“文體”的爭論也好，“詩體”的爭論也罷，乃至什麼“雅”“俗”之分，“剛”“柔”之異，“古”“今”之別，“朝”“派”之變，“文”“白”之爭。……從如來掌心以外來看，它們所能表示的，至多只是被“修理”的輕重深淺而已。換句話說，它們統統都多少被傳統的水平觀念纏住，被傳統的社會背景纏住，被傳統的意識型態纏住，被傳統的粗糙膚淺纏住。……這樣的一纏再纏，中國的作品便一直在“裹腳布”中行走，不論十個腳趾如何伸縮動靜，都無助於它在一出世後就被扭折了骨頭。

這樣子的悲劇命運，使千年的龐大文字遺產，只表露了龐大的繁瑣與悲哀。中國千年的文字障中，沒有大氣魄的詩，沒有大氣魄的劇，沒有大氣魄的小說，也沒有大氣魄的作品。沒有好的表達法，沒有像樣的結構，沒有不貧乏的新境界，也沒有震撼世界的文藝思潮。表達的方式，至多只在一首小詩、一闋小詞、一段小令、一篇小品、一個小故事裡打滾，足以自豪的任何作品，在新世界的文學尺度下，都要打回票。中國知識份子的表達力，至多只是表達一點粗淺的浮情，憂國也好，非戰也好，田園也好，香奩也好，鐵板高唱也好，兒女私情也好。……除了在最低淺的層面上，吟咏低唱一陣或乘興揮毫一

筆外，便不能再深入，或因深入而淺出。中國知識份子是集體失敗的，集體鑄造了歷史的縱線失敗。我常常想：一部《儒林外史》的部份好題材，在任何二流三流的西方文人手裡，都不會有吳敬梓那樣糟糕的處理，那樣可怕的結構，而吳敬梓已算得上是我們中國文學史上的特級文豪。——中國搖筆桿的真失敗！

在這種縱線的失敗中，中國人了解中國，已經很難從知識份子的文字障中得到滿足，知識份子敗北之日，就是愚夫愚婦《羅通掃北》之時。當愚夫愚婦裝了滿腦袋的孟姜女、包龍圖、木蘭從軍、三娘教子、游龍戲鳳、九命奇冤的時候，他們對中國的了解，也就真夠瞧的了！

中國知識份子文章不行的背景是他們讀書不化，頭腦不清。在知識份子中很難找到明白人。偶爾也有清光一閃，留下一句，可是你剛要鼓掌，下面一句就冒出混話，立刻把你的興致掃光。

因為讀書不化頭腦不清，常常發現他們爭不該爭的，又不爭該爭的。以宋朝的一場鬧劇為例。八百年前，宋朝仁宗沒有兒子，絕了後。新皇帝宋英宗做了皇上。英宗是仁宗堂兄濮王的兒子，他接了仁宗的香火，對他親生爸爸該怎麼叫，竟引起天下大亂。首先，騎牆派知識份子王珪不敢發表意見，右派知識份子司馬光表示，根據傳統文化，該叫親生爸爸做伯父，原因是，英宗由宗法制度的老二一支，入繼老大一支，必須不叫親生爸爸做爸爸，而該叫法定爸爸即仁宗做爸爸。這種見解，左派知識份子歐陽修反對，他也根據傳統文化，認為沒有消滅父母之名的道理，所以，仁宗不是爸爸，而濮王（原來的爸

爸)才是爸爸。於是展開混戰，從皇帝媽媽以下，全部引用傳統文化，大打起來。嚴重到司馬光派的知識份子賈黯留下遺囑，要求皇上一定得叫原來的爸爸做伯父，不然他死不瞑目。另一個知識份子蔡伉，也向皇上大聲疾呼，聲淚俱下的表示，天下興亡，就在這一叫。後來司馬光派請求皇上殺歐陽修派，皇上不肯殺，並且違反了司馬光派的傳統文化，仍叫原來的爸爸做爸爸。司馬光派吵着，並且宣佈“理難並立”“家居待罪”。最後鬧得雙方都賭氣要求皇上貶自己，滿朝烏煙瘴氣。

第一流的知識份子不把精神用來解決小人、解救小民、解放小腳，卻用來爭所不該爭的，這是中國知識份子的混、糊塗、笨。

別以為上面舉的叫爸爸例子，只是一時一地的現象，才不呢！明朝世宗時候的“大禮議”，神宗時候的“挺擊案”，光宗時候的“紅丸案”，熹宗時候的“移宮案”，以至漢學宋學之爭，今文古文之爭，孔廟配享之爭，保教尊孔之爭。……沒有一件不是錯認目標浪費口舌的小題大做，沒有一件不是暴殄文字的喪心病狂。

在這些無聊的糾纏以外，中國知識份子把多餘的精神用來逃避現實，他們美其名曰研究學術，其實只是另一種玩物喪志。十七八世紀的大思想家李塨，早就為這種現象做了歸納和預言：

“〔知識份子〕於扶危定傾，大經大法，則拱手張目授其柄於武人俗士，當明季世，朝廟無一可倚之人，〔知識份子〕坐大司馬堂，批點左傳。敵兵臨城，賦詩進講。……日夜喘息著書，曰：‘此傳世業也！’卒至天下魚爛河決，生民塗

炭。”

這種現象的結果是，思想上的失敗，導致了他們品格上的失敗，他們一方面諸善莫做，一方面扶同爲惡而不自知。於是，“天下魚爛河決，生民塗炭”的時候，再做什麼，都太晚了！

中國知識份子缺乏一種重要的品質，就是“特立獨行”。缺乏特立獨行，自然就生出知識份子的兩大方面的失敗。結果變得甲跟乙沒有什麼不同，丙和丁沒有什麼兩樣，大家說一樣的話，寫一樣的狗屁，拍一樣的馬屁。甲乙丙丁之間，至多只在面目上有點小異，在全沒個性與特性上，卻根本大同。

表面上看，司馬光型和歐陽修型不同，其實從基本模式上看，兩個小老頭完全一樣。他們爭的，都是傳統文化的解釋權，看誰解釋的好，使孔夫子和當今聖上高興。打開“司馬文正集”和“歐陽文忠集”，一對照，就看出他們竟那麼像，像得你可以叫司馬“修”，叫歐陽“光”！他們都是在傳統板眼裡一板一眼的順民，他們兩眼畢恭畢敬的向上看，一點也不敢荒腔走板。

中國傳統最不允許荒腔走板。中國社會雖然沒效率，但對收拾板眼不合的天才與志士，卻奇效如神，很會封殺。這種封殺，先天就致特立獨行的人於死命。這種人，絕大多數都要早夭；僥倖不早夭的，最後也難逃浩劫。偉大的明朝先知李卓吾（贄），七十六歲還要死在牢裡，就是最殺氣騰騰的例證。——他們走的路，都是到烈士之路。

所以，理論上，特立獨行的知識份子，在中國很難存在，存在也很難長大，長大也很難茁壯，茁壯也很難持久，持久也很難善終。那麼，這些人怎麼辦呢？這些人想出一個辦法，就

是隱居。中國第一部正史《史記》作者司馬遷，這個特立獨行的人，在牢裡有一段悲慘生涯——被割掉生殖器；中國第二部正史《漢書》作者班固，這個特立獨行的人，曾兩次入獄，第一次靠他弟弟班超的面子脫罪，第二次以涉嫌叛亂死在牢裡；中國第三部正史《後漢書》作者范曄，這個特立獨行的人，也以叛亂罪下獄，同他一個弟弟四個兒子，一起橫屍法場。范曄看出來特立獨行的下場，在他的書裡，他特別為特立獨行的人，列了專傳，就是《後漢書》裡的《獨行傳》和《逸民傳》。這種傳記，變成傳統，到《晉書》中變成《隱逸傳》，《齊書》中變成《高逸傳》，《梁書》中變成《處士傳》，《魏書》中變成《逸士傳》，《南史》以後都叫《隱逸傳》。但這種形式的特立獨行者，他們只是山林人物，只是不合作主義者，至多只能在品格上特立獨行，在思想上還大有問題。換句話說，他們可惜都很笨。他們可能是特立獨行的愚者，特立獨行的賢者，特立獨行的行者，特立獨行的勇者，特立獨行的作怪者，但很少是特立獨行的智者。這些人在中國傳統裡比例極少，可說只有千萬分之一。中國正史裡為他們立專傳，並不表示他們人多勢眾，只表示對他們致敬。當然，他們是消極的，消極的高蹈，消極的潔身自好，消極的不能做示眾的烈士，只能做示範的隱士。但是，在亂世裡，他們能自苦如此，能視富貴如浮雲，能堅持信仰，堅持不同流合污，也就天大的不容易了！

二十世紀以來，中國社會有了劇變，羣體的趨向越來越明顯，效率也越來越“科學”，古代人至多“天網恢恢”，現代人卻會“法網恢恢”。古代人要表現特立獨行，歸去來兮以後，回家有將無之田園，有歡迎之童僕，有寄傲之南窗，有盈樽之

酒；現代人呢？什麼都沒有，只有管區警察。

但現代人中有一個例外，有一個“今之古人”，那就是李敖。很多偽善的讀者吃不消李敖喜歡捧李敖，所以李敖謙虛一次，用一次海外學人捧場的話，來描寫這個例外。《大學雜誌》登過這麼一段——

“至於攻擊傳統文化的智識之士當中，倒有不少來自中國內地，足跡從未到過‘西洋’，對於中國文史典章之通曉遠在他們那點點‘西學’之上。主張‘打倒孔家店’的四川吳虞便是一個典型。台北的李敖，主張‘全盤西化’，那麼堅決，那麼徹底，然而他也從未出過洋，他對西方任何一國的語文未必熟嫻流利，而他的中文已經卓然成家。更基本的，他那種指責當道（包括學術界的當道），橫睨一世的精神，完全不是‘西方式’的，完全出自一種高貴的中國‘書生傳統’。近代憤激的中國智識之士以及若幫受他們影響的外國學者，愛講中國歷史上的文字獄與思想箝制，卻忽視了中國傳統書生另有一種孤傲決絕的精神，在《時與潮》發表的那篇李敖之文，便表現了這股精神。”

這是很叫人趕快鼓掌的話。鼓掌以後，再看一遍，再鼓一次掌。

海外學人捧我有“一種高貴的中國‘書生傳統’”，他說對了。我是喜歡搬弄傳統的。從十四年前出版《傳統下的獨白》開始，到十四年後出版這本《獨白下的傳統》，就證明我對傳統有傳統。爲什麼要這麼傳統呢？因爲要了解中國，就不能不弄清傳統。

美國人向法國人開玩笑，說你們法國人老是自豪，可是，一數到你們爸爸的爸爸，就數不下去了，爲什麼？法國人私生子太多，一溯源，就找不到老爸爸了；法國人也向美國人回敬，說你們美國人也老是自豪，可是一數到你們爸爸的爸爸，也數不下去了，爲什麼？美國人歷史太短，一溯源，也找不到老爸爸了。這個笑話，說明了解歷史太短的國家，就不必受傳統的罪，直接了解，就可一覽無餘。了解只有兩百年歷史的美國，固然要了解英國；但了解英國，只要精通北歐海盜史，就可以完工，絕不像了解中國這麼麻煩。

精神分析學家看病的時候，必須使病人回憶過去；思想家、批評家、哲學家、歷史家面對中國這個龐然大物，也必須如此。中國是一個充滿了萬年、千年、百年、幾十年和十幾年大量傳統的民族，壽比南山。南山本是傳統細壤所積，不了解鈣層土（pedocals）和淋餘土（pedalfers）的人，不了解土壤；不了解中國“鈣層傳統”和“淋餘傳統”的人，又怎麼了解中國？

中國人不了解中國，中國人了解的中國只是“中國口號”；非中國人不了解中國，非中國人了解的中國只是“中國雜碎”。他們都沒功夫了解中國，也沒有了解中國的功夫。在這種情形下，一個有着“高貴的中國‘書生傳統’”的人，以“種豆南山下”“悠然見南山”的心情，寫下這本中國入門書，它的意義——不論是說出來的還是沒說出來的——自然就非比尋常。

這是真正的“中國功夫”，這是李敖的“中國功夫”。

漢朝的開國皇帝劉邦，不喜歡知識份子，他的方法是“溺儒冠”——一把將知識份子的帽子抓下來，當衆朝帽子裡撒

尿；明朝的孤臣孽子鄭成功，不要做知識份子，他的方法是“焚儒巾”——跑到孔廟向孔夫子說“各行其是！”當衆把書生裝燒了。這一溺一焚之間，真有學問。“舊唐書”裡有“救焚拯溺”的話，借用來寫中國知識份子的惶恐心情，倒也好玩。中國知識份子最缺乏“溺儒冠”“焚儒巾”的氣魄，讀書不化，頭腦不清，到處叫爸爸。這本《獨白下的傳統》，是一本“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奇書，它像溺儒冠焚儒巾一樣的唾儒面。有了這樣的奇書，中國受苦受難的人才氣象萬千，才光芒萬丈。

這不是寫給臉上有口水的人看的書，它的寫法，打破了所有的格局與成例。我希望，所有受苦受難的人能看得懂又不看得睏；我希望，他們透過這本書，來了解中國；也透過這本書，來了解自己。不論是販夫走卒，不論是孤兒神女，不論是白日苦工或黑獄亡魂，他們都是受苦受難的中國人，他們是中國的生命，他們是真的中國。

一九七九年，經年累月足不出戶之日，李敖在台灣。

第一輯

直筆——“亂臣賊子懼”

孔夫子活的時候，天下大亂了，其實天下永遠是大亂的。

孔夫子聽說，有的做兒子的，居然殺了父親！

孔夫子又聽說，有的做臣子的，居然殺了皇上！

孔夫子氣了！

孔夫子瞪了眼睛，吹了鬍子。

孔夫子拿起了一支鋼筆，噢，不對，那時候沒有鋼筆；拿起了一支毛筆，噢，也不對，那時候也沒有毛筆；孔夫子拿起了的是——一把刀！

呀！孔夫子怎麼會拿刀？孔夫子斯斯文文的聖人，拿刀幹什麼？殺他父親嗎？不是！殺他皇上嗎？當然也不是！殺那殺父弑君的兇手嗎？好像有點是了。

其實孔夫子不是拿刀去殺任何人，孔夫子太老了，孔夫子殺不死任何人；孔夫子是儒者，孔夫子不會殺人。

但是有人不是說嗎？孔夫子當魯國的司寇（司法行政部長兼警備司令），大權在握，第二天就殺了他的政敵“少正卯”，孔夫子不是殺人嗎？

但有人說這事是假的。即使是真的，孔夫子也不必親自操

刀，因為有劊子手老爺，和劊子手老爺的鬼頭刀。

那麼，孔夫子拿刀幹什麼？

孔夫子拿刀並不是要殺人，而是嚇唬人。

孔夫子拿起刀來，朝一塊竹片刻去，刻了一片又一片，刻了許多字。最後，刻滿了一大堆的竹片。

這些竹片，就是孔子時代的書。

孔子時代沒有筆和紙，只有刀子和竹片，刀子刻在新砍下來的青竹片上，一刻上去，竹片直冒水，像是流“汗”一樣，所以叫做“汗青”。

所以，古人一提到“汗青”，就象徵着書籍，也象徵着歷史。古人的詩說：“留取丹心照汗青”、“獨留青史見遺文”，就是這個緣故。

孔夫子“汗青”九個月，完成了一部“青史”。

這部“青史”，是中國第一部有系統的歷史書，它的名字，叫《春秋》。

《春秋》一共有一萬六千五百七十二個字，每八個字，刻在一塊竹片上，你說刻了多少片？

孔夫子寫《春秋》的目的，並不是要殺亂臣賊子，而是要亂臣賊子害怕。

什麼是亂臣賊子？凡是不守臣子的本份的，都是亂臣賊子。

什麼是臣子的本份？臣子的本份是要乖乖的聽話，要在自己的崗位上，小心翼翼的做事，不要做一點份外的事。不該你做的事，你不該管閒事。管閒事就是“越俎代庖”。

孔夫子寫《春秋》，目的就是要大家個個都在自己崗位上

做事，該做什麼的，就做什麼，不要不守本份！

可是，怪事就出在這兒，寫這本《春秋》勸人守本份的人，自己就不守本份！

因為孔夫子的本份，不是“寫歷史的官”——史官，他沒有資格寫歷史，《春秋》不該是他寫的，就好像耗子雖討厭，狗卻不可抓耗子。

可是，孔夫子老了，他不管三七二十一，他還是寫了。

他不但寫，還不許別人參加意見，他的學生“子夏”站在旁邊，兩眼瞪着，一個屁也不敢放，只能幫忙搬竹片、磨刀。

孔夫子太偉大了，偉大得使學生“不能贊一辭”！

孔夫子把《春秋》寫好了，雙手一拍，向學生說：他知道他不該寫這部書，可是希望大家原諒他。看了這部書，了解他的人，可以根據這部書了解他；罵他的人，根據這部書，也有足夠的理由罵他。他自問憑良心寫，管不了那麼多，管不了那麼多，管不了那麼多。

但是，糟糕的是，孔夫子自己，卻沒完全憑良心。——孔夫子在《春秋》裡，竟做了好多好多的手腳。

孔夫子是春秋時代魯國人，在“春秋”所記的兩百四十年中，魯國的皇帝，四個在國內被殺，一個被趕跑，一個在國外被殺，這樣六件重大的事，孔夫子竟在《春秋》裡，一個字也不提。這那裡是寫真相呢？這不是有意說謊嗎？

正因為孔夫子在有意說謊，所以，他的學生們，也就跟着造謠，竟說“魯之君臣，未嘗相弑！”意思是說：“我們魯國呀，沒有家醜。皇帝和臣子之間，沒有兇殺案！”

像這一類有意說謊的例子，還多着呢！

如狄國滅了衛國，孔夫子爲了替齊桓公遮蓋，竟把這樣一件大事，一筆帶過，寫也不寫。

又如晉國諸侯竟傳見周朝的皇帝，這是很不成體統的事，孔夫子爲替晉文公遮蓋，他竟改變一種寫法，與事實的真相，差了十萬八千里。

孔夫子爲什麼要做這些有意說謊的行爲呢？研究他的原因，乃是由於孔夫子主張——

“爲尊者諱”

“爲親者諱”

“爲賢者諱”

換成白話，是——

“爲所尊敬的人瞞瞞瞞”

“爲親人瞞瞞瞞”

“爲賢者瞞瞞瞞”

孔夫子寫書的目的，本是要把那些他看不慣的人的行爲，記入青史的；但是人總是有缺點的，連孔夫子所尊敬的人、和他的親人、賢者也不例外，竟也有使人看不慣的行爲出現，如果孔夫子不管三七二十一，把這些看不慣的行爲，一股腦兒寫進去了，那麼人家一看到，對“所尊敬的人”，對“親人”和“賢者”的敬意，也就大打了折扣。所以，孔夫子呀，寧願說謊。這種在歷史上說謊，有一個專名詞，叫做“曲筆”。“曲筆”就是該直着說的話，要把它歪曲了來說。相反的，有什麼，就說什麼；該怎麼說，就怎麼說的做法，也有一個專名詞，叫做“直筆”，就是正直的筆。

孔夫子寫“春秋”，本來是要用“直筆”來使“亂臣賊子”害怕的，但是寫來寫去，他竟寫出那麼多的“曲筆”，可見寫“直筆”是多麼不容易！

孔夫子主張寫“直筆”的意思，並不是他發明的，在孔夫子以前，中國早就有了這種傳統。中國字歷史的“史”字，最早的寫法是



上面是“中”字，下面是“又”字，就是“手”字。用“手”把持住“中”字，是什麼意思，你就不難明白。

這個“史”字，一開始的意思不是指“歷史書”，而是指“史官”。“史官”在上古時候，是地位很重要的一種官，他掌管天人之間的許許多多的事，像天時、曆法、預言等等，做史官的，都脫不了份。後來史官的權利漸漸縮小，縮小到只記錄國家大事。史官的名目很多，像“大史”“小史”“內史”“外史”“左史”“右史”，記錄的範圍從日月星辰變化，直到內政外交，皇帝的一舉一動，都逃不過史官的刀尖（不是筆頭）。

現在舉一個“皇帝的一舉一動，都逃不過史官的刀尖”的例子：周朝成王小時候，曾跟他的弟弟叔虞一塊玩，成王用樹葉刻了一塊“珪”，（“珪”是刻圖章用的一種玉，皇帝給別人官做，要給印，就是“珪”。）然後隨手把這片樹葉送給他弟弟，說：“拿這個封你！”這時候史官在旁邊，一聽就記下來了。後來史官請成王真正去封他弟弟，成王奇怪了，問為什麼？史官說某月某日，你拿樹葉刻圖章給你弟弟，不是說要封他嗎？成王說，我是開玩笑的！史官說：“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

禮成之，樂歌之。”這樣一來，成王只好封他弟弟了。

這個故事發生在三千年前，成王的弟弟被封後，成立了一個新國家，就是晉國。

現在流行的口號是“司法獨立”“教育獨立”，古代若有流行的口號，該是“歷史獨立”。在古代的史官，他們的地位可說是相當獨立的；不但獨立，還可以照史官的意思，來寫他判斷的事實。最有名的例子是文天祥“正氣歌”中所說的“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

公元前六百零七年，晉國的靈公，被趙盾的弟弟趙穿殺死了。晉國的史官叫董狐，他竟在史書上寫道：

“趙盾弑其君”

趙盾跑過來，質問董狐說：“董先生，你寫錯了罷？明明是我弟弟趙穿殺了皇帝，你怎麼寫我呢？”董狐說：“你是朝廷大員，這件事情發生的時候，你躲在外面，可是沒出國門；你回來了，又不追究兇手。你還脫得了干係嗎？殺皇帝的不是你，又是誰呢？”於是趙盾心虛了，只好讓董狐這樣寫，沒法子。（當時趙盾真可以殺董狐一刀或一百刀，可是他太“笨”，沒想起來干涉歷史，所以就捎着惡名，一捎兩千五百多年！）

董狐的例子，就是上面所說的史官“不但獨立，還可以照史官的意思，來寫他判斷的事實。”

孔夫子就稱讚過董狐，說他“書法不隱”，就是直筆寫歷史，不隱瞞什麼。只可惜孔夫子自己，卻是個“書法每隱”的傢伙！

董狐這件事情過後五十九年，齊國又發生了皇帝被殺事

件。兇手是大臣崔杼。於是史官又來了，史官叫太史，他寫道：

“崔杼弑莊公”

崔杼可沒有趙盾那種好脾氣，他光火了，立刻把史官殺掉！可是，事情卻沒完。史官的弟弟來了，還是這樣寫：

“崔杼弑莊公”

崔杼又氣了，又殺了一個。

可是，事情還沒完。史官的弟弟的弟弟又來了，又這樣寫：

“崔杼弑莊公”

崔杼更氣了，又殺了史官的弟弟的弟弟。

可是，事情還沒完。史官的弟弟的弟弟的弟弟又來了，又這樣寫：

“崔杼弑莊公”

於是，崔杼不氣了，洩氣了，他只好認輸，不殺了，讓史官隨便寫罷！（史官到底兄弟多，所以他們贏了！這樣看來，兄弟少的，最好別幹這一行。）

如果崔杼不洩氣，硬是要把史官的兄弟都殺光，那可怎麼辦？別忙，史官還是有辦法，齊太史只是“北史氏”，當時還有“南史氏”。南史氏聽說崔杼殺史官，立刻跑去，也要歪着脖子，接着寫直筆。後來看到齊太史家的老四成功了，南史氏才打道回府。

由此可見，史官的“人海戰術”也蠻可怕，它叫你來個殺

不殺由你，寫不寫由我，看你拿武士刀的，把我這拿刻竹刀的怎麼辦！

又由此可見，史官不但是獨立的，並且還是家族企業的，父親傳兒子的。

歷史上爲直筆而使腦袋搬家的，並不少見。前趙昭武皇帝（匈奴人）時候，公師彧就因寫國史被殺；北魏道武皇帝（鮮卑人）時候，崔浩也因爲寫國史被殺。但儘管有這一類干涉歷史的例子，究竟不能算是“正宗”。在正宗上，皇帝還是要尊重史官的。公元六世紀的一個皇帝，就向一個著名的史官魏收說：“我後代聲名，在於卿手。”又一個皇帝，也向魏收說：“好直筆，勿畏懼！我終不做魏太武（北魏道武皇帝）誅史官。”這些都是皇帝尊重史官的說話。

本來，在制度上，史官的獨立，使皇帝都不能看他寫的歷史（歷史是要留給後人看的）。凡是尊重制度的皇帝，沒有不守這道行規的。甚至漢朝最兇狠的皇帝漢武帝，也不看史官司馬遷寫的《史記》，所以《史記》中才能批評他。到了後漢時候，王允就埋怨“武帝不殺司馬遷，使謗書（指《史記》）流於後世。”其實王允不知道；光就這一點，說明了漢武帝的尊重史官，遵守制度。

這種制度，到唐朝以後，開始動搖。唐朝的一些皇帝，總忍不住要看史官寫些什麼。（看看罵老子沒有？）這麼一來，慢慢的，史官就不敢直筆了。

在史官的歷史發生問題以後，在民間，有一些“野史”出來，表現直筆。當朝的皇帝雖一再警告、查禁，可是總不能斬草除根。“若想人不知，除非己莫爲。”統治者做了壞事，要

瞞，是瞞不了的；要燒，是燒不光的。“流芳”呢？還是“遺臭”？歷史總不會放過他。

提倡寫“直筆”的孔夫子，當他竟也騙人，寫了“曲筆”的時候，歷史上，也留下他的記錄。歷史是不講感情的，講感情便不是真歷史。歷史只講求真相，由求真的人，不斷的、千方百計的記載它的真相。古往今來，許多壞蛋們想逃過歷史，改變歷史，可是他們全部失敗了。歷史是一個話匣子，壞蛋們怕人說話，可是歷史卻說個沒完。壞蛋們真沒法子。

避諱——“非常不敢說”

五代時候，有一個號稱“長樂老”的大臣，叫做馮道，他又字“可道”。這個人在遇到危難的時候，別人着急，他卻自自在在。他很儉樸，一點也沒有大官的架子，他跟僕人們一起吃飯，吃同樣的東西。有的兇狠的將軍們，搶來漂亮女人，送給他，他表面上收下，骨子裡卻把漂亮女人送還她自己的家裡去。在五代的紛亂局面裡，他跟過四個姓的朝代，在十個皇帝手下做過大臣。他的人生觀是“莫為危時便愴神，前程往往有期因”，他永遠是樂觀而機智的。當契丹滅了後晉這個朝代，馮道也跟着跑到契丹的朝廷裡，契丹的皇帝罵馮道說：“你跑來幹嘛？”馮道說：“我們沒有城，也沒有兵，打不過你們，怎麼敢不來？”契丹的皇帝是野蠻人，要把中國人一城一城的殺光，可是自從馮道投降後，契丹的皇帝便放棄了這種野蠻的手法，因為他接受了馮道的巧妙勸說，馮道的智慧太高了，外國頭腦簡單的皇帝，不得不聽他的。

馮道雖然使中國老百姓免於被屠殺，可是歷史上，他卻背上“漢奸”的罪名。歷史家說他不應該伺候那麼多朝代、那麼多皇帝，可是馮道說：“管你什麼人做皇帝呀！只要對老百姓

有好處，少殺一點老百姓，我都幹！”

馮道活了很久，活到七十三歲，跟孔夫子同年。

馮道是個快樂的聰明人，有一些關於他的笑話。據說有一天，他的學生讀《老子》這部書，一開頭是：

“道可道，非常道。”

因為“道”是馮道的名，“可道”是馮道的字，他的學生不敢直接叫老師的名字，所以碰到“道”和“可道”，就唸成“不敢說”，而把這兩句《老子》，唸成了：

“‘不敢說’‘不敢說’，非常‘不敢說’。”

這是一個歷史上的笑話，可是卻有許多深遠的意思。為什麼做學生的，竟不敢叫老師的名字呢？老師不是明明叫那個名字嗎？叫那個名字而又不說，到底是怎麼回子事呢？

要知道這是怎麼回子事，得先飛象過河，知道另外一門大學問，這門學問，叫做“避諱學”。

“諱”是什麼？諱就是“不敢說”，為什麼“不敢說”呢？有的因為顧忌的緣故，有的因為隱匿的緣故，把一個名字，或一件事實，知道了卻不說，反倒說成別的，這就叫做“諱”。

為什麼一個名字，一件事實，知道了要不說呢？照中國傳統的高見，是因為說了就是不吉祥或不恭敬或大逆不道，所以才“不敢說”。“不敢說”的意思，用文言文的說法，是“諱言”，是“諱莫如深”，這一類的說法，還有很多。

對一件事實的“諱”，大部份是指隱匿一種真相。比如說，死是一種不可避免的事實，可是古人卻忌諱提到它，認為不吉祥。所以古人說一個長輩快死了，用的表達法是“倘有不諱”。

“倘有不諱”的意思翻成白話是：“假若有隱瞞不住的時候”，就是“倘若死的時候”。除了認為不吉祥的意思外，還有一種是指對某種事實的隱瞞。漢朝的大才子司馬相如，在他的“上林賦”裡就有“鄙人固陋，不知忌諱”的話，這裡的諱，就是指對事實的隱瞞。《後漢書》劉陶的傳裡，有“敢吐不時之義於諱言之朝”的記錄，就是說：他敢在大家都隱瞞不說的朝廷裡說真話。照古代思想家兼政治家晏子的認定，一個國家大家敢說真話，“民無諱言”，才是政治清明的表示。反過來說，若人人都“諱莫如深”，就是政治黑暗的證明。

對一個人名字的避諱，在中國有好長久好長久的歷史。這種諱的風俗，起於周朝，盛行於唐朝宋朝。名字上避諱的方法，共有四種花樣：

- 一、改字——用另外一個意義相近或聲音相近的字，來代替他想避諱的字。
- 二、空字——把要避諱的字空一格。
- 三、缺筆——把要避諱的字少寫一筆，認為少寫一筆就恭敬了。
- 四、用××來代替；或用某某代替；或用“諱”字代替。避諱的例子，在歷史上可多着啦！

避諱的例子，在歷史上可多着啦！

漢朝第一個皇帝，是流氓出身的漢高祖，他的名字叫“劉邦”。為了避“邦”字的諱，很多書都把“邦”字改成“國”字。例如，把《論語》中“何必去父母之邦”改成“何必去父母之國”，把孔夫子的話都改了。

漢朝又有一個皇帝，叫漢明帝，名字叫“劉莊”。爲了避他的諱，一個有名的人叫做“莊光”的，硬給改名叫“嚴光”了。莊光是明帝父親光武帝的好朋友，光武做了皇帝，可是莊光卻不拍他馬屁，仍舊在鄉下釣他的魚。光武帝特別把他拉到皇宮裡去，要他住在一起，他也不肯。光武帝因此怪他“咄咄逼人”，——因爲每個人都要買皇帝的賬的，可是莊光卻不買，弄得皇帝心裡有被欺負的感覺。莊光萬萬沒想到，他的名字，竟跟後來的皇帝“衝突”起來，並且不得他的同意，把姓都給改了，他要是知道，真會很生氣。好在“莊嚴”“莊嚴”，“莊”字和“嚴”字也差不了好多，嚴光就嚴光吧！

漢朝的皇帝不但要避諱，皇后也要避諱。例如漢高祖的太太呂后，是一個最殘忍的女人，她的名字叫“呂雉”。“雉”是一種叫“野雞”的動物。因爲皇后用了這個“雉”字，就不許“野雞”再用了，從此以後，“野雞”就叫“野雞”，再也不叫“雉”了。

唐朝時候，爲避第二個皇帝叫“李世民”的諱，許多當時的人的名字，都給硬改了：

如“王世充”，硬改爲“王充”。

如“李世勣”，硬改爲“李勣”。

你說被改名的人倒霉不倒霉？他們的名字，好好的攔腰被抽去了一塊，真好像亞當被抽去肋骨一般。

唐朝的花樣還多着呢！唐朝還有一種避諱的花樣是：如果你要做官，而這官的名稱，有一個字跟你老子或老子的老子一樣，你就沒希望了，你就不能幹了。例如說：你爺爺的名字裡

若有一個“安”字，那麼陝西長安縣的縣長，你就不能做了；又如你爸爸的名字裡若有一個“軍”字，那麼你這一輩子就不能做將軍。如果你實在想做官，同時心裡想：你們怎麼知道我爸爸、我爺爺叫什麼名字，乾脆不告訴你們，我先把縣長將軍做了再說。如果你這樣，可以，可是千萬不能讓別人查出來。若有一天被查出來，那你不但要從縣長或將軍寶座上被趕下來，還要捉到法院，判一年徒刑，叫你知道厲害！

唐朝又有一個人叫賈曾，他被派當了“中書舍人”一種官，他的父親正好叫“賈忠”，他怕“忠”字跟“中”字一樣，犯了忌諱，若徒刑一年，怎吃得消？所以他請求不做這個官算了。後來，經專家審定的結果，認定“忠”“中”可不算是一個字，這個官可以做，於是賈曾才放心了。

唐朝又有一個人，是短命的詩人李賀，他的爸爸叫“李晉肅”。當時就有老夫子們指出，李賀這個小子，一輩子都不可考“進士”，因為“晉”“進”同一個聲音，李賀該避他父親的諱！

有一個古人叫田登，他做一個州官。他大概是一個老夫子，看到皇帝們的諱來諱去，怪過癮的，因此他也想找個對象諱他一諱。正好正月十五號燈節到了，燈節時候習慣，是准點燈三天。可是田登認為“燈”字觸犯了他的名字“登”，於是貼佈告，只說“放火三日”而不說“點燈三日”。後來老百姓諷刺他，造了一句話，叫做“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

清朝初年，一個“衝冠一怒為紅顏”的將軍吳三桂，他在中國西南稱王，為了避諱，特地把西南的“桂林”，改為“建林”。又因為他那被李自成殺掉的父親叫“吳襄”，所以也得找

個地方來做避諱的對象。找來找去，找到個湖北的襄陽，於是就飛鏢直奔襄陽，改名叫漢南府。

清朝因為是滿洲人統治中國，滿洲人在中國歷史上，是所謂“夷”“狄”“胡虜”，這些稱呼，都有輕視的意思的。到了滿洲人做皇帝，這種輕視，自然不能再來了，所以古書的字，都一一改了。像“夷”字改成了“彝”字，“狄”字改成了“敵”字；“虜”字改成了“鹵”字，都是避諱的例子。

此外，還有一些避諱的例子，也很有趣：

孔夫子是中國人最尊敬的大偶像，所以關於他的避諱，也就更精彩。孔夫子的名字叫“孔丘”，宋朝時候，政府下命令，凡是讀書讀到“丘”字的時候，都不准唸成“丘”字，該唸成“某”字，才算尊敬，同時還得用紅筆在“丘”字上圈一個圈。（所以你看書的時候，要帶一支紅筆，才不違法。）又在清朝的時候，由政府會議決定，凡是天下姓“丘”的，從此以後，都要加個耳字旁，改姓“邱”字，並且不許發音為“邱”，要讀成“七”字。於是，天下姓“丘”的，從此改姓“邱”了。到了今天，又有姓“丘”的，又有姓“邱”的，原因就是有的改了，有的又改回原來的“丘”字了。

還有些避諱的原因，是因為家族的緣故。例如中國最有名的史學家，《史記》一書的作者司馬遷，他因為他的父親叫“司馬談”，所以在他寫的《史記》裡，把跟他父親名字相同的人，都不得同意，一律改了個名兒。例如“張孟談”，改為“張孟同”；“趙談”，改為“趙同”。後來《後漢書》的作者范曄也跟他學，因為范曄的父親叫“范泰”，所以在《後漢書》裡，叫“郭泰”的，竟人不知鬼不覺的變為“郭太”了；叫

“鄭泰”的，也變爲“鄭太”了。

又如唐朝的詩人杜甫，父親的名字叫“杜閒”，爲了避“閒”字的諱，杜甫寫了一輩子的詩，卻沒在詩中用過“閒”字。

又如“宋朝”的老蘇家諱“序”字，所以蘇洵不寫“序”字。碰到寫“序”的地方，改成“引”字；蘇軾也跟着不用“序”字，他以“叙”字來代替。今天一本書中，在序的地方有人用“序”字，有人用“小引”“引言”或“叙”字，就是由於被老蘇家的家諱暗擺一道的緣故。

避諱有的也不全是爲了尊敬，有的因爲厭惡或懷恨，這是例外的諱，也構成了避一避的理由。例如唐朝的肅宗，最恨叛變的將軍安祿山，所以，凡是郡縣中有“安”字的，他都給改了，比如——

“安定”改爲“保定”。

“安化”改爲“順化”。

“安靜”改爲“保靜”。

都是由於同一個理由。

明朝的世宗最恨“夷狄”，竟恨到不願意看“夷狄”這兩個字的程度，你說恨得多厲害！所以凡是寫到“夷狄”這兩個字的時候，都要寫得特別小，越小越好，因爲寫得小了，皇帝才高興。

清朝時候一個人叫“王國鈞”，考試成績很好，正要被派個官兒做，可是被西太后見到了他的名字，不見到不要緊，一見到太后就氣起來，太后說：“王國鈞”三個字的音，正好是

“亡國君”，是指亡國的皇帝，這種人，這種名字，還能要他做官嗎？於是，可憐的“王國鈞”，由於他爸爸沒把他的名字起好，竟鬧得斷送了前程。

這些都是因為厭惡或懷恨的緣故，造成的心理忌諱。

避諱這套想起來實在沒有什麼道理的習慣，在世界上，可說是中國獨有的壞習慣，自找麻煩的壞習慣。我們再反看外國，外國正好和中國相反，洋鬼子們覺得，尊敬一個人，最好的尊敬法子，不是不敢提他的名字，而是偏偏要提他。

洋鬼子尊敬華盛頓，特別把美國國都叫做“華盛頓”，大家你叫我叫老頭子叫小孩子叫，絲毫沒有覺得該“避”什麼“諱”，同時覺得，這是對華盛頓最大的恭敬和紀念。

洋鬼子尊敬一個人，常常把自己兒子的名字，起名跟他所尊敬的人一樣，在中國人看起來，這簡直大逆不道！例如你姓張，你尊敬孔夫子、孔丘，而把自己的兒子叫“張丘”，你這樣做，若在中國古代，不挨揍才怪；不但挨揍，並且還要坐牢呢！那時候的“張丘”，不但不能叫“張丘”，恐怕得叫“張囚”了，不，不對，也不能叫“張囚”，因為“囚”與“丘”同一個聲音，要避諱！

中國在走入二十世紀以後，慢慢的，也學會了用一個尊敬的人的名字了，也慢慢知道這並不是不可以的事了。“中山縣”“立煌縣”“羅斯福路”“麥克阿瑟公路”等等，都是這種轉變的證明。時代畢竟是進步的，中國也不知不覺的在進步。在進步過程中，一切落伍的舊習慣，都必須被拋棄。在沒有忌諱的新時代裡，一切舊的忌諱，都將是歷史的陳蹟。——讓我們了解它，可是不要再復興它。

諫諍——“寧鳴而死，不默而生！”

中國古代政府是專制政府，專制政府的代表人是皇帝。

皇帝是被尊為“天子”的人，“天子”是上天的、老天爺的兒子，來頭極大，大家都怕他。

皇帝的權力很大，大到有時候連他自己也弄不清有多大。因為連他自己也弄不清，所以，他常常要試試看，看自己的權力到底有多大。所以，他要做很多事，要對付很多人，甚至要代表老百姓，跟“鬼神”和“自然”打交道。關於最後一項，皇帝的權力就顯得很小很小，因為“鬼神”和“自然”並不買他的賬。比如說，天不下雨了，麥子都乾了，皇帝的表現就是向“鬼神”和“自然”求雨，求呀求的，碰到他運氣好，雨來了，於是老百姓就說皇帝很行；若碰到運氣不好，任憑你怎麼求，雨還是不來，皇帝也無所謂，他還是照樣做他的皇帝，——絕不讓你做。

所以，在歷史上，很多人做了皇帝，很多人想做皇帝。因為做皇帝太過癮了，做皇帝權力很大。

皇帝由於權力很大，當他做一件對的事的時候，他會把一件事做得很好很好；當他做一件錯的事的時候，他會把一件事

做得很壞很壞。

一般傻頭傻腦的小百姓都以爲：皇帝的身份，既是上天的兒子，一定有一種“天縱之聖”，有一種天才與聰明，可以把一切事都做得很對。

對這種情形，不但傻頭傻腦的小百姓以爲如此，就是一些皇帝自己，也以爲如此。他們真的以爲他們是天才的化身，他們不會做錯事。

於是，做呀做的，結果許多錯事竟做出來了。

於是，爲了使皇帝少做一點錯事，一種制度便慢慢冒出來了，這種制度，叫做“諫官”制度。

“諫”，是一種勸告，“諫官”，是一種專門管勸告皇帝的官。這種官勸告皇帝不要做錯事，勸告皇帝在做一件事前多想想，再想想。他們整天跟在皇帝身邊，到處找皇帝的錯。找到錯以後，便提醒皇帝。

這種諫官，有許多種。有的叫“拾遺”，意思是把皇帝“遺”忘的東西“拾”起來，免得因遺忘而做錯了事。

唐朝有一個大詩人，叫杜甫，他就做過這種“拾遺”的小官。

“拾遺”真是小官。爲什麼要把拾遺設計成小官呢？因爲拾遺要給青年人做，青年人有火氣，比較不老油條，看不慣的，就要說出來。一說出來，“諫官”的目的就達到了。因爲諫官一類的職務，本來就是有話就要說的官，本來就是張開嘴巴哇哇說話的官。爲了使諫官肯說話，敢說話，不怕一切後果和損失，所以給他們的職位，便越小越好，一個人做了一個小官，便不在乎得失，大不了不幹，不幹就不幹，一點也不會有

戀棧惋惜的心情。官越小，便越敢說話，所以諫官都是小官。

除了“拾遺”以外，還有一種小官叫“補闕”，表示要替皇帝彌補過失；還有一種小官叫“司諫”，表示專門管諫諍的事；還有一種小官叫“正言”，表示向皇帝說正確的話。總之，這一類的小官們，名目很多。不管什麼名目，他們的使命，統統都是向皇帝進忠告；他們的作法，統統都是挑皇帝的錯。

當然，古代傻瓜們挑皇帝的錯，並不止於“諫官”“拾遺”“補闕”“司諫”“正言”這一類的小官，一般大臣們，他們也可以勸皇帝。勸得成功，大家都高興；勸得不成功，他一個人倒霉。

就人之常情而論，沒有人喜歡在他做一件事的時候，旁邊插了個多嘴的人來搗蛋，何況這個多嘴的人還是要你給他薪水的。做皇帝的也不例外。做皇帝的有大權力，他本可以把向他多嘴的人殺掉或趕跑，或者按在地上打屁股，但他要忍耐着不這樣做，這種忍耐，的確需要一點工夫。

古代皇帝中越有忍耐工夫的，越會被人稱讚，他們接受臣子們的勸告，或者雖不接受，但有耐心聽聽，就會被稱為是好皇帝。他們這種作風，就被稱為“納諫”，翻成白話，是接“納”“諫”言；如果皇帝不接受臣子們的勸告，也有一個名詞，叫做“拒諫”，翻成白話，是“拒”絕“諫”言。諫言拒絕多了，或者因為諫言而發脾氣、趕人、打人、殺人，這種皇帝，歷史上就叫做“昏君”，是壞皇帝。

中國歷史上最早的“拒諫”傳說，是殷朝的比干的故事，比干因為勸皇帝，皇帝氣起來了，下命令挖掉他的心，當時的皇帝叫商紂，所以以後一提到“拒諫”的壞皇帝，大家就說商

紂考第一。（有一次，漢朝的高祖被大臣周昌罵做商紂，可是他沒生氣，他沒生氣，就表示他不是商紂。）

中國最有名的“納諫”例子，是皇帝唐太宗和諫官魏徵。魏徵在唐太宗生氣的時候，也不怕，也要勸他，在這種“緊要關頭”（緊要關頭是指有的皇帝就要因忍耐不住而趕人、打人、殺人的關頭），唐太宗卻常常把氣按住，不生了。

唐太宗和魏徵之間，常常有一些有味兒的故事：

有一次，唐太宗要到南山去，都準備好了，剛要出發，魏徵來了，唐太宗立刻裝做沒事的樣子，因為他知道魏徵是反對他去南山的。但是魏徵很直爽，他問：“聽說皇上要去南山，怎麼沒走呢？”唐太宗說：“本來是要走的，因為怕你生氣，所以決定不走了。”

又有一次，唐太宗正在玩一隻鳥，正好魏徵進來了，唐太宗怕給魏徵看到他在玩，不好意思，趕快把鳥藏在胸前的衣服裡。魏徵說了一大堆話才走，唐太宗趕緊把衣服解開，可是鳥已經悶死了。

關於魏徵的故事，後代的人都很嚮往。有一次，元朝的英宗跟大臣拜住說：“我們這個時代，可還有像唐朝魏徵那樣敢說話的人嗎？”拜住回答說：“什麼樣的皇帝，才有什麼樣的大臣。一個圓的盤子，水放進去，是圓的；一個方的杯子，水放進去，是方的。因為唐太宗有度量肯‘納諫’，所以魏徵才敢說真話，才肯說真話。”元英宗聽了，很以為然。

所以，還是皇帝重要，碰到一個壞皇帝，你亂多嘴，脖子上不挨刀，那才怪！

有一部古書，它是中國的“十三經”之一，叫《禮記》，

裡面有一段話，是告訴做臣子該如何勸皇帝的。《禮記》說：

“對皇帝，你要勸他；他不聽，再勸他；再勸不聽，第三次勸他。第三次勸他他還不聽，你就逃掉算了；但是對你的爸爸媽媽，你的態度就要不同了。對父母，你要勸他；他不聽，再勸他；再勸不聽，第三次勸他。第三次勸他還不聽，你不能逃掉，你要哭哭啼啼的跟着他，到他聽了你的話為止。”

《禮記》這一段指示，其實許多古人都沒聽它。古人中有的勸皇帝，勸一次皇帝不聽，就嚇得不敢再勸了；有的勸三次不聽，他還是要勸，甚至要哭哭啼啼起來。

宋朝光宗的時候，他忽然不想上朝了。可是大臣們去請他，請得沒法，他只好出來，走到門口，忽然皇后把他攔住，說：“天好冷呵！我們喝酒去嘛！”皇帝一聽，就又不朝前走了。這時候，有一個大臣叫傅良的，立刻跑上前去，不管三七二十一，伸手拉住皇帝的衣服，不讓他回去喝酒。皇后氣起來了，大罵說：“你是不是要找死？”傅良聽了，立刻哭哭啼啼的說：“君臣如同父子，兒子勸父親不聽，一定要哭哭啼啼的跟着他！”

這個故事，說明了古代勸皇帝的人，並沒有一定的中央標準局勸法，並不如《禮記》所要求的，勸三次不聽，就逃掉。

有些古代的臣子們，他們勸皇帝，常常採取激烈的法子。有的拉皇帝的衣服；有的拉皇帝的馬；有的要表演自殺；有的拚命磕頭，磕的滿臉是血。有的皇帝對勸他的人很討厭，爲了怕人勸他做某件事，乾脆在做某件事之前，先來他個聲明，聲

明的文字常常是——

“有諫即死，無赦！”

（翻成白話是：“不要勸我呀！誰勸我我就宰誰，絕不饒他！”）

“敢有諫者，斬！”

（翻成白話是：“誰敢勸我，就砍誰的腦袋！”）

做皇帝的，本以為這樣“有言在先”，應該不再有人多嘴了，應該把那些長舌頭的男士們嚇唬住了，這樣一來，應該少去不少麻煩了。可是呀，沒用，還是沒用，還是有一些敢死隊前來衝鋒，來把脖子朝皇帝的刀下塞。例如楚國的莊王，說了誰諫就殺誰的，可是蘇縱還是要去勸他；又如晉國的靈公，也說了誰諫就殺誰的，可是孫息還是要去勸他。做皇帝的，簡直氣得沒法。

有些大臣看到皇帝做錯事，勸他不聽，常常要用無賴的方法去阻止。漢朝光武帝，本來要出去玩玩的，剛上車，大臣申屠剛勸他不要去，申屠剛的理由是：天下還沒平定，你皇帝大人怎麼好去玩？光武帝不聽，下令開車，申屠剛見皇帝不聽，立刻趴在地上，把頭塞在車輪子裡，意思是說：“你要不聽我的，我就不要活了！你乾脆用車把我壓死算了！你壓呀！你壓呀！”這麼一來，光武皇帝服了，只好不去玩了。

宋朝徽宗的時候，有一次大臣陳禾向皇帝說話，皇帝聽得不耐煩，氣得站起來了，陳禾立刻跑過去，拉住皇帝的衣服，說：“請聽我講完。”皇帝不聽，硬是要走，陳禾非要他聽，硬是拉住不放，結果裂帛一聲，皇帝的衣服被撕破了，皇帝大

罵：“你看，你把我衣服弄破了！”陳禾說：“你爲了不聽我的話，不在乎衣服；我爲了使你聽我的話，也不在乎腦袋！”皇帝很感動，特別叫人把被撕破的衣服保存起來，當做紀念品，當做一種鼓勵和象徵。

像這類當做紀念品，當做一種鼓勵和象徵的事，宋徽宗是有根據的。漢朝成帝的時候，一個叫朱雲的，本是陝西地方的一個小官，但他要求見皇帝。在大庭廣衆之間，皇帝接見了他。朱雲說：“現在朝廷的大臣，都是站着職位吃白飯、不管事的，都不能幫皇帝的忙，我請求皇帝給我一把劍，殺個壞大臣，好給這些人一點警告。”皇帝一聽，氣起來了，說：“這個小官，居然在朝廷上侮辱大臣，殺掉他！”於是左右的人跑來抓朱雲，朱雲用手攀住宮殿的欄干，死不肯放，別人用力一拉，結果連堅固的欄干都給弄斷了。朱雲大叫說：“我這回可跟比干等忠臣一起到地下去雲遊了，只不知道你們可怎麼辦！”這時候，將軍叫辛慶忌的，立刻跑到皇帝前面，磕起頭來，他說：“這個小官太直爽了，如果他的話說得對，不該殺他；如果說得不對，我們應該包容他。我願意以一條老命，來爲朱雲爭取他的命！”話說完了，辛慶忌就梆梆梆梆磕起頭來，磕個沒完，磕得滿頭是血。於是，皇帝氣消了，說算了。後來木匠要來換欄干，皇帝說：“不要換了，補一補就好了！就讓它那個樣子，做爲一種鼓勵，一種象徵。”

還有一種情形，表面上，皇帝准許臣子可以有話直說，原因卻不是由於皇帝度量寬大，而是怕外國人知道了，不好看。明朝仁宗時候，大臣戈謙勸他不聽，旁邊有人拍皇帝馬屁，知道皇帝討厭戈謙，特進馬屁要求把戈謙趕走，皇帝同意了。這時

候，一名叫楊士奇的，立刻勸皇帝說：“現在外國人來朝見皇帝的很多，這件事若傳到外國去，洋鬼子們就要說我們沒有度量，沒有自由了，這是不好的。”於是皇帝就算了。

另外一種情形，皇帝寬大是為了怕歷史，怕歷史家記他的不好。宋朝的太祖趙匡胤，喜歡打鳥。（那時候沒有獵槍，用的是彈弓。）有一天，玩得高興，左右報告說，有大臣為了急事來求見，皇帝叫人把這個大臣叫進來聽報告，聽了半天，只是普通的事情。宋太祖氣了，他問：“為什麼這種普通的事現在來報告？”那大臣答說：“我認為這種事並不普通，至少比打鳥還重要！”皇帝更氣了，立刻拿傢伙打這大臣的嘴，結果門牙兩顆，打掉在地上。那個大臣一句話也不說，只是彎下腰來，把門牙撿起，往口袋裡一放。皇帝奇怪了，問他說：“你撿門牙，是不是要到法院告我？”那大臣說：“我怎麼敢告皇帝？這件事，自然會有歷史家去寫！”皇帝一聽，笑了起來，下令送這大臣許多錢，表示抱歉。

歷史上關於臣子勸皇帝的故事，很多很多。為勸皇帝而挨刀流血的，也很多很多。可是一些不要命的臣子們，還是要一個接一個，勸個沒完。宋朝一位做過諫官的，叫做范仲淹，他曾有過“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名言，他還做過一篇《靈鳥賦》，高叫做為知識份子的人，要——

“寧鳴而死，
不默而生！”

表示一個人只有為“鳴”不計一切，才算是一個人。一個人要寧肯為“鳴”而死，也不要因沉默而活。在中國歷史上，向皇

帝諫諍的人，理由並不見得正確，目標也不見得遠大，但是他們的基本精神則是一致的，那基本精神就是：——

看到壞的，我要說；

不讓我說，不可以！

〔附記〕

有人拿諫諍事實與制度，來比擬言論自由的事實與制度，這是比擬不倫的。諫諍與言論自由是兩回事。甚至諫諍的精神，和爭取言論自由的精神比起來，也不相類。言論自由的本質是：我有權利說我高興說的，說的內容也許是罵你，也許是挖苦你，也許是尋你開心，也許是勸你，隨我高興，我的地位是和你平等的；諫諍就不一樣，諫諍是我低一級，低好幾級，以這種不平等的身份，小心翼翼的勸你。

傳令——全國大跑馬

古代皇帝常常向四方諸侯發命令，命令很多，很怪。

有時候，皇帝向四方諸侯要錢；有時候，叫四方諸侯挑選漂亮的女孩子；有時候，皇帝得了盲腸炎，躺在“龍牀”上，哼呀哼的，叫四方諸侯從四面八方趕到京城來，來看他病，聽他哼呀哼。

但是，四方諸侯有的在很遠很遠的地方，皇帝叫他，他聽不到，皇帝沒有麥克風，有也不行，太遠了。他照樣可以耍賴皮，裝聾，裝孫子。

當然皇帝也沒有電報、電話、電視，不但沒有，皇帝甚至不能想像這些玩藝是怎麼一回事。

當時有些聰明人，整天把枕頭墊得高高的，躺在牀上想，想來想去，想他們的白日夢。

他們居然想出一種“千里眼”，可以看到一千里外，他的丈母娘；他們又想出一種“順風耳”，可以聽到一千里外，他的丈母娘在罵他。

可是這些只是“想”，只是“夢”，壓根兒沒實現過。

我們的老祖宗很容易滿足，他們只想想就算了，他們懶得

花腦筋。他們不會用腦筋去發明望遠鏡或電視機，也不會發明麥克風和電話，他們只會用腦筋去“神遊四海”，用腦筋去歌頌“精神文明”，歌頌“形而上”的“道”。

可是聰明人這樣做可以，皇帝這樣做卻不可以。

皇帝要統治全國，皇帝要發脾氣，皇帝要叫人知道他在發脾氣，皇帝要得盲腸炎。

於是皇帝叫道：“來人哪！你們各地的諸侯派代表來，站在我身邊，替我傳話給你們！”

於是，各地的諸侯都派了代表。

皇帝高興了，他為代表們蓋了官邸，整天朝他們下命令。

代表們一接到皇帝的命令，立刻忙得頭昏眼花，大家趕忙把命令轉出去，轉給四方諸侯，這種來自京師官邸內含命令的報告，稱做“邸報”。

這種邸報，就是四方諸侯專用的消息，很像是今天政府的“官報”。當時這種官報，讀者非常有限，小百姓根本沒得看，他們至多看看牆上的政府告示，或是聽聽傳說和謠言，他們對政治沒興趣，他們的口號是——

“日出而作，

日入而息，

鑿井而飲，

耕田而食，

帝力於我何有哉！”

這種人生觀，翻成白話，就是——

“天亮就工作，

天黑就上牀，
納稅又完糧，
皇帝管他娘！”

可是，小百姓可以不管皇帝，四方諸侯卻不能不管，因為他們有了專用的“官報”看，不能再裝聾了。所以，“官報”一到，四方諸侯的眉毛就皺起來，皺得像老太婆的臉，非用熨斗來熨平不可。

唯一的好處是，四方諸侯雖不能裝聾，卻可以偷懶。因為“官報”來得很慢，一般情形，“官報”每天只能走三百里。往往一條命令，十天半月才能到四方諸侯手裡，那時候，皇帝可能氣消了，盲腸炎也好了。

所以，四方諸侯可以“拖死狗”，事情一來，就先給它一拖，不肯講也不必講辦事效率，拖到大事化小，小事化無。

所以，歷來中國官場中的一個大特色，就是不講辦事效率，不肯講也不必講辦事效率，辦事總是慢騰騰的，好像沒睡醒一樣。

但有的時候是例外，——那就是大家搶官做的時候。大家都想做官，做大官，再升官。

可是官太少了，人太多了，你坐了這個官，我就做不成了，所以我要搗你的蛋。

漢昭帝時，一天諸侯燕王忽然派人來，向皇帝上書告了大臣霍光一狀，說他檢閱羽林軍準備造反。霍光嚇得躲在家裡，不敢見皇帝。皇帝那時候才十四歲，可是很聰明，他把霍光找來說：“你不要怕，我知道你是冤枉的，你檢閱羽林軍的事還不到八天，燕王怎麼會知道呢？可證明有人從中搞鬼。”於是

霍光便無罪了。

這個故事告訴我們，當時沒有電報電話飛機火車，所以消息傳得非常慢。

當時傳送消息的工具是“驛”和“馬”。“驛”就是今天的車站，站裡養了很多“馬”，一有消息，就騎馬跑。跑了三十里有一個“驛”，於是連人帶馬都可以休息，或者換人換馬再繼續跑。這樣跑，一天可跑十個驛（三百里）。不過遇到緊急和機密的公事，爲了保密起見，往往把公事封在“郵差”背後，蓋上大印，非到目的地，任何人不准碰，於是快馬加鞭，限時專送，一天跑五百里。這時候，這個郵差就苦了，一驛一驛的跑過去，換馬不換人，跑到後來，郵差支持不住了，於是驛站的人（郵政局長），乾脆把他（郵差）綁在馬背上，反正那條路馬跑熟了，識途老馬可以不由人操縱，而把昏倒或死掉的郵差帶到目的地。所以那時候，誰都怕做綠衣人，絕不像現在這樣搶破頭。

這些苦命的綠衣人，和今天的綠衣使者一樣，不但送信，還可以送包裹。唐朝玄宗（明皇）的小心肝楊貴妃，住在京城（陝西長安）裡，嬌滴滴的，整天朝唐明皇要東西吃。可是她要的東西都在京城附近買不到，她喜歡吃荔枝，荔枝產在廣東佛山，當時爲了滿足楊貴妃的口福，只好動用大量的快馬與騎士，接力賽跑式的，日夜不停傳送新鮮荔枝。一看遠處的快馬來了，塵土飛起來了，楊貴妃就笑了，所以荔枝又叫“妃子笑”，這個典故，起源在唐朝詩人杜牧的兩句詩——

“一騎紅塵妃子笑，
無人知是荔枝來。”

不錯，沒有人知道快馬運來的是荔枝，但是沒有人不知道人和馬的血汗與辛酸。那時候的郵差，真他媽的太苦了！

上面說到古代的车站叫做“驛”，這是指一般的情形說的。這一類的名目，還有一些別的。例如有一種叫做“亭”的，是秦朝、漢朝最流行的“車站”。每個“亭”都有個“亭長”，亭長除了是郵政局長以外，還是旅館老闆、警察局長、調查站站長。亭長有時候會因執行職務而殺人，有時候會利用職務而謀財害命，有時候也做好事，幫助一些無家可歸的流浪漢。漢朝最有名的將軍韓信，在年輕時候，就靠着南昌亭長吃過飯，後來亭長的老婆不給他飯吃了，他才跑掉。

漢朝的亭大概近三萬個，和亭配合設立的，有一種叫做“郵”，“亭”是十里一個，“郵”是五里一個。當時習慣也連在一起，叫做“郵亭”。這“郵亭”兩個字，直傳到今天，還在用，可是意思已經不同了。

“驛”在唐朝，有一千六百多個，有的驛很小，只有八匹馬；有的驛就很大，有七十五匹馬，多得可以開一家跑馬廳。唐朝法律對驛的規定很多很多，多得很好玩，例如說：

- 一、從驛中騎馬的，要憑“符券”才成，這等於現在的“先買票、後上車”。沒票騎馬的，處一年徒刑。
- 二、有“符券”了，還得在一定時間內騎馬，過時不候。好像今天買票，“限當日有效”。
- 三、只用一匹馬就行的，若多用了一匹，處一年徒刑。
- 四、多跑了路，跑了冤枉路的，多跑一里，多打一百下屁股。
- 五、該換馬的時候不換馬，打八十下屁股。這叫做“虐待動物”。

六、不該帶的東西多帶了，叫做“超載”，也是“虐待動物”，多帶一斤，打六十下屁股。

七、犯上面各種錯誤，毛病都出在騎的是馬；若騎的不是馬而是驢，那麼罪就輕一點，被處罰的時候，可打八折。

爲什麼要有這些嚴格的規定呢？這是由於古代的驛，本是爲了行政上和軍事上的原因而設的，有關國家大事，所以不能馬馬虎虎。誰要馬虎，就打誰屁股，或者就把誰關起來。

宋朝的時候，驛的情形有四種：

一、步遞——用人走路來送消息。

二、馬遞——用馬。

三、急腳遞——用快馬。

四、金字牌急腳遞——用快馬加木牌。

最後兩種，要加以說明。所謂“急腳遞”，是用快馬來跑，每天可以跑四百里，本來已經很快了。可是，爲了行政上和軍事上的原因，有時候，還嫌“急腳遞”不夠快，因爲“急腳遞”常常在路上碰到一些擋路的，由於“交通擁擠”，難免耽誤時間。這時候，就有人發明一種花樣：用一塊木牌，上面漆上金字，放在馬背上，由於反光的緣故，老遠便可以看到金光閃閃，這時候，路上的其他人員車輛，就得趕快讓開，因爲人人都知道“金字牌急腳遞”來了，還是趕快讓開爲妙。

現代的警察車、救火車、救護車，走在路上噹噹亂響或哇哇怪叫，就好像古人的“金字牌急腳遞”，大家一聽到一見到，就會讓開。

現代的國賓護衛儀隊，在馬路左右兩旁由摩托車嗚嗚開

道，不許你先走而要你讓他先走，也好像是古人的“金字牌急腳遞”。大家一聽到一見到，也就趕快自認倒霉，乾脆讓開。

歷史上最著名的“金字牌急腳遞”的故事，就是“十二道金牌”的故事。

宋朝的將軍岳飛，本來在北方正和金人打仗，後來朝廷方面主張跟金人講和，所以要用最迅速的方法，趕忙把岳飛弄回來。那時候用的最快的方法，就是掛着金牌的急腳遞。當時宋朝政府一連用了“十二道金牌”來催岳飛，急得簡直用快馬跑成了一條線。於是，岳飛只好回來了。

用快馬去跑，當然是一個很笨的法子，可是中國的古人們，實在沒有更好的法子，他們沒有電報、電話、電視，也沒有飛機和火車，也沒有汽車和摩托車，他們若要辦急事，急辦事，或事急辦，只有倚靠快馬加鞭。

像岳飛這種將軍，現代處理起來就方便多了。韓戰時候，在前線的將軍麥克阿瑟，也和岳飛一樣，要“直搗黃龍”的（黃龍是現在的中國東北地方），當時美國總統杜魯門，把麥克阿瑟弄回去，由於科學進步，他只打一個電報就夠了。科學真是了不起，也真可怕，它可以增加統治的效率，使命令傳達得快快快。所以現代的人做將軍，就沒有古人過癮，因為他只聽到電報機的的的答答，再也看不到跑馬的答答答答了。

到了元朝、明朝和清朝，驛站的情形，更大規模的發展起來，一直發展到清朝後期，接受了近代科學的通訊設備為止，才慢慢淘汰了古老的驛站。

對增加傳達命令的速度，中國古人曾有過美麗的幻想。舊小說《水滸傳》中，曾說有一個叫戴宗的人，外號叫“神行太

保”。因爲他有一種秘密的魔術：——他有一種叫做“甲馬”的小東西，當把兩個“甲馬”綁在腿上，再做起“神行法”的法術，一天便能走五百里路；若把四個“甲馬”綁在腿上，再做起“神行法”來，一天便能走八百里路。至於說把八個“甲馬”綁在腿上是不是能走一千六百里路，《水滸傳》中沒有交代清楚，我們就只好亂猜了。就算是一天能走一千六百里路，又如何呢？在現代科學的高速進步下，一天一千六百里，已經是一個可笑的小數字了；但對於我們善於幻想的古人來說，卻已是一個不能想像的偉大速度。在製造速度一方面，我們的老祖宗，留下一個落伍的紀錄，在清朝末年的一件事情上，表現得最爲明顯。當清朝的大臣、曾國藩的兒子曾紀澤到俄國去，他的報告由電報打到上海，時間只花了一天；可是這個報告再由上海朝北京轉，就要花十天的工夫，因爲上海北京之間，沒有電報，只有船和馬。這件事，使當時大臣李鴻章起了大念頭，他立刻要求政府趕快設立電報局。從那個時候起，我們的國家，才開始多了的的答答的電報聲，少了的答的答的馬蹄聲。那個時候，已是公元一八七九年，距離發明電報的日子，已經晚了四十多年了！四十多年是一個多麼叫人落伍的日子呵！

新聞——報紙像雜誌

現代人早上一起床，就看報，一看報，就知道日本皇帝怎麼了；下午一睡醒，又看報，一看報，就知道日本皇帝的老婆（學名皇后）又怎麼了。現代人所要知道的事，從報紙上，一看就知道了。昨天地球上北極發生的事，今天地球南極的人就知道了；早上美洲發生的事，下午亞洲就知道了。消息的傳達，快極了。

古代人就不這樣了。

古代人，越古越沒有報紙看，消息傳得慢極了，慢得像老牛，甚至比老牛還慢。

古代人要知道消息，大多是用佈告和嘴巴。佈告和嘴巴太慢了，所以一件“新聞”，傳來傳去，傳到最後聽到的，已經變成“歷史”了。

古代人最早有報紙一點模樣的記載，是唐朝。當時的報紙，叫做“邸報”。

“邸”是什麼呢？和現在一般常用的“官邸”字眼一樣，就是“官邸”。不過這個官邸是專指四方諸侯在京城의辦事處。四方諸侯進京來的時候，就住在這種官邸裡；等到離京回去，

官邸仍有人代為聯絡、傳達，聯絡、傳達的文件，都是朝廷裡最新的消息，所以這種文件，就叫做“邸報”。

這種“邸報”，產生的時間，大概在一千兩百年前，在唐朝玄宗的時候。

除了“邸報”以外，還有一類名稱像“雜報”“報狀”“事狀”“朝報”等，也都可說是報紙的雛型。

到了宋朝以後，“邸報”越來越流行了。宋朝時候邸裡辦公的小職員們，整天打聽政治行情，一打聽到些捕風捉影，就趕忙寫在一張小紙上。比如說張三被皇帝打了一個耳光，李四被皇帝踢了一腳，王五腦袋瓜子上挨了皇帝飛來的一個茶杯。……總之，都是半真半假的馬路新聞，這些小紙當時叫做小報，非常受人歡迎。小報一來，大家齊聲歡呼，你搶我搶，就好像現在人們搶買“號外”一樣。因為這種小報的新聞不是官方發佈的，也不是新聞局長告訴記者的，所以難免不合當局的胃口，而要被查禁。

到了元朝，邸報中所記的範圍漸漸寬了。王家着火了等社會新聞也出現了。再到明朝的時候，由於宦官汪直等的當政，爲了怕他們的醜事外揚，曾經檢查其中內容，禁止邸報的流傳，這可說是郵電檢查和新聞封鎖的老祖宗了！

到了明朝崇禎皇帝十一年，一件重大的改變發生了，邸報不再用手寫了，邸報進了排字房，開始用活字板排印了。這是一個劃時代的大改變，這一年是一六三八年，距離今天，報紙進排字房，足足有三百四十年了。

清朝初年，有一家紙店叫“榮祿堂”，店裡的老闆跟政府的要員有點關係，透過要員，把傳出來的消息印成“京報”。

這些京報在京城裡，並不覺得稀奇，可是一帶到西北各省去，銷路就非常好。因為有利可圖，於是，所謂“報房”，紛紛成立了，就是今天的報館或報社。

當時的報紙不是一張或幾張大紙，而是一本像雜誌一樣的書。長九吋、寬三吋半，封面黃色，最多有十九頁，最少也有五六頁，用的是竹紙或毛太紙，木刻活體字排印，很不清楚。

京報的內容，可分三大部份：

- 一、“宮門鈔”——抄皇宮裡頭的消息。
- 二、“上諭”——皇帝的命令和告示。
- 三、“奏摺”——大臣向皇帝說的話、報的告。

這些材料，一到報紙編輯的手裡，就按照次序，一條條排將起來。報紙的編排很單調，沒有標題，你一定得全部看完，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想偷懶是不行的。

出報的時間是每天黃昏或晚上，所以等於是晚報。這種晚報在京師當天雖可以看到，但是外省就麻煩了，比如說浙江，可能三四個月後才能轉到，那時候，“新聞”可能早已變成“舊聞”了。

在清朝文宗咸豐元年（一八五一），一個有心人名叫張芾的，看到“京報”內容既簡陋，流傳得又慢，賣得不但貴而且不容易買。於是，上書給皇帝，請政府來辦報，結果被皇帝狠狠的罵了一頓，說這種意見“可笑之至”！

現在看來，真正“可笑之至”的，不是張芾，而是西太后的丈夫。

可是，我們不能怪咸豐皇帝，因為他壓根兒沒有這種觀

念。

過了八年（一八五九），又一個有心人出來了，他的名字叫洪仁玕，他是太平天國的軍師。他向天王洪秀全獻了一部《資政新篇》，其中有一部份勸天王設立“新聞館”，並在全省任命品行好的人做“新聞官”，職務要獨立，別的官兒不能管他。他這個建議，很有眼光，他所以有這種眼光，乃是因為在他家裡有幾個洋鬼子傳教士替他打派司。

一八九五年，中日甲午戰爭以後，中國人很覺得沒面子，連小日本都打不過。大家研究打不過的原因是：中國太落伍了，在新世界中完全跟不上時代。要跟得上時代的法子，一定要宣傳新思想，工具就是辦報。在當時，北京維新派官紳像文廷式等，辦了一家“強學會書局”，出版了一種《中外紀聞》的報紙，也叫做《中外公報》。這份報紙的最早贊助人，就是後來中華民國第一任想當皇帝的大總統袁世凱，他捐了五百塊錢做基金。五百塊錢在那時候，沒有能力買印刷機，所以報紙是用木板刻的，每天出一張，內容以社論為主，新聞反倒次要。主持這個報紙的實際人物，就是大名鼎鼎的梁啟超。

這個報，可說是有史以來，中國民間的第一份像樣的報。

當時的中國人，根本沒有訂報的觀念。所以這份《中外紀聞》，也不敢公開發行。它印了三千份，拜託並且買通送《京報》的報僮，每天隨着京報，“分送諸官宅”。可是，當時大家弄不清這份報是怎麼一回子事，老是疑心有甚麼陰謀送上門來。所以，即使白送，有人也不敢收。弄得報僮們也害怕了，覺得這個報，一定不是什麼好報，爲了怕連累，最後也拒絕代送了。

《中外紀聞》發行了半年，正巧當時御史老爺楊崇伊攻擊這個報，說它“誹議朝政”，請下令封它。於是皇帝就下令查封，並且把文廷式趕回家鄉去，還說永遠不再用他當官了。

《中外紀聞》被封門後，維新派的書局也被沒收、改組，變成了“官書局”，由孫家鼐主持，正式出版一種官報，這可說是中國最正式的官報，大名叫《官書局報》。用黃土紙做封面，長九吋，寬五吋，內容除了也有“上諭”和“奏摺”一類的東西外，還有一些世界新知識的翻譯。這個報紙爲了怕當政者不滿意，特別聲明凡是批評政治的和人物的文章，都不能登。雖然這個報如此委曲求全，可是到了“戊戌政變”發生，西太后還是把它看做傳播新知識的眼中釘，還是停刊了。

西太后雖然不許別人辦報，可是她卻不得不承認：報紙這件東西，也有它的好處。所以，在八國聯軍以後，她也想辦報了。（甲午戰爭那一次，被日本一個國家打敗，中國人氣得想辦報；這回八國聯軍一次，被八個國家打敗，中國人當然更氣得想辦報了！）

西太后辦的報叫《政治官報》（後來改名叫《內閣官報》），這個報，還是雜誌的形式，不過裡面的花樣多了：“上諭”“奏摺”“電報”“法制章程”“條約合同”“外事”“廣告”等，都是基本內容。它的宗旨是：“凡私家論說及風聞不實之事，一概不錄。”顯然是針對以前《中外紀聞》裡“社論”而發的。這個《政治官報》，只是要報導政治，並不是要談政治，所以要議論的，免啦！

專制政府不歡迎辦報，可是愛好自由的人卻要辦。他們辦報，找到了一個好地方，就是租界。租界是專制政府管不到的

地方，是大城裡面一些由洋鬼子管轄的地區。專制政府欺負自己人很拿手，可是欺負老外卻不行，手反被拿，只好同意洋鬼子在中國大城裡劃分勢力範圍，割據稱雄。洋鬼子有新聞自由的傳統，歡迎辦報，中國知識份子就在租界大辦特辦起來，其中最有名的，是《蘇報》。

《蘇報》是章炳麟（太炎）、蔡元培、鄒容這些老少革命黨辦的報，他們在上海租界裡攻擊專制政府，罵滿清皇帝是“小丑”等等，越罵越高興。罵得專制政府吃不消了，秘電這個地區的封疆大吏說：

“滬上各報內，蘇報近更狂吠，愈無忌憚，着即拿辦。轉飭密派幹役，將單開各要犯分別嚴拿，務獲稟辦，毋稍洩漏疏虞，致被免脫。”

專制政府雖然大喊拿人，可是不得洋鬼子同意，拿不進去。專制政府於是跟洋鬼子打商量，洋鬼子也買幾分賬，但一看專制政府的嚴刑峻法，卻不能贊同。原來專制政府“寬大”得沒有“出版法”，只有“造妖書妖言”“大逆不道”等的罪名，要用這些法律辦人，就如意算盤如下：

“章炳麟作造書並革命軍序，又有駁康有為之一書，污蔑朝廷，形同悖逆；鄒容作革命軍一書，謀為不軌，更為大逆不道。彼二人者，同惡相濟，厥罪惟均，實為本國律法所不容，亦為各國公法所不恕。查律載：不利於國謀危社稷為反，不利於君謀危宗廟為大逆；共謀者，不分首從，皆凌遲處死。又律載：謀背本國潛從他國為叛；共謀者，不分首從，皆斬。又律載：妄佈邪言、書寫張貼、煽惑人心，為首者斬

立決，爲從者絞監候。如鄒容、章炳麟照律治罪，皆當處決。今逢萬壽開科，廣佈皇仁，援照擬減，定爲永遠監禁，以杜亂萌而靖人心。俾租界一羣不逞之徒，知所警惕，而不敢爲匪，中外幸甚。”

這下子把老外給嚇壞了，老外沒想到“禮義之邦”的法律竟這樣野蠻。照專制政府的法律，要“凌遲處死”，就是一刀一刀剮死，幸虧統治者過生日，優待，改爲“永遠監禁”，就是無期徒刑。這樣重的刑，洋鬼子是看不過去的。所以，洋鬼子只肯抓人，要辦人、要審人、要關人，都行，可是都得由他們代辦，拒絕引渡。私下裡，他們還通知章炳麟等人：“趕快跑”！

章炳麟是書獃子，不肯跑，被抓去了；鄒容跑了，可是忍不住吳敬恆（稚暉）挖苦他的風涼話，自行投案，也關到牢裡。小型文字獄判下來，章炳麟三年，鄒容兩年。鄒容年紀輕，黑獄亡魂，受不住氣，結果死在牢裡，嗚呼二十歲，時間是一九〇三。

專制政府開始有“出版法”，包括“大清印刷物專律”（一九〇六）、“報章應守規則”（一九〇六）、“大清報律”（一九〇七）。這些出版法除了採取“預審制”以外，其他倒也寬大。例如要想辦報，不論張三李四，只要

- 一、年滿二十歲以上之本國人。
- 二、無精神病者。
- 三、未經處監禁以上之刑者。

就可以在發行二十天以前，向衙門一呈報，繳點保證金，開始言論。絕不會藉口報紙太多了，不許你登記。專制政府許你辦

了，他來封：絕不會根本就不許你辦。

中華民國成立，內務部（內政部）的大官人，忽發雅興，擬訂了“暫行報律”三條。臨時大總統孫中山，立刻發佈“令內政部取消暫行報律文”，予以痛斥：

昨據上海報界俱進會及各報館電稱：接內務部電，詳定暫行報律三章，報界全體萬難承認，請轉飭部知照等語。案言論自由，各國憲法所重，善從惡改，古人以爲常師，自非專制淫威，從無過事摧抑者。該部所佈，暫行報律，雖出補偏救弊之苦心，實昧先後緩急之要序。使議者疑滿清箝制輿論之惡政復見於今，甚無謂也！”

這是一篇劃時代的文獻，它告訴中國人，現在是自由民族的時代了，“滿清箝制輿論之惡政”，已經不會也不該“復見於今”了。這一天是中華民國元年三月九號，這是一個偉大的日子，每一個孫中山的信徒，都該想到在這日子裡的這個啓示。

這篇文獻發佈後兩年零二十四天，袁世凱公佈了“報紙條例”，取消了“預審制”。從此，中國的報紙，在不斷的種種法律夾道吆喝中活下去，它們歷經了袁世凱“出版法”（一九一四）、“管理新聞營業條例”（一九二五）、“出版條例原則”（一九二九）、“出版法”（一九三〇）。……雖然任重道遠，可是總還混得活。直到“報閥”出來，天下一統爲止。

回憶中國的報紙史，真叫人發思古之幽情，令人懷念那些脫法而出或逍遙法外的“老祖宗報”。

前面談的中國報紙，不外是兩類，一類是老百姓辦的，一類是做官的辦的。在這兩類之外，還有一種報紙（就是雜誌），

是外國人爲中國人辦的，也很重要。最早的有一八一五年（中華民國前九十七年）出版的《察世俗每月統計傳》，這是一個怪名字。其實它的英文名字的意思，就是《中國每月雜誌》。這個報每月出版一次，內容有宗教、科學、歷史、地理、商業等等。五花八門，名堂很多。這個報是洋鬼子傳教士和中國基督徒梁發等人辦的，梁發可說是中國有史以來正式廁身報界的第一人。這個報，一直辦了六年半，到一八二一年才停止。

現在我們所看的報紙，都是前面這些“老祖宗報”以後的產品，所以只是一些“小孫子報”。這些“小孫子報”的最大特色，就是它的版面變大了，大得像一張報，而不再像一本雜誌。現在如果你有機會，看到“老祖宗報”的時候，你絕對不會以爲那原來是一份報，你一定以爲那是一本雜誌，其實那才是報——道道地地原原本本的報，你可別認錯了。

徵兆——來頭可不小

中國人幾千年來有一個大傳說，人人都信。

這個傳說就是：凡是有點名兒的人物，他媽媽生他的時候，都不簡單。

所謂不簡單，是他媽媽生他的時候，他的家人總要碰到些怪事，或是看到些怪光，或是聽到些怪聲怪調，或是做些怪夢，……總之非常那個。

所以大人物，生起來皆嚇人倒怪。

可是，中國人並不說這些事情怪，他們說這是“祥瑞”，祥瑞就是“可喜可賀的徵兆”。

每個大人物生時都有“可喜可賀的徵兆”，這叫“生有異稟”。

所以，按照這種說法，一個人到世界上來，若來得稀鬆平常，那就前生注定沒發展。

所以，你看到這裡，應該趕緊把這本書放下，快到廚房去，問問你媽，你生下來的時候，她跟你老子有沒有碰到些怪事？看到些怪光？聽到些怪聲怪調？或是做了些怪夢？

如果她說沒有，你千萬拜託她仔細想想看，如果實在一點

也沒印象，那你就糟啦！——你這輩子，休想成大人物啦！

你若不服氣，請看下面的一些傳說：

老子——傳說他老先生生的時候，是騎着一頭白色的鹿到媽媽肚裡的。

孟夫子——他媽媽生他，夢神人攀龍鳳，自泰山來。鄰居看到五色雲，罩住孟家。

蕭何——他媽媽生他，是“感昂星之精”。

張良——他媽媽生他，是“感弧星之精”。

樊噲——他媽媽生他，是“感狼星之精”。

程咸——他媽媽生他以前，夢到“白頭公”拿藥給她吃，並且說：“服此當生貴子。”於是她吃了，就有了孕。

劉元海——他媽媽生他以前，夢到兩條大魚，後來魚變成 人，給她一包東西，說吃了以後，可以生貴子。於是她吃了，懷胎十三個月，才生劉元海。

徐陵——他媽媽生他以前，夢到有五個顏色的雲彩，化成鳳，站在她左邊肩膀上，於是就有了孕。

梁昉——他媽媽生他以前，夢到五個顏色的彩旗子，旗子四角掛了鈴，一個鈴掉在她懷裡，於是就有了孕。

李白——他媽媽夢到“長庚星”跑到懷裡來。

劉濟——剛生下來，老媽子看到一條“黑氣勃勃”的大蛇，後來就變成他。

楊大年——他媽媽夢到是仙人託生，結果生下一條小鶴，再變成他。

劉法——他媽媽生他時候，蚊帳掉下來了，出現一條大蛇，他出生後，再找大蛇，只剩下蛇皮了。

岳飛——他生的時候，屋裡飛來一隻大鵬鳥，所以他的名，就叫“岳飛”；他的字，就叫“鵬舉”。

文天祥——他生的時候，他的爸爸（這回不是媽媽）夢到文天祥乘着紫雲而下，所以他的名字，就叫“雲孫”。

張居正——他媽媽夢到青衣童子繞牀，因而懷孕。

鄭成功——他生的時候，他媽媽夢到在岸上看大魚，一船衝上來，衝到肚子裡。

曾國藩——他生的時候，他的曾祖父（這回不是爸爸）夢到一條“神虬”從天空下來，全身發金光。

上面隨便舉的例子，都是跟歷史上的大人物有關的“徵兆”，你看了，一定覺得很奇怪了。可是，更妙的還在後頭。歷史上，比上面這些大人物更顯赫的人物，是皇帝，關於皇帝的徵兆，也就更多。據說所謂皇帝，是上天的兒子，是“天子”。既然所謂天子，來頭應該更大，現在我們就來看看一些天子的來頭吧：

夏朝第一個皇帝時候，郊外有青龍。

商朝祖先的媽媽，在野外洗澡的時候，正巧有一隻鳥下蛋，她檢來吃了，就有了孕。

周朝祖先的媽媽，在野外玩（好像他們的媽媽都喜歡在野外玩），看到一個巨人的腳印，她在腳印上踩了一下，就覺得有孕了。後來生了兒子，她認為不吉祥，就把兒子丟在路上。可是路上馬走過來，牛走過去，都躲開這個兒子，不敢碰到他，於是這個媽媽又把兒子帶到樹林裡，放在一條結了冰的河上，可是這時候，有鳥飛過來，用翅膀遮蓋這個兒子。天意已明，這個媽媽感到她的兒子不簡單了，就把他抱回家裡來。

周朝的武王建國的時候，有白顏色的魚，跳到武王的船裡面，又有紅顏色的烏鴉，表示“祥瑞”。

秦朝祖先的媽媽，在織布的時候，有鳥下了蛋，她檢來吃了，就有了孕。

漢朝高祖劉邦的媽媽，常常在野外的大湖邊睡覺，夢到神仙。一天，她的丈夫去看她，卻看到有龍趴在她上面，她就有了孕，生出漢高祖來。漢高祖長大後，喝酒後睡覺，有人看到他上面有龍（龍是“天子”的象徵）。

後漢光武帝劉秀，生的時候，有滿屋子紅光。那一年縣界長出嘉禾，一莖九穗。所以起名“秀”。

三國魏文帝曹丕（曹操的兒子），生的時候，有雲氣青色，圓如車蓋，整天罩在他頭上。

晉朝元帝，生的時候，“有神光之異，一室盡明。”

南北朝宋武帝劉裕，生的時候，有神光照亮房子，甘露下降。

南北朝梁武帝蕭衍，他媽媽夢到抱住太陽，不久就懷孕生他。他一出生，右手就有個“武”字。

南北朝北魏道武帝拓拔珪，他媽媽生他的時候，夢到太陽從屋裡出來；生的當天晚上，天上發亮光。

南北朝北齊文宣帝高洋，他媽媽懷他的時候，每天晚上有紅光照進屋裡來。

南北朝北周文帝宇文泰，他媽媽懷他的時候，夢到抱他升天，可是沒升完，就醒了。醒後把夢告訴了老公，老公高興說：“雖不至天，貴亦極矣！”生的時候，有黑氣如蓋，下覆其身。他背上有黑子，黑子且成圖案，像條盤龍。他臉上又有紫

光，叫人看了心裡發毛。

隋朝文帝楊堅，他媽媽生他的時候，一屋子紫氣。來了個尼姑，說這小傢伙不簡單，幫忙照顧。他媽媽抱他，忽然看到他頭上生出角來，混身長出鱗片，嚇得把他掉在地上。尼姑跑進來，說，小朋友給嚇到了，將來他得天下要晚一點了。（他得天下時，已四十八歲。）他手上有個“王”字，但不知道在那一手。

唐朝太宗李世民的時，有兩條龍在房門外玩，連玩三天。李世民四歲的時，有個書生說會看相，看了李世民，說有天子相。唐高祖怕洩露，要殺這書生，可是書生忽然不見了。

五代後梁太祖朱全忠，他生的那天晚上，家裡有紅氣上升，鄰居跑來叫說：你們朱家着火了。他小時候，家裡很窮，媽媽帶他住在老劉家。劉家老太太告訴家人說：“朱三那小孩子不是常人，你們可要對他好啊！”人家問憑什麼？老太太說：“我看過他的睡相，睡的是一條紅色的蛇。”

五代後唐武皇李克用，他媽媽懷胎十三個月，生的時候難產。大家跑去買藥，碰到一位“神叟”。這位神老頭說：“巫醫幫不上忙的。趕快回家，大家要全付武裝，騎馬敲鼓，環繞李家三圈才成。”於是照辦，果然生產不難了，“紅光燭室，白氣充庭，井水暴溢”的情形下，李克用出世。後來李克用摟着妓女睡大覺，有人要行刺他，走到牀前，看到牀上一團烈火，嚇跑了。李克用的第二代，後唐莊宗李存勖，也來路不凡。他媽媽懷他的時候，“常夢神人黑衣擁扇夾侍左右”。生的那天，有紫氣從窗戶冒出來。

五代後晉高祖“兒皇帝”石敬瑭，他媽媽生他的時候，“有白氣充庭”。

五代後周太祖郭威，他媽媽生他的時候，“赤光照室，有聲如爐炭之裂，星火四迸。”

宋朝太祖趙匡胤，也照有紅光不誤，他媽媽生他的時候，“赤光繞室，異香經宿不散。體有金色，三日不變。”

元朝祖先的媽媽，守寡的時候，夢到一道白光，從天而降，化爲金色神人，走到牀前，立刻有孕生子。

元朝太祖鐵木真，生下來的時候，手握一把血塊，像紅色的石頭。

明朝太祖朱元璋，他媽媽懷他的時候，夢到神送一藥丸，放在掌中有光，吃下去，醒了，口裡有香氣。生的那天，紅光滿室，夜裡光露出來，鄰居以爲着火了，跑來救。

清朝祖先的媽媽，說是天女下凡，吞了朱果，不夫而孕，生了先祖。先祖生下來就會說話。

以上這些歷朝各代的來頭不小的神話，都表示了一個幻想的事實，就是“凡是有點名兒的人物，他媽媽生他的時候，都不簡單”，都有“祥瑞”。

祥瑞是表示這個人的來頭可不小，背後有鬼神撐腰。古人都疑神疑鬼的敬鬼神而不遠，（孔夫子勸人“敬鬼神而遠之”，其實沒人敢遠。）所以一個人一出生，就跟鬼神搭上關係，自然就得天獨厚，不由你不另眼看待，不由你不服。

祥瑞外一章是身體上的特徵，所謂“聖人皆有異表”。什麼“伏羲人身蛇首，神農人身牛首”，什麼“黃帝龍顏”，什麼“帝嚳駢齒”，什麼“堯眉八彩”，什麼“舜目重瞳”，什麼“禹

耳三漏”，什麼“湯臂三肘”，什麼“文王四乳”，什麼“武王望羊”，什麼漢高祖“左股七十二黑子”，什麼三國劉備“兩耳垂肩，雙手過膝，目能自顧其耳”，什麼司馬懿“面正向後，而身不動”，什麼晉元帝“白毫生於日角之左”，什麼南北朝陳武帝“日角龍顏，垂手過膝”，什麼唐高祖“體有三乳”等等等等，鬼話連篇，翻翻古書，就不難碰到。身體上的特徵，在古人看來，雖是祥瑞的一種，但一經科學檢定，就毫無道理。即以“舜目重瞳”為例，古代名流，重瞳的，帝王級有虞舜、項羽、王莽、呂光、李煜；臣子級有顏回、沈約、魚俱羅、朱友孜等人。但重瞳是什麼？只不過是白內障而已！如果重瞳算是偉人，那麼眼科醫生整天要被偉人煩死了。

在所有來頭可不小的鬼話中，最有代表性的例子是孔夫子的徵兆。孔夫子的媽媽到野外玩，玩累了，就在野地裡睡起來。做了夢，夢到黑帝和她性交。醒來就有孕，生下孔夫子。孔夫子生有全套異象：雙龍繞室，五老降庭，長得海口、牛脣、虎掌、龜脊、頭像尼丘山，名字就叫孔丘。胸前有“制作定，世符運”六個字。照古史說法，孔夫子是商湯的後人，五帝輪流做，本來該輪到商湯的後人的，可惜孔夫子被早生貴子，生在周朝，水火相沖，時不當令，所以只能為未來的漢朝制作法典——六經，自己不能做皇上，反倒幫了別人做了皇上。孔夫子有帝王之德而無帝王之位，與中國人相見恨早，結果功虧一簣。

中國帝王從漢朝以後捧孔夫子，大家只注意到捧孔夫子的儒家哲學跟統治者結合，卻忽略了孔夫子的神性背景跟統治者的串通，而不知道捧“作之師”的孔夫子本人，無異就等於捧

“作之君”的統治者自己。鞏固孔夫子的地位，就等於鞏固統治者自己的地位。

徵兆是中國人五千年來的只此一家大傳統，當然也是五千年來只此一家的大騙局。它的歷史太深了、太遠了，深遠得變成了一個堅固的騙人公式，大家一提到某某名人，就會公然用公式套他一下，明知是鬼話，可是誰也不敢說破，只要有利，誰也樂得相信，或者叫別人相信。你別以為這些是歷史了，才不呢，就是這套大哲學，使中華民國袁大總統世凱先生拋棄了總統，想改行當皇帝，爲了他相信他自己曾以“五爪大金龍”的正身，睡在過牀上。“真龍轉世”的大哲學，在上爲帝王將相，在下爲王元龍李小龍，以至看相摸骨的龍海山人，人人都多少反射到。你老兄一定也有這種傳統的荒謬反射，不然的話，你爲什麼老是在浴室鏡子裡，偷偷看你“主貴”的那顆痣？

吃人——動物吃人，人也吃人

你一定看過中國的一部小說《水滸傳》，《水滸傳》第二十六回是——

“母夜叉孟州道賣人肉

武都頭十字坡遇張青”

這回裡的“母夜叉”是指孫二娘，她開了一家黑店，“……蓋些草屋，賣酒爲生。實是只等客商過住，有那入眼的，便把些蒙汗藥與他，吃了便死，將大塊好肉切做黃牛肉賣，零碎小肉切餡子包饅頭。”

在第二十六回裡，你又可以看到宋江被強盜抓住後，強盜王矮虎大叫說：“孩兒們，快動手取下這牛子（指宋江）的心肝來，造三份醒酒酸辣湯來！”

在第四十二回裡，你又可看到“黑旋風”李逵在殺掉“假黑旋風”李鬼以後，“三升米飯早熟了，只沒菜蔬下飯。李逵盛飯來，吃了一回，看着自笑道：‘好癡漢！放着好肉在面前，卻不會吃！’拔出腰刀，便去李鬼腿上割下兩塊肉來，把些水洗淨了，竈裡抓些炭火來便燒，一面燒一面吃。”

這個吃人肉的李逵，早在《水滸傳》第四十回裡，就吃了人肉了：“只見黑旋風李逵跳起身來，說道：‘我與哥哥動手割這廝！我看他肥胖了，倒好燒吃！’晁蓋道：‘說得是。’教——‘取把尖刀來，就討盆炭火來，細細地割這廝，燒來下酒，與我賢弟消這怨氣。’李逵拿起尖刀，看着黃文炳，笑道：‘你這廝在蔡九知府後堂且會說黃道黑，撥置害人，無中生有，撥攬他！今日你要快死，老爺卻要你慢死！’便把尖刀先從腿上割起。揀好的，就當面炭火上炙來下酒。割一塊，炙一塊。無片時，割了黃文炳，李逵方才把刀割開胸膛，取出心肝，把來與衆頭領做醒酒湯。”

另一種等於吃人肉的，是用人肉來祭死人。如《水滸傳》第二十五回，武松對他哥哥武大郎，“將兩顆人頭供養在靈前”；第六十七回“將史文恭剖腹剜心，享祭晁蓋”等，都屬這一類。

上面這些吃人肉的故事，有的原因是經濟的（像賣人肉的孫二娘），有的是饑餓的（像吃李鬼的李逵），有的是嗜好的（像要吃宋江肉的王矮虎），有的是仇恨的（像以人頭祭死人）。吃人肉的原因，各有不同，唯一相同的是：人不但吃動物的肉，還要吃人的肉；不但動物吃人，人也吃人。

吃人肉的事，經濟的和饑餓的兩種原因，本來很接近。以漢朝爲例，單就《漢書》《後漢書》《資治通鑑》裡，我們就可看到這些嚇人的記錄：

一、漢高祖二年（紀元前二〇五）——“人相食，死者過半。”

二、漢高祖二年（紀元前二〇五）六月——“關中大饑，

……人相食。”

三、漢武帝建元三年（紀元前一三八）——“河水溢於平原，大饑，人相食。”

四、漢武帝建元六年（紀元前一三五）——“河南……父子相食。”

五、漢武帝鼎元三年（紀元前一一四）——“關東郡國十餘，饑，人相食。”

六、漢元帝初元元年（紀元前四八）——“關東郡國十一，大水，饑，或人相食。”

七、漢元帝初元二年（紀元前四七）——“琅琊郡人相食。”

八、漢成帝永始二年（紀元前一五）——“梁國平原郡……人相食。”

九、漢王莽天鳳元年（紀元一四）——“緣邊大饑，人相食。”

一〇、漢王莽地皇三年（紀元二二）——“關東，人相食。”

一一、漢王莽時——“北邊及青徐地，人相食。”

一二、漢光武帝建武元年（紀元二五）——“民饑餓，相食。”

一三、漢光武帝建武二年（紀元二六）——“三輔大饑，人相食。”

一四、漢安帝永初二年（紀元一〇八）——“州郡大饑，……人相食。”

一五、漢安帝永初三年（紀元一〇九）三月——“京師大饑，民相食。”

一六、漢安帝永初三年（紀元一〇九）十二月——“并涼二

州大饑，人相食。”

一七、漢桓帝元嘉元年（紀元一五一）——“任城梁國饑，民相食。”

一八、漢桓帝永壽元年（紀元一五五）——“司隸冀州饑，人相食。”

一九、漢靈帝建寧三年（紀元一七〇）——“河內人婦食夫，河南人夫食婦。”

二〇、漢獻帝興平元年（紀元一九四）——“人相食啖。”

二一、漢獻帝建安二年（紀元一九七）——“江淮間民相食。”

上面隨手所舉的例子，都是中國人吃人的歷史。這些殘忍現象的發生，主要的原因是荒年。還有一些人爲的因素，最明顯的，就是戰爭。

唐朝“安史之亂”，張巡、許遠的部隊，被安祿山的軍隊包圍在睢陽。後來因爲被包圍得太久了，東西都吃光了，戰馬、老鼠、麻雀等等都吃光了。於是大家互相換小孩子來吃（不忍吃自己的，所以互換）。小孩子吃光了，張巡竟把他的姨太太殺掉，他對守城的軍人說：“你們爲國家拚命，好久沒東西吃，可是你們仍舊忠貞。我自己的身體不能給你們吃，豈能可惜一個女人嗎？”於是，從吃張巡的姨太太開始，大家又拚命吃女人。女人吃光了，又吃男人。全睢陽城一共有六萬人，最後被安祿山攻破的時候，只剩下幾百人了。（張巡這種殺親人吃親人的做法，當然很有問題。因爲守城的目的是抵抗“没人性的”叛軍。但是自己竟連老婆都吃掉，所謂人性，又在那裡？）

又如唐朝僖宗的時候（紀元八八六），楊行密圍住廣陵城

(現在的揚州)，一圍就是半年。城裡的人都餓得吃不消了。軍隊公開抓人來賣，綑起來，像殺豬一樣的殺了吃肉。這又是一個殘忍的例子。

像這一類的例子，還多着呢！

唐朝昭宗天復二年（紀元九〇二），鳳翔城被朱全忠所圍，城裡公開賣起人肉來。人肉的價錢不如狗肉，狗肉每斤五百錢，人肉每斤只一百錢。

宋朝高宗紹興三年（紀元一一三三），杭州也有吃人肉的場面，同時還有了稱呼：瘦的男女叫“饒把火”；女孩子叫“下羹羊”，小朋友叫“和骨爛”，這些被吃的人，統一被稱做“兩腳羊”。

清朝仁宗嘉慶六年（紀元一八〇一），四川人羅思舉的部隊缺糧，於是開始吃俘虜，一共吃了三千五百多人！

上面最後一個例子是指吃敵人的肉。在歷史上，這種情形也很多。春秋、戰國時候，早就有這類事實。戰國時候，中山君對於私通外國的臣子，就要吃他的肉，還要一個人獨吞，不分給別人。

漢朝王莽被殺，幾十個人搶着吃他。

梁朝侯景死了，身體也被老百姓分吃。侯景的參謀王偉，也被公開烹掉，再被老百姓分着吃了。

隋朝煬帝把叛臣斛斯政烹死，把肉分給百官吃。

隋朝關西地方的薛仁果，恨庾立不肯投降，把庾立放在火上割掉，肉分給軍人吃。（庾立是文學家庾信的兒子。）

隋朝的張金襴，本在河北作亂，被官兵抓住，把他綁在架子上，由他的仇人吃掉。

唐朝武則天時候，一個兇狠的官吏來俊臣被斬，他的仇人爭着吃光他的肉。

唐朝玄宗時候，宰相楊國忠（嬌滴滴的楊貴妃的哥哥）被軍人殺掉，因為大家恨他，所以給吃掉了。

後晉時候，張彥澤被處死，老百姓搶着喝他的腦髓，又把他的肉吃光。

元朝世祖時候，一個叫阿合馬的討厭鬼被殺，當地軍民，高興極了，大家分他的肉，全部吃光。

明朝武宗時候的太監劉瑾（國劇中“法門寺”的主角），被殺的時候，老百姓恨他已極，竟花錢買他的肉來吃。

這些都是因仇恨而吃人肉的例子。

還有一種是嗜好性的，這些都是極殘忍的壞蛋。例如唐朝的大盜朱粲，就是個吃人精。他專門烹吃小孩子，也吃女人。他竟說：“食之美者，寧過於人肉乎！”他的感覺是：天下最好吃的東西，就是人的肉！

還有一個吃人精，是五代時候的趙思綰。他最喜歡人肝，還喜歡用酒吞人膽。他迷信吃人膽可以使自己膽子大，他說：“吞此千枚，則膽無敵矣！”

這一類的吃人精，歷史上還有很多很多。最殘忍的是元朝時候的“淮右軍”，這種軍隊最喜歡吃人。他們的吃法是把人捆在鐵架子上生烤，有的用開水來燙熟。殘忍的程度，真沒法寫出來。

除了上面各種吃人肉的情形外，另有一種特殊的例子，就是為了治病的理由。原來在中國的傳統裡，有一種迷信，叫做“割股救親”，就是認為在一個人生病的時候，若想病好，非得

吃病人自己親人的肉不可。這種認為人肉可以治病的迷信，是唐朝開始的。唐朝有一個叫陳藏器的，寫了一本醫書叫“本草拾遺”，裡頭指出人肉可以治病。此後慢慢流傳的結果，一般傻東東的小百姓也就真的相信起來。在爸爸媽媽公公婆婆生病的時候，就會有孝子孝媳們出來，用刀“割股”（割大腿上的肉），妄想用自己身上的肉，可以對親人的病，有一點幫助。他們的用心是好的，可是卻是蠢的。

歷史上關於割股治病的事，舉不勝舉。宋朝就有朱雲孫的太太劉氏，她的婆婆第一次生病的時候，由她的丈夫割股；第二次生病的時候，就由她自己割股了。在“宋史”裡頭，她是“孝婦”。

接着在元朝，也有這一類的例子。“元史”就記載着河南的秦氏姐妹，爲了替爸爸治病，姐姐竟鑿出自己的腦漿，妹妹也割下大腿的肉。腦漿是用來熬藥，大腿肉是用來煮粥，你說這種行爲蠢不蠢？

元朝還有割脇肉來爲親人治病的例子。割脇肉的人名叫胡伴侶，爲了治爸爸的病，才這樣做的。這種行爲，還特別得到政府的獎勵，你說這種政府蠢不蠢？（當時政府的獎勵，除了榮譽獎以外，還給絹五匹，羊兩頭，田一頃。）

割股的行爲，雖然動機是“孝”，但是跟中國傳統的“孝”的觀念比起來，卻是衝突的。中國傳統的“孝”的觀念是：一個人的身體、頭髮、皮膚，都是爸爸媽媽傳給他的，他不能也不敢毀了它們。這種行爲的最有名代表人是曾參（曾子）。曾子臨死以前，還戰戰兢兢的把自己全身檢查了一番，發現沒短少什麼，沒毀壞什麼，才覺得對得起自己的爸爸媽媽，才放心

的死去。還有一個例子是三國時候的一個將軍，傳說他在作戰時候，眼睛被一支箭射中了，他趕快一拔，眼珠子都被拔了出來。他當時大叫說：“身體是爸爸媽媽給的，不能丟掉，所以這顆眼珠子，我把它吃到肚裡去！”說着，就吃下去了。

既然傳統的“孝”的標準是不敢毀傷身體，“割股”的行爲，當然是和這標準衝突的，所以這種行爲，一方面可說是“孝”，一方面又可說是“不孝”。於是政府的處境，便感到很困難。紀元一二七〇年，元朝政府想出了一條法律，決定“今後遇有割股之人，雖不在禁限，亦不須旌賞。”這意思很明白，政府是決定既不阻止、也不獎勵了。

到了明朝、清朝，也沿着元朝，訂了很類似的法律，但是實行的並不徹底。政府有時候，還是要對這些愚蠢的孝子們“加恩准其旌表”，——政府還是忍不住要鼓勵！

上面這種割股的例子，有的不僅限於爲親人治病，有的竟還有政治作用在內，因而間接影響了歷史。春秋時候，晉文公在外面逃亡，他的大臣介之推，就割過大腿上的肉，給晉文公吃。另一個最富有政治作用的例子，是清朝的西太后。西太后就是慈禧太后，她雖是咸豐皇帝的老婆，但不是大老婆，大老婆是慈安太后。傳說咸豐皇帝臨死前，怕慈安被慈禧欺負，特別給慈安一個密令，內容說如果慈禧欺負人，就可以把她宰掉。咸豐皇帝死後，慈禧對慈安非常尊敬，目的就是要騙慈安，使慈安毀掉那個密令。有一天慈安病了，慈禧竟在胳膊上割下一塊肉來熬藥，送給慈安吃。慈安很感動，認爲慈禧簡直是她的親姐妹，對親姐妹，還要密令幹嘛？決定把密令燒掉。誰想到慈安把密令一燒，慈禧再也不買她的賬了，再也不聽話

了。後來傳說慈安的暴斃，還是被慈禧下毒的。說來說去，這一切，都是當時吃人肉惹來的麻煩。

總之，吃人肉，不管是什麼理由，都是一件荒唐的事情，真沒想到這種荒唐的事情，竟在中國歷史上，有着那麼多血淋淋的記錄。現在人唱“滿江紅”，唱到“壯志飢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竟然洋洋自得，大概是傳統老毛病的發作吧？不然的話，怎麼這樣莫名其妙？

喝酒——喝也不行，不喝也不行

清朝乾隆皇帝的時候，主編《四庫全書》的大文人紀昀（曉嵐），是一個大幽默家。他長得很怪：大禿頭、大鼻子、大耳朵、一對三角眼睛、兩行細眉毛——好像隔壁那少奶奶一樣。有一次，一個大富翁造了一幢大房子，聽說紀昀很有名氣，特地請他為這幢大房子起個名字。紀昀打聽出來這個大富翁本是鐵匠出身，後來發了財，十足一個暴發戶，暴發戶附庸風雅，他認為是可笑的。於是，他提起毛筆，為這幢房子起了一個名兒——“酉齋”。

大富翁歡天喜地的，把這兩個字捧回家去，見人就說：“這是紀大學士給我寫的！”可是，一當別人問起“酉”齋是什麼意思的時候，大富翁就愣住了，他怎麼猜也猜不出什麼意思；他偷偷查《康熙字典》，也查不出個所以然來；他問別人，別人也直搖頭，人人都納悶，大富翁更納悶，他不知道紀大學士搞什麼鬼。

終於有一天，他忍不住了，他望着這個“酉”字發呆，最後一狠心一跺腳，決定去找紀大學士。

紀大學士一看大富翁來，笑起來了。等到大富翁開口，問

起這個“酉”字，他笑得更厲害了。他說：“這個‘酉’字，有兩個意義，都是字典裡查不出來的：

第一個意義要直着看——酉——這好像是打‘鐵’用的鐵砧；

第二個意義要橫着看——𪚩——這好像是打‘鐵’用的風箱。

這兩個意義都符合你是鐵匠出身，所以這個‘酉’字，正好用來叫你這幢房子！”

這個故事主要建築在一個“酉”字上面，這個酉字在古字裡寫做——



本來的意義是釀酒的器具，下面是個缸，缸裡有原料，缸外頭有個蓋和攪動器，這就是今天的“酉”字，也就是“酒”字在沒進“文字美容院”以前的老模樣。

但是，酒這個東西，跟許多可愛的老公公一樣，愈老愈有味道，所謂“陳年老酒”，愈喝愈香。陳年老酒從酒窖裡搬出來，上面一層灰，所以在小篆裡，把陳年老酒寫做——



就是今天的“酋”字。後來這字慢慢抽象化，慢慢把管酒的官（煙酒公賣局局長）也叫做“酉”（“大酋”）了！

慢慢的，這個“酋”字又開始變，因為人人都愛喝酒，三杯下肚，酒意方濃，一看瓶裡，酒沒有了，於是着急了，於是開始找酒。你也找，我也找，最後找到一個能夠拿酒給大家過

癮的人，於是你高興了，我也高興了，大家都說這個人好，這個人可愛，在我們需要酒的時候他夠意思，能夠幫我們，我們歡迎他，乾脆擁護他做“總統”，——不對，那時候沒有總統；擁護他做“皇帝”，也不對，那時候沒有“皇帝”；擁護他做“領袖”，更不對，那時候還沒有領袖這個詞兒，他們擁護他做的是——“酋”長！

擁護這個人要舉雙手贊成，所以要——



這個字，表示兩個手在推舉“酋”。可是舉呀舉的，左面的手舉累了，所以放下來了，變成



這就是我們現在的“尊”字。我們平常說“尊長”、“尊師”，事實上，“尊”的並不是那個“長”，那個“師”，而是那個“尊”字上頭的酒罈子。

所以，如果有人說他“尊”敬你，爲了保險起見，你最好問問他媽媽，他是不是愛喝酒，如果他不愛喝酒，那他才真是值得你“尊”敬的；當然啦，在你“尊”敬他以前，他也該問問你媽媽，你是不是酒鬼。

因爲“酉”這個字這麼可愛，所以很多高貴的詞兒，都跟它扯上了裙帶關係，例如：

至尊——皇帝

祭酒——大學校長、教育部長。

這兩個詞兒比起來，“祭酒”比“至尊”事實上還來得神氣。

在宋朝的時候，“祭酒”（大學校長）可以跟皇帝面對面的瞪著眼睛，一點都沒有馬屁相。

在民國初年，“祭酒”（教育總長）蔡元培，當“皇帝”袁大總統世凱去看他的時候，他只在會客室接見袁大胖子，不許他亂“巡視”；聊天完了，大胖子要走了，他只送大胖子到會客室門口，絕不肯多走一步，更不會在大門口送往迎來拍馬屁了。

所以，“祭酒”比“至尊”來得神氣。換句話說，如果有一個“祭酒”，居然對“至尊”或“大官”幹送往迎來拍馬屁的醜態，他就沒有上一代人有骨頭。

“酒”字的歷史既然這麼久，喝酒的人既然這麼多，所以，在歷史上，酒所佔的重要地位，所發生的微妙影響，自然也就多得不得了。

酒在歷史上最早也是最大的作用，是它一開始就弄亡了兩個朝代。中國夏朝最後的皇帝叫桀（桀是他的姓，桀是他的名），據說，他後來造了一個大池子，全裝滿了酒，叫做“酒池”，整天喝呀喝的，結果把國家喝丟了；還有一個商朝的，也是最後一個皇帝，叫子受（子是他的姓，受是他的名，他又叫紂，一般人叫他商紂），據說後來他也造了一個大池子，全裝滿了酒，也叫做“酒池”，也整天喝呀喝的，結果也把國家喝丟了。

夏桀和商紂的故事，本來不必輕於相信，因為很可能是他們的敵人編造的。但是故事的一種作用，都值得我們注意，那就是喝酒過度的害處。

夏朝的第一個皇帝是傳說中治水的夏禹。夏禹有一次喝了

儀狄做的好酒，非常喜歡喝，可是他忍住了。不但忍住不再喝，並把儀狄趕跑了。（因為儀狄在，他又要做好酒。）夏禹戒酒以後，很感慨的說：“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但他絕沒想到，他自己的後世，就是一個個的酒鬼。夏朝的第三任皇帝叫太康，就因為“甘酒嗜音”（喜歡酒和披頭音樂），惹了大禍，最後到了夏桀，就鬧出傳說中的“酒池肉林”來，因而亡國。

由於一開始，酒就在中國歷史上創了大禍，所以，我們可以看到不少警告喝酒的文獻。文獻中最有名的就是“酒誥”，就是勸人戒酒的文章。

儘管勸來勸去，古代人還是喜歡喝酒，喝酒如故。

古代人喜歡喝酒，所以喝酒的名堂也最多，喝酒的傢伙，比現代人還豐富。以商朝而論，當時光是酒杯和裝酒的，就有許許多多花樣。要說，也說不清楚，你還是看看圖吧，或者到博物院去看看真傢伙。



這張圖裡，“尊”是裝酒的容器，“禁”是放酒的櫃，“勺”是盛酒的大匙子，“爵”“角”“盃”“罍”是把酒弄熱的工具。你看古人這些喝酒的道具多多！

在歷史上，喝酒是一種普遍的習慣，也是一種社交和禮節，這種風氣，一直演變到今天。但是在喝法上面，許多地方，已經不相同了。古人喝酒，很講究禮節，不能亂喝或亂不喝。該喝的時候，不喝也不行；不該喝的時候，要喝也不行，像漢朝高祖剛當皇帝的時候，他的大臣們以為大家打天下有功，拚命在朝廷上喝酒、爭功。結果，有一個叫叔孫通的出來，勸漢高祖制定一套規矩，不准大家亂喝酒。最後規矩訂了出來，大家就不敢亂來了。後來漢高祖死了，皇后有了權，皇后姓呂，呂家的人都擠到朝廷裡來。在歷史上，這叫“外戚當權”（外戚是外面的親戚，是呂后那一邊女家的親戚）。當時大臣許多都反對外戚，總想找機會幹掉他們，正巧有一天，呂后請客，派一個叫劉章的做“酒史”（就是主持喝酒的人）。劉章就是反對外戚的大將，他趁機說：“我是軍人，我為了維持秩序，請求皇后准許我用軍法來對付不守酒禮的人。”呂后答應了。於是大家喝酒。喝到一半，一個外戚喝醉了，發起酒瘋來，跑出去了，劉章真的軍法從事，立刻拔出寶劍，把這外戚殺了。從這件事開始，一套剷除外戚的計劃立刻行動了，最後劉家的天下保全了，呂家的外戚都吃不開了。

這個故事，不但證明了古代人愛喝酒，並且非常考究“酒禮”。喝酒失禮，是一件很嚴重的事，嚴重得要引發一次政變。

三國時候，有一次吳國的孫權請客，大家拚命喝喝喝。最後孫權親自來敬酒，到了虞翻面前，虞翻翻在地上，裝得醉得不能再喝了。等孫權走過去，虞翻又翻起來，表示沒醉。孫權一回頭，看到了，氣起來，拔劍就要殺他。這時，一個叫劉基的，趕忙跑過來，一把抱住孫權，說：“大家都喝了這麼多酒，

即使虞翻有罪，你也不能殺他。你殺了他，你怎麼對外面解釋？何況天下都說你度量寬大、能容人，你這麼一殺，什麼都完了！”於是，孫權才算了，虞翻才算爲了喝酒失禮，保住顆腦袋。

像這種因爲喝酒而出的麻煩，歷史上還多着呢！

晉朝時候，有一天，王導王敦兄弟到王愷家裡去吃飯，王愷是一個有名的兇煞神。他的習慣是拚命叫漂亮女人勸你喝酒，你喝不光，他就怪那個陪酒的女人，就要把她殺掉。當時王導怕陪酒的女人被殺，只有拚命喝酒；可是王敦卻不買賬，你要殺女人，就讓你去殺好了！

像這種殘忍的“酒”的故事，正說明了我們老祖宗們，正有一些根本不知道人權是什麼的暴徒，他們的殘忍行爲，也正是中華民族的恥辱。在另一方面，這個故事也又一次顯示了古人對喝酒時“不喝也不行”的心理，你看他們多愛酒！

有的古人愛酒，甚至爲酒鬧出了戰爭。楚國在古代是大國，有一次，向各國要酒。趙國爲了不給酒，竟鬧得自己的京城被圍。這種小題大做的例子，雖然可笑，也反證了古人多愛酒。

最有名的酒鬼，該是晉朝的劉伶。劉伶是晉朝的大名士，整天喝酒，然後光着屁股亂跑。有一天，他的太太把酒杯藏起來，要他戒酒。他說好，不過爲了表示鄭重，我要在神前發誓，你可置五斗酒來敬神。他的太太信以爲真，把酒買來了，不料劉伶卻在神像面前，叫着說：

天生劉伶，
以酒爲名。

一飲一石，
五斗解醒。
婦人之言，
慎莫可聽！

於是把敬神的五斗酒，也喝光了！

劉伶還有一個傑作，就是一邊喝酒一邊騎馬，後面叫一個人揹着鋤頭跟着他。他的說法是：“死便埋我”。他寧要醉着死，也不要醒着活。

還有一個醉死派是唐朝的傅奕。傅奕向他的醫生說：我死了以後，我的墓誌銘要這樣寫

傅奕，
青山白雲人也。
以醉死。
嗚呼！

還有一個三國時代的鄭泉（孫權的吳國人），臨死以前，要求把他屍體埋在做陶器的工廠旁邊。他說：“以後我的屍體真成了土，土又可被陶器工廠做成酒壺，那樣我多過癮呵！”

這是中國人愛酒的故事，也是中國人的幽默。

喝酒一件事，本來是一種享受，但是中國人卻把他過度禮節化，弄得反倒不自然，反倒逼出些縱酒吐酒的酒鬼。一個攻擊酒禮的故事，很有意思：鍾毓和鍾會兄弟小時候，以為爸爸睡覺了，一起偷喝酒。其實爸爸沒睡，正在偷看他們的偷酒表情：鍾毓喝酒的時候，“拜而後飲”；鍾會呢，卻“飲而不拜”。爸爸奇怪了，便起來問理由。鍾毓說：“酒以成禮，不敢不

拜。”可是鍾會卻說：“儉本非禮，所以不拜。”

這個故事，可以看出古人喝酒的手續多麻煩。它不要你先享受，而是要你先磕頭！

這個故事的另一說法是，兩個小鬼不姓鍾，而是孔融的兒子。孔融爲直言無隱貢獻了生命，在他被殺以前，是思想家兼酒鬼。統治者禁酒的時候，他反對，理由是：

“酒之爲德，久矣！

天垂酒星之曜；

地列酒泉之郡；

人著旨酒之德；

堯不千鍾，無以見太平；

孔非百觚，無以堪上聖；

高祖非醉斬白蛇，無以暢其靈；

景帝非醉幸唐姬，無以開中興。”

描寫酒的偉大，這篇要考第一。孔融讓梨，但若不是梨而是酒，你看他會不會讓？

歷史上，用酒來辦事、來避禍的例子也很多。曹參爲了怕官吏打擾老百姓，整天喝酒示範，表示我們做官的，只要喝酒就好了，別去找老百姓麻煩；陳平也爲了對政事不表示意見，整天喝酒裝糊塗。很多人很多人，他們在酒中得到了真理與存在。歷史上禁酒的工作都沒有成功，也永遠不會成功，因爲酒——如果喝得好、喝得少、喝得巧，到底是一個不會出賣你的朋友。

音樂——華夷交響樂

你高興的時候，除了吃牛肉乾以外，是不是還會哼呀哼的，哼個不停？

你不高興的時候，除了也吃牛肉乾以外，是不是也還會哼呀哼的，哼個沒完？

你這樣，你的老祖宗們也是這樣，只是他們吃的，不是牛肉乾，而是一塊乾牛肉。

四隻貓，會喵喵叫；四隻狗，會汪汪叫；四個人，會喵喵也會汪汪，可是他們不甘心學貓叫狗叫，他們覺得那樣叫太單調。並且，他們發現，他們的喉嚨（那時候還不知道什麼叫“聲帶”）和嘴巴，出聲的本領實在很奇妙，它會發出一些稀奇古怪的聲音，高高低低一串一串的出來。那時候，他們一點也不曉得，這些稀奇古怪的聲音，會被後來人類叫做“原始音樂”。他們如果曉得，四人一組，一定毫不需要準備的，就成立四千個“披頭歌唱團”！

古代的披頭們，他們本來高興的時候就哼呀哼，不高興的時候也哼呀哼或呀哼哼的，本來哼得好好的，大家又跳又唱，十分快樂。不料就在這時候，有一些老夫子們出現了，老夫子

們聽了他們的歌聲，皺起眉毛，翹起鬍子，表示不滿意了。老夫子們給這些自自然然的音樂家戴了一頂可怕的大帽子，叫做“亡國之音”。什麼是“亡國之音”呢？“亡國之音”是當時老夫子們眼中的活潑潑的音樂，比如說山歌啦、情歌啦、民間的輕快歌曲啦、令人興奮的小調啦，都是一般羣衆喜歡而爲老夫子們所反對的。

老夫子們贊成什麼呢？老夫子們贊成的歌兒叫做“雅樂”——所謂高“雅”的音“樂”。這種“雅樂”，聽起來是死板板的，唱起來是要立正站着的，奏起來是要恭恭敬敬的，聽這些所謂“雅樂”，你會靜，靜，靜，靜得像井裡的水，像睡大覺。老夫子們認爲，只有這種嚴肅的音樂才是音樂，輕輕快快蹦蹦跳跳的音樂不是音樂；只有這種嚴肅的音樂才是“德音”——所謂有道“德”的聲“音”；輕輕快快蹦蹦跳跳的音樂是“溺音”——所謂不道德的聲音。當然，你只要有一點思考能力，你就會奇怪，聲音怎麼會有“道德的”或“不道德的”分別呢？（就好像說：電燈光怎麼會發生“道德的”或“不道德的”分別呢？一杯白開水怎麼會發生“道德的”或“不道德的”分別呢？）可是老夫子們不管這些，他們也不許年輕人懷疑這些，反正他們總是不斷的抬出“雅樂”“雅樂”“雅——樂”！

老夫子們喜歡“雅樂”，還能從“雅樂”裡聽出味道，是很玄的事。古代“雅樂”中有一種叫“大韶”的，是大音樂家夔作的。夔和虞舜是“樂教”的開山祖師爺，大大的有名。韶樂傳到春秋時代，傳到齊國，被孔夫子聽到了，孔夫子聽得着了迷，迷得竟只有聽覺，失掉了味覺，使他“三月不知肉味”。

他讚美“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他大叫“盡美矣！又盡善也！”爲什麼盡善盡美？書上說，因爲這種音樂能夠上面感動神仙，下面感動鳥獸的緣故！

可是，孔夫子對“雅樂”的起勁，無論如何也影響不了別人。他在魯國當政，大力從事全國的音樂改革，從事所謂“正樂”的工作，所謂“正樂”，翻成白話，就是使音樂立正的工作。但是，使音樂立正，談何容易？事實上，立正了半天，一旦齊國將美女加流行歌曲外銷到魯國的時候，魯國君臣上下，就大有“三月願知肉味”的香艷感覺了。孔夫子一氣，就走了，所有的正樂，都“稍息”了。

還有一種比孔夫子更徹底的一派，就是道家和墨家。他們的代表人是老子、莊子和墨子。他們對音樂，根本上就不太領教，“雅樂”也好，俗樂也罷，他們都覺得多此一舉，一切聲音，還是自然最好。自然的聲音叫“天籟”。人造的音樂是多餘的，甚至是奢侈品，都該滾它的蛋。

另有一種比孔夫子更雄心勃勃的一派，就是梁武帝蕭衍的一派。梁武帝蕭衍，年輕時候是個大軍閥，篡了別人的王位。後來忽然迷上佛教，變成婆婆心腸了，他三次捨身到同泰寺，每次都被大臣們給贖出來。他到處蓋廟，花了無數的錢，搞得最後以八十六歲的高年，餓死在南京玄武湖。他迷上佛教的時候，也來過一番“正樂”的工作，不過他使音樂立正的目的，卻跟孔夫子不一樣，他的雄心是用音樂來講述佛法，弘揚佛法。至於音樂怎麼能夠講述到佛法，弘揚到佛法，那真是玄之又玄，大概只有釋迦牟尼曉得了。

總之，老夫子們從他們成爲老夫子的時候起，就立大志將

音樂五花大綁，加上大道理，成爲“樂理”。他們抬出“雅樂”，他們不但自己抬，還要說動皇帝，要皇帝下命令一起抬。所以歷代許多皇帝，都拚命的在提倡“雅樂”“雅樂”“雅——樂”，雖然皇帝本人，卻關在後宮，大聽其“雅樂”以外的音樂。（像這種皇帝，多得很，先舉兩個有名的，一個是大名鼎鼎的唐玄宗，他曾有過美人兒楊貴妃的故事，他最喜歡“雅樂”以外的音樂，並且在宮裡左面開一個講習班，右面開一個講習班，自己聘自己是班主任，親自來教流行歌曲。當時，有老夫子們看不過去了，特別指摘他，可是唐玄宗不聽，但爲了表示容夫子之言，不但不生氣，反到給指摘他的老夫子們一些獎品；又一個大名鼎鼎的喜歡“俗樂”的皇帝是清朝的乾隆帝，他曾有過美人兒香妃的故事，他一方面對老夫子們說：“好，你們要恢復古代的‘先王之樂’，我贊成，我支持你們去做！”可是另一方面呢？他自己却跟着小百姓喜歡起民間的“崑曲”來，於是他也像唐玄宗一樣的，設了小衙門，叫做“昇平署”，“昇平”是“歌舞昇平”的意思，表示有我做皇帝，天下就太平了，大家還是高高興興的唱歌吧！）

古代皇帝們提倡“雅樂”，並不是真的喜歡“雅樂”，而是因爲老夫子們說要提倡，不提倡，表示不敬老，不尊古，面子上過不去，於是就提倡、提倡、提倡。在大叫提倡、提倡、提倡以後，皇帝忽然轉過頭來，偷偷地問老夫子，到底提倡什麼東西呢？老夫子白了白眼睛，輕輕地說：“我們要提倡古代的音樂，那叫做‘先王之樂’！”於是皇帝就說好，我們提倡“先王之樂”，於是你提倡，我也提倡，可是誰也鬧不清“先王之樂”到底是一付什麼模樣的音樂。隋朝的皇帝們提倡了六次，可是還是弄不出一套“雅樂”；宋朝的皇帝們改了六次，可是

還是弄不出一套“雅樂”，最後到了清朝的康熙帝，他氣起來了，他氣得大叫，各朝各代都提倡“雅樂”“雅樂”“雅樂”，可是都“各雅其所雅，而非先王所謂雅也！”他認為過去的皇帝都搞錯了，只有他才能搞得對，於是他動員一大批人，花了兩年的時間，編一部大書，叫做《律呂正義》。書編好後，他要天下照着吹吹打打，可是還是沒有效果，最後連他自己的子孫都喜歡起“崑曲”來，你說悲哀不悲哀？

爲什麼“雅樂”會鬧到這一個下場呢？

我們來研究研究原因。

音樂這個東西，本來是一種用聲音表達基本感情的玩藝兒，它本是一種自自然然的流露，再根據自自然然的流露，加以各種規則。（比如高低、長短、強弱、以及一定的起、承、轉、合等等。）因爲音樂是自自然然的，所以它最能感動人心；因爲它能感動人心，所以就有老夫子們想出怪主義，要利用音樂來達成倫理的、政治的目的，於是毛病就出來了。

老夫子們想建造一個他們眼中的安定社會，但他們不知道，要想社會安定，需要有很多很多疏導的因素才行。不知道如何疏導，只會一味加以硬性規定，是達不到他們的目的的。可是老夫子們不知道，或者說，他們不願知道。於是，本來活潑潑的音樂，竟被老夫子們用來做冷冰冰的教育工具了。例如彈琴，彈琴本是快快樂樂的事，可是老夫子們卻來了一番大道理，說什麼“琴者，禁也！禁邪念也！”這麼一規定、一解釋，把活生生的音樂，立刻弄得陰森森起來；把本來輕鬆的感情，立刻嚇得緊張起來。古代的教育理想是“六藝”的教育，六藝包括“禮”“樂”“射”“御”“書”“數”，可見古人是重視音樂

教育的，不像現代只把音樂當作“副”科，當做升學考試考都不要考的一科。但是，古人重視“樂”教的目的，卻想從音樂訓練出一批感情收斂、喜怒不形於色、嚴肅而又嚴肅的小國民，要用音樂來灌輸大量的體制、道德、和迷信。於是，官方的音樂教育，最後失敗了；真正的音樂還是在民間，在民間自自然然的唱着，活活潑潑的流傳着。

中國一些固有的樂器，現在都已經變成了古董，有的在古廟（像台南的孔廟）或博物院（像士林的故宮博物院）還可以看到，這裡提供一點說明，使你在看到那些古董的時候，多少有一點幫助。

中國的樂器，根據材料的不同，可分八類：

- 一、金屬做的，像“鐘”。有的“鐘”只是一個掛在那兒，叫“特鐘”；有的成羣結隊，叫“編鐘”，“編鐘”敲起來聲音每個不同，有高低變化。
- 二、石頭做的，像“磬”。也和鐘一樣，有“特”字號的，和“編”字號的。台南的孔廟就可以看到。
- 三、絲做的，像“琴”。最代表中國人的樂器，它象徵着君王和隱士。古人有的一個彈（像諸葛亮），有的一個人彈一個人聽。（像伯牙和鍾子期。伯牙彈琴，彈山，鍾子期知道他在彈山；彈水，鍾子期知道他在彈水。後來鍾子期死了，伯牙就把琴絃弄斷了，他認為這個世界上，再也沒有知道他的好朋友了。這個故事傳下來，成爲一個典故：我們把好朋友叫做“知音”。要彈琴，就要彈給知音聽，不然，就是“對牛彈琴”。）
- 四、竹做的，像“簫”。又叫“尺八管”，因爲它有一尺八

寸長。古代用竹做的樂器很多，橫着吹的叫“箎”，直着吹的叫“會簫”，叫“管”，叫“簫”。後來吹得開的，淘汰成兩類：直着吹的“簫”和橫着吹的“笛”。笛在唐朝以前就叫“橫吹”，吹起來可以怪聲怪調，所謂“短笛無腔信口吹”。笛本來只有六個孔，沒有膜。到隋唐以後，外來的樂器傳進來，在風口和音孔中間，另開了一孔，貼上葦膜，這一膜之有無，決定了笛小姐的身價。這個島上復興固有文化的人提倡國樂，可是他們造不出一支像樣的笛。造出來的每支標準音（pitch）都不標準，比起洋鬼子的“豎笛”（clarinet）來，立刻出盡了洋相。

五、匏做的，像“竽”。齊宣王的時候，吹“竽”的人有三百個，其中有一位南郭先生，根本不會吹，只是擠在中間湊數。後來齊宣王死了，齊湣王做了皇帝，他要聽吹竽的人一個個單獨表演，嚇得南郭先生逃掉了。這個故事，後來形成一句成語，叫做“濫竽充數”。

六、土做的，像“缶”。“缶”本是用來裝酒的土器，敲打起來，就算是音樂了。戰國時候秦王和趙王在澠池地方喝酒，秦王要趙王敲，趙王敲了；但秦王自己竟不敲。趙國的大臣藺相如看不過去，一定要求秦王敲，不敲他就拚命，秦王沒辦法，只好也敲一下。其實“擊缶”的聲音難聽死了，大家卻要敲來敲去，真想不開。

七、革做的，像“鼓”。“鼓”的種類很多，有一種叫“腰

鼓”。三國時候自由文人禰衡曾打着“腰鼓”指摘曹操，後來變為一齣國劇，叫做“擊鼓罵曹”。

八、木做的，像“柷”。形狀像個方斗，上面寬，下面窄，邊上有個洞，把一支柄槌放進去。台南孔廟可以看到。

古代樂器雖然很簡陋，就連這些，許多都來自外國。（那時候，叫做“胡人”。有些從名稱上，就可看得出來。“胡茄”“胡琴”“洋琴”等等，都屬於這一類。）有人感到外來的這麼多，太沒面子，所以硬要說“胡琴”不是胡人的琴，而是“胡胡響”的琴。當然說這種神話的人，中國民族精神考一百分，中國民族史吃鴨蛋。在古代，常常有外國的一些小樂器，進到中國，然後風行一時。例如戰國到漢朝時候，有一種樂器叫“筑”，很得當時人喜歡。這種樂器有十三根絃，演奏時候以左手撥，右手用竹尺來敲。秦始皇就很喜歡這種玩藝，結果荊軻的朋友高漸離利用秦始皇這一嗜好，竟用“筑”來接近他，行刺他，結果沒有成功。後來漢朝的高祖得了天下，回到家鄉去玩，一邊唱他的“大風歌”，一邊敲打的，就是這種“筑”。可見當時外國樂器流行的程度。

回顧中國的音樂史，使我們得到的最大教訓是：舊式中國的音樂和樂器，在二十世紀的新世界裡，已經落伍了，落伍了！落伍的最主要原因，就是因為老夫子們想利用它，結果沒利用成，反倒扼死了它，使他無法得到健康的發展，無法精益求精的進步，無法走上科學化的道路。例如樂器，中國人只會拉拉共鳴箱小得不能再小的胡琴，就發明不出來龐大的鋼琴；又如歌譜，中國人從來不懂得什麼叫“和聲學”“曲式學”或

是什麼“對位法”。所以，在全世界都走向現代音樂的步伐裡，我們實在沒辦法抱殘守缺，妄想像歷代皇帝一般的，恢復固有音樂。目前殘餘的“國樂”，只是不倫不類的用來做“觀光表演”和“國樂伴舞”罷了，其實也並不是什麼真的國樂。靠恢復國粹食色性也的人，在表演“昭君出塞”的時候，硬給王昭君塞了一具她根本不曾用過的樂器——“琵琶”，好可憐的王昭君啊！她也被盲目的用來“發揚國樂”了！王昭君死而有知，一定手抱琵琶全遮面，暗中叫苦。因為“琵琶”“琵琶”，正是道道地地的外國貨呀！

〔附記〕

埃及有一種彈絃樂器，叫“諾夫爾”（nofre），是琵琶的老祖宗。諾夫爾傳到阿拉伯，傳到波斯、大夏，再傳到中國。張騫通西域的時候，傳來了用琵琶彈的“西洋流行歌曲”，演變到中國出了許多琵琶專家。有姓曾的一家，“父祖子孫兄妹皆稱琵琶名手”。唐朝人最迷琵琶，武則天送給東洋鬼子的琵琶，現在還保存在日本，可見當時的流行程度。流行到和尚都不守清規，在廟裡大彈特彈；至於《琵琶行》中的怨女，琴瑟不調，琵琶別抱，自然更不在話下了。

家族——人越多越好

一個男人，只是一個男人，造不出來什麼。

一個女人，只是一個女人，也造不出來什麼。

一個男人加一個女人，兩人一塊兒活，造出來的玩藝可就多了，他們可以造出許多小男人和小女人，也造出來所謂的“家”。

從古代到今天，全世界許多國度，都有許多男人和許多女人造了許多家，中國也不例外。但是中國的家，和別人比起來，卻實在有點特別——只此一家。中國的家的特別之點，讓我們看看：

第一個特點是“爸爸系統”。“爸爸系統”意思就是只算爸爸那一支，算爸爸的爸爸，算爸爸的爸爸的爸爸，算個沒完；至於媽媽那一支，算了一兩代，就不算了。所以，在中國的家中，爸爸的祖宗越算越長，越長越好；而媽媽的祖宗，大概只算到外公，外公以外的公，都“見外”了。正因為是“爸爸系統”，做媽媽的，都好像得了“健忘症”，並且在家裡的地位，也不能掛頭牌，因為“一家之主”是爸爸，或是爸爸的爸爸。

中國的家的第二個特點是“爸爸權力”。“爸爸權力”是爸

爸最有權。爸爸在家裡的地位是“家長”，他的權力是最大的、最多的、也是絕對的。歷史上做爸爸的權力表現，有好多例子：

一、爸爸有殺人權——如古代皇帝虞舜的爸爸，老是想殺虞舜，可是沒有成功；有一個叫易牙的，就殺了自己的兒子，並且把兒子的肉做成了羹。爸爸殺兒子，不但爸爸認為沒什麼，做兒子的，竟也認為是當然。秦始皇叫他的兒子死，他的兒子奉命自殺，認為“父賜子死，尚安復請？”一點也不討價還價，就自殺了。

二、爸爸有打人權——人都可以殺，打打當然更不在話下。爸爸打兒子的故事，最有代表性的，是曾子和他爸爸。曾子有一天種瓜，不小心把瓜的根子弄斷了，他的爸爸生氣了，他的爸爸拿起了大棒子，他的爸爸使勁打他，把他打昏了。很久以後，曾子才醒過來。這件事被曾子的老師孔夫子知道了，不但不怪曾子的爸爸，反倒把曾子罵了一頓。孔夫子說：“你爸爸拿了小號棒子的時候，你該讓他打，叫他出氣；但他拿了大號棒子的時候，你就該逃掉，否則他真的賭氣，把你打死了，你叫他怎麼下台？”

三、爸爸有賣人權——中國古書中有“鬻妻子”等記載，就是爸爸可以賣媽媽和子女的證據。元朝的法律中還特別禁止把妻妾子女典押給人家，可以看到當時這種風氣的盛行。爸爸不但在活的時候，有賣子女的；甚至死了，爲了埋葬他，他的子女都要被媽媽賣掉。孔夫子在衛國的時候，就碰到過這種情形。

四、爸爸有財產權——爸爸做家長，所有的財產都是他

的，兒女不可以有私人的財產，更不能把家裡的東西隨便決定怎麼處理。這種規矩，在中國古書中，像十三經中的“禮記”，像宋朝司馬光的“涑水家儀”，都有記載。

五、爸爸有主婚權——孔夫子時代，他老先生認為公冶長是一個好人，就把自己的女兒嫁了給他；他老先生又認為南容也是一個好人，就把自己的姪女嫁了給他。孔夫子這樣做，根本不需要得到自己女兒或姪女的同意，這就是古代爸爸的特權。不但子女活的時候，婚事要爸爸做主，即便是死了，爸爸也有權給他們來一次“討鬼婆”。曹操的兒子曹冲，是一個能知道如何稱象重量的聰明小孩，不幸年輕輕的就死了，正好邴原的女兒也年輕輕的就死了。曹操希望這一對少年男女能夠在死後結婚，於是向邴原徵求同意，不料邴原卻反對，認為不合禮法，這門親事，並沒弄成功。

六、爸爸有離婚權——爸爸對媽媽，有主動的離婚權。例如媽媽嫉妬，爸爸就可以跟她離婚；媽媽話太多，爸爸也可以跟她離婚；媽媽偷東西，爸爸也可以跟她離婚。爸爸不但可以跟自己的太太離婚；還可以叫兒子跟兒子的太太離婚。兒子自己喜歡自己的太太，沒有用，要爸爸喜歡才行，爸爸不喜歡，就得趕出家門。

中國的家的第三個特點是“大哥權力”。中國的家，除了爸爸的權力以外，就算大哥最有權，大哥是男孩子中最大的，他比所有的男孩子和女孩子都吃得開。大哥若生在皇宮裡，他是皇帝的當然繼承人；大哥若生在諸侯家裡，他是諸侯的當然繼承人；大哥若生在普通人家裡，他也是爸爸死後的一家之主。“兄權”代替了“父權”，“兄權”就等於是“父權”。

中國的家的第四個特點是“男人權力”。爸爸是全家第一男，他最有權；大哥也是男人，他第二男，也有權，但他的權就比較受限制，因為，有個媽媽。在“孝順”的傳統底下，大哥要聽媽媽的；在“男尊女卑”的傳統底下，媽媽又得聽大哥的。中國傳統中的女人要“三從”，所謂“三從”，是一個女人

在家從父（父死從兄）——第一從。

出嫁從夫——第二從。

夫死從子——第三從。

在這個標準下，媽媽在爸爸死後，也得聽大哥的。但是因為媽媽畢竟是媽媽，所以大哥對媽媽的威風，還是得收起一大部份來。爸爸死後，媽媽可說是家中唯一一位能夠跟家中男士抗衡的女性，姐妹們是沒有地位的，權力都被大哥以下的兄弟們佔住，家裡的財產，也不會分給她們，只在出嫁的時候，送一點嫁奩而已。女人在中國家中的地位，是非常可憐的。

中國的家的第五個特點——最重要的一個特點——是“大家庭的結構”。所謂大家庭，就是家中不只父母子女兩代幾個人的小家庭，而是要所有有親屬關係的人住在一塊兒，大家誰都不要跑。“大家庭”的理想型態是“五代同堂”，堂是家裡的大庭，大庭中要有五代的親屬，才算過癮。至於五代如何同堂，是什麼人，實際情形，你快看下面：

第一代——家長前二世代。

祖父

祖母

外祖母（在外祖父死了以後）

第二代——家長前一代。

父

母

伯父

嫡母

伯母

舅母

第三代——家長自己一世代。

家長自己

妻

兄弟

姐妹

嫂嫂及弟媳婦

姐妹丈

堂兄弟

家長童養媳（童養媳是未來的兒媳婦，先進家門來做工）

兄弟童養媳

第四代——家長後一世代。

已婚子

未婚子

女

媳婦

女婿

姪

外甥

姨姪

姪女

姪媳

外甥女

童養媳（兒子的）

童養姪媳

第五代——家長後二世代。

孫

外孫

孫女

孫媳婦

姪孫

姪孫女

童養孫媳

童養姪孫媳

這就是所謂“五代同堂”的大結構——實際的結構。中國人對這種大家庭，最着迷不過，他們對“五代同堂”的希望是“五世其昌”——五個世代代代代代都繁榮而有福氣。當然，搞不好，也可能五世其“娼”。

“五代同堂”，只不過是一個標準型態，當然還有“四代同堂”“六代同堂”等等。反正代越多，越證明了老公公老婆婆們的長壽，和小孫子小孫女們的早婚。

中國最有名的大家庭是唐朝的陳崇一家。這家一連十三代，都沒分開。前後累積的家人，有七百多。唐朝皇帝特別給

他們獎勵。

唐朝另一個有名的大家庭是張公藝一家。這家的特色是“九世同居”，南北朝時代、隋朝時代、到唐朝時代，都受過當時皇帝的獎勵。有一次唐朝的高宗皇帝到他們家裡去，問張公藝維持一個大家庭的秘訣是什麼，張公藝最後把秘訣公佈了，那是一百個同樣的字——一百個“忍”字。維持大家庭的秘訣，是忍耐。

“大家庭”在事實上，有它不能存在的困難，時代的推演，一定使大家庭慢慢解體。這種現象，在中國古代本已發生。在紀元五世紀的時候，就有大臣指出當時有父母還沒死、兄弟就分家了的現象，並且這種現象，竟佔百分之七十以上！在紀元十世紀的時候，皇帝還特別下令不得在祖父母、父母沒死以前分家，要分家，就不孝，甚至可判死刑！（甚至勸別人分家的人，都有罪！）

但是，任何不合人情的規定，都抵擋不住時代的推演，“大家庭”的美夢仍舊在繼續解體中。先是在大家庭中，有小家庭各個獨立，各自為政，“同居異爨，一門數竈”，大家分開吃飯，然後就分開住了。父母大都跟着大哥，算是一家“三代同堂”，其他便只有兩代。自此以後，“三代同堂”的，便已算是大家庭了。

由於中國人以大家庭為一個理想，所以，因家而生親屬關係，也就特別累贅，這點就跟西方國家大不相同。在西方國家，對上一輩只有一種稱呼的，在中國，卻可分化為伯父、叔父、堂伯父、堂叔父、族伯父、族叔父、表伯、表叔、姑丈、母舅、姨丈等等十一個稱呼；在同輩方面，也是一樣，在西方

國家只有一種稱呼的，中國人卻可分化爲堂兄、堂弟、再從兄、再從弟、三從兄、三從弟、表兄、表弟、姨表兄、姨表弟、堂表兄、堂表弟、堂姐、堂妹、再從姐、再從妹、表姐、表妹、姨表姐、姨表妹、堂表姐、堂表妹等等二十二個稱呼。由此可見，中國的親屬關係多複雜！

中國人喜歡稱道的親屬關係是“九族”，九族的關係是：

高祖父母←曾祖父母←祖父母←父母←自己→子→孫→曾孫→玄孫

在中國的傳統觀念中，一個人，並不屬於他自己，而是屬於他的家族；他不代表他自己，代表的也是他的家族。所以，當一個人犯了罪，懲罰的對象並不止於這個“罪人”自己，而要連累他的家。秦始皇帝時代就有“誅三族”的法律，要殺一個“罪人”的時候，他的父母一族，他自己和太太一族，他的兒女一族，都要殺得光光光。這種殘忍而不人道的法律，一直流傳着，甚至還變本加厲。隋朝時候，楊玄感造反失敗，所受的懲罰，就是“誅九族”。明朝方孝孺爲了反對明成祖篡位，大罵成祖。成祖問他說：“你難道不怕殺九族嗎？”方孝孺說：“就殺我十族，又怎麼樣！”成祖說：“就殺你十族！”於是，除了方孝孺的九族外，連他的學生，也當做一族被殺光了！

這就是由中國畸型的家族關係，演變出來的畸型法律和殘忍事實。

由於中國人的家族觀念太強，它的流弊，也就多得不得了，變成了中國進步的障礙。綜合它的大缺點是：

一、年輕一代沒有自由。

二、年輕一代容易養成倚賴心，缺少開創精神。

三、男女不平等。

四、婚姻不自由。

五、容易傷感情，把八十歲到十八歲的女人，擠在一起，自然“婦姑（姑是婆婆）勃谿”“妯娌不睦”“姑嫂口角”“兄弟鬩牆”了。

六、太重“家法”，忽視法律。

七、太重自己家族的利益，缺乏公益和愛國觀念。

中國家族的流弊，可真不少。家族觀念走火入魔的時候，還要進一步“開祠堂，執家法”，包括依“族規”第幾條第幾款，應該打多少大板或別的。更超越前進的，是以族姓為單位，統統有獎。張獻忠到四川，殺得興起，“百家姓”中個個遭殃，但對“張亞子廟”、“張桓侯（張飛）廟”，因為同宗，一律優待；張獻忠的老前輩黃巢，更寬大，他在湖北，不但不殺姓黃的，甚至連帶黃字的地方都一律放生，所以能留下許多“黃岡”人“黃陂”人給我們領教，給我們消受，這真所謂“盜亦有道”“盜亦友盜”了！

女性——牌坊要大，金蓮要小

在古代，有一件怪事：男人離不開女人，可是男人又看不起女人；更怪的是，不但男人看不起女人，連女人也看不起她們自己。

男孩子生下來的時候，放在牀上；女孩子生下來的時候，放在地下，或者放在水裡，乾脆淹死。這是因為養不起，又沒有“安無妊”或“樂普”，只好即時生殺了事。這種風俗，叫做“溺女”。

男孩子生下來的時候，穿漂亮的衣裳；女孩子生下來的時候，只穿背心式的內衣。

生男孩子叫“弄璋之喜”，璋是好的玉石，使男孩子玩玉石，據說可增進他的德行；生女孩子叫“弄瓦之喜”，瓦不是瓦片，是紡車上的零件，使女孩子玩紡車上的零件，據說可使她將來勤於家事。

爲了獎勵生男孩，漢朝章帝發明了“胎養令”，對生兒子的有優待，生女兒的就不行，除非生楊貴妃，生楊貴妃可以“不重生男重生女”。但舉世滔滔，哪有那麼多楊貴妃好生？何況萬一生不好，生出了黃承彥家的醜丫頭，除了嫁給諸葛亮，

也沒人要。但舉世滔滔，那有那麼多的諸葛亮？

有的人笑，在笑臉裡面充滿了慈祥；有的人笑，好像是在哭；有的人笑，笑裡好像有把刀。唐朝有個宰相叫李林甫，他的笑臉裡面，好像有把刀，——“笑裡藏刀”的典故，便由此而來。

他沒死以前，楊貴妃的乾兒子兼老相好安祿山不敢造反，因為安祿山一見他，就嚇得混身冷汗直冒，安祿山知道李林甫不是好惹的，因為他笑裡藏刀，那把刀，隨時可能扎到安祿山的胖肚皮上。

有一天，李林甫一個親戚生了一個小男孩，李林甫提起毛筆，寫了“弄麋之喜”四個字，送到親戚家，大家一看，都笑起來了，因為他寫了一個大別字，把“璋”誤寫做“麋”。（麋是種鹿，頭很尖，有種人頭尖眼睛小，就容易被人罵做“麋頭鼠目”，這個成語也出在唐朝。你要特別注意，隨便一個中國的成語，都有它的傳統。你弄不清，便會鬧李林甫的笑話。）

古代中國女人，在中國唯一的出路，就是出嫁做媽媽。她們在沒出嫁以前，整天關在家裡，絕不會出來唸書，或出來跳舞，或出來做女秘書、女護士，是沒有這些的。

她們沒有上學的權利

口號是“女子無才便是德”，——不會唸書反倒是美德！

她們沒有職業

蹲在家裡，就是她們的職業。

她們沒有繼承權

財產都分給兄弟們了。

她們沒有人格權

人格權已經被爸爸、丈夫、兒子所吸收。

她們沒有自由意志

不需要她們有意志，壞事不讓做，好事也輪不到她們做。

她們被“聖人”看不起

孔夫子說：“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

她們很容易就被丈夫趕走

有七個理由，丈夫可以趕走她，其中一個理由是“不生兒子”。不生兒子不怪丈夫，要怪她！

她們還很容易就被連帶殺頭

要是她的爸爸、丈夫、兒子犯了大罪；她就跟着倒霉，她自己若想犯個大罪，叫別人也倒霉，不行，沒機會！

她們很難再婚

不論離婚後或丈夫死後，總之，她們想結第二次婚，很難很難；並且很多人，根本也不想，她們寧願糟蹋了青春。清朝有一個“高節婦”，十七歲起守寡，守到九十六歲，共守了七十九年，是“守寡大王”。

她們幾乎什麼都沒有，甚至連自己的名字都沒有

漢朝開始才有女人私人的名字，有的還是沒有，只叫做什麼什麼“氏”而已。你一看到什麼什麼“氏”，比如說“陳氏”“王氏”，你就知道“是個姓陳的女人”“是個姓王的女人”，這就“夠”了！“氏”字是一個表示“是女人”的通用說法，其他同類的字還有

“姬”“姜”等等，都屬於這一類。古代有個女人叫“孟姜”，傳說中爲了找丈夫，曾哭倒長城，後來人們不知道“孟姜”的意思就是“是個姓孟的女人”，以爲“姜”是她的名字，於是硬把她叫做“孟姜女”，這是不通的，“姜”就是“女”，這麼一叫，孟姜“女”豈不成了“孟女女”了嗎？

從上面一些現象裡，你一定感到中國古代女人的處境，實在很特殊，要了解這些現象，你必須再進一步，多了解一點。

在漢朝的時候，有一個女人，叫班昭，她的丈夫姓曹，所以她又被叫做“曹大家”（“家”在這裡，唸做“姑”），她有兩個有名的哥哥：一個是寫“漢書”的班固；一個是出使西域“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班超。這位妹妹，實在是個莫名其妙的女人，她若不莫名其妙，她不會寫一部叫做《女誡》的書，這部書，是女人寫來叫人如何壓迫女人的，你說莫名其妙不莫名其妙？

《女誡》這部書，其實也不算是一部書，因爲從出版大家蕭孟能、沈登恩眼光看來，它的字太少了。它只有一千六百個字。但這一千六百個字，卻集了壓迫女人思想的大成，並且變爲以後兩千年女人的修身教科書，它的勢力可真大！

在《女誡》裡，有很多“奇妙”的理論：

比如說，它主張女人要卑下，要軟弱，女孩子生下來第三天，就該把她放在牀下面，來表示她的卑弱；

比如說，它主張女人要無條件的服從丈夫，丈夫就是“天”，因爲“天”是不可以違背的，所以丈夫也不可以違背。對丈夫要像忠臣對皇帝、孝子對爸爸一樣；

比如說，它主張丈夫可以再娶，可是太太不能再嫁；

比如說，它主張做太太的方法，是在使丈夫不打她，不罵她；

比如說，它主張丈夫對太太，是一種“恩”情，——這部書的作者，根本還不懂得什麼是愛情！

從班昭這部書以後，也有一些書跟着冒出來，大談女人該如何如何，像魏晉時代張華寫的《女史箴》、唐朝太宗長孫皇后寫的《女則》、陳邈太太鄭氏寫的《女孝經》、宋若華寫的《女論語》、明朝成祖仁孝文皇后寫的《內訓》、呂坤寫的《閨範》、清朝藍鼎元的《女學》等等，和班昭那本《女誡》一樣，也有很多很多的“奇妙”理論出現。現以《女論語》為例，在《女論語》中，宋若華主張女人

走路的時候，不要回頭；

說話的時候，不要掀嘴脣；

坐的時候，膝蓋不要動；

站的時候，裙子不能搖；

高興的時候，不能有大聲；

不能跟男人在一起；

不要朝牆外面看；

不能走出家裡的大庭。

只能呆在家裡，看李敖的文章。

除了上面所說的，中國女人所處的地位以外，還有兩個最大的特色，就是“貞節”與“小腳”。

“貞節”觀念是所謂“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嫁二夫”，這

本是古代中國人認為的美妙理想，到了一千年前的宋朝，才開始大行特行起來。大行特行的原因，是由於宋朝的“哲學家”程顥的一段話，有人問程顥，如果一個女人死了丈夫，若不改嫁就無法生活，就得餓死的時候，那可怎麼辦？誰想到程顥老夫子的不近人情的答覆是：“餓死就餓死算啦！餓死是小事情，可是失掉貞節卻是大事情！”

程顥有一個大徒弟叫朱熹，就是後來被人稱為“朱子”的，在程顥以後，大力宣傳他老師的這種錯誤說法，從此以後，中國人便中了他們的毒，着迷起來，中國女人便在盲目的宣傳下，不斷的做着不近人情的維護貞節運動：有的甚至被男人拉了一下胳膊，就氣得自己把胳膊砍下來，認為那隻胳膊，已被那男人弄髒了；有的甚至要和未婚而死的丈夫——死人——結婚，抱着死人的靈牌舉行婚禮。……提倡貞節提倡到這個樣子，你說荒唐不荒唐？

政府方面，為了獎勵貞節，有所謂“貞節牌坊”，是用石頭架起來的牌坊，鼓勵那些守寡守得最久的女人，或是那些為了維持貞節而死的女人。

立“貞節牌坊”，表面上很簡單，骨子裡大不簡單，並不因為你守寡或殉情做得好，就可以立到，還是要看“關係”。比如說，這個寡婦的兒子有錢，或者做大官，他媽媽的“貞節牌坊”就自然而然立了起來，所以這種獎勵，內幕重重，實際是“眾寡懸殊”的。

因為“眾寡懸殊”，傳說裡有人死了也不服氣。清朝乾隆皇帝下江南，看見“一婦人舉止異常，行不甚速，而常在御舟之前。”找來問她是不是有冤？她只說了一句話：“我戚家寡婦

也。”就忽然不見了，原來是女鬼。乾隆皇帝說：“此必節烈婦人，來求旌表者也！”於是如其所願。

要想看“貞節牌坊”是付什麼模樣，台南、金門都有，台北新公園有兩個殘餘的牌坊，一個是“貞節牌坊”，一個是“孝子牌坊”。

孝子牌坊大多是給“殉母”的孝子立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小說裡，就記有這種孝子，原來不是什麼“以身殉母”，而是因縱慾過度死在妓院裡的“火山孝子”。這小說中的孝子，確有其人，名叫岑德固，是請求西太后讓他“做一看家惡犬”的大官岑春煊的兒子。他被旌表成孝子，是官官相護的大官張之洞、端方等聯名請求的，旌表以後，他的事蹟，宣付國史館，當然不包括命喪青樓在內。

“貞節”以外的另一個特色，是“小腳”。

小腳是把小女孩的兩隻腳，用布帶用力裹起來，裹到骨頭也斷了，肉也爛了，可是不管斷不斷，爛不爛，還是要裹下去，直裹到一個畸型的新腳長出來，才算完事。這時候，這個女孩子再也不會活活潑潑的蹦蹦跳跳了，她走路都走不好了，更談不到跑來跑去了。

原來中國古人竟認為：女人被這樣裹了兩腳，就“老實”了。還有的中國古人竟認為：女人被這樣裹了兩腳，就“美”了。審美的眼光可真他媽的怪！正確的說法，這不是審美，是審醜。

中國人罵人寫文章又臭又長，講演又臭又長，說是“王母娘娘裹腳布”。王母娘娘傳說是黃帝是老相好，那個時代，還沒流行小腳，太早了；宋朝人的筆記裡，說小腳起於五代“春

花秋月何時了”的李後主，可能又太晚了。因為它無法解釋一千四百年前“雙行纏”“履頭皆銳”“底平趾斂”“彈弦絃足”等現象。小腳的形成，是慢慢演變的，但在中國，起碼已纏了一千年！

纏小腳，除了道德上的和審美上的原因外，還有一個原因，是性的，就是“足戀”。古代羅馬、中古西班牙，都有足戀的現象，漢朝成帝對“可憐飛燕”的妹妹趙合德，曾有過這種喜愛。中國性變態的文人，很多都喜愛小腳——尤其是臭的小腳，難怪他們作品真臭不可聞。中國文人爲了喜愛小腳，要寫《香蓮品藻》這種書，對小腳大做科學分類，分爲五類十八品，整天嚮往“鳳鞋半折小弓弓，鶯語一聲嬌滴滴”；至於性變態的武人，就沒這麼風雅，他們要把小腳砍下來吃，“足下”害人，一至於此！

有些鄉下女人，居然成了漏網之魚，有了天足或解放腳。這種人最怕成名，因爲一成名，人人就注目足下，害得老太無法交代。明太祖朱元璋的馬后，有對全國聞名的大腳，明太祖爲了維護這對大腳，不知砍了多少人的腦袋；李鴻章的媽媽也有大腳，外號叫“大腳夫人”。西太后五十大慶時，母以子貴，要召見李老太。李老太坐轎子到北京，滿朝文武拍李鴻章馬屁，都去歡迎。李老太從轎子裡無心伸出一腳，李鴻章怕她着涼，請她縮一下。李老太勃然大怒，大叫“你老子都不嫌我腳大，你倒嫌我腳大！”一氣宣佈不下轎了。經過好說歹說，指天劃地，多方疏通，李老太才回心轉意，最後見到小腳的西太后，出盡風光。使全國觀感，爲之一變；全國大腳，爲之一新。西洋婆子要靠鼻子高低影響歷史，中國李老太單憑這雙大

花腳，就踏破鐵鞋。今天中國以大腳丫子露色相的腳色，都要感謝李老太，因為有了李老太，足下才能滿足。

附帶要說的是，中國人小腳哲學如日中天的時候，竟發展到連男人的腳，也以小為貴。所謂“君子大頭，小人大腳。”要想做君子，腳大是不行的。所以男人也有以白布包腳的習俗，先包好，再穿襪，因此鞋前面比較尖。中國書獃子談中國哲學史、中國思想史、固有文化，卻沒看到中國人的小腳哲學，非但有眼不識泰山，也有眼不識泰水的腳了！

第二輯

光緒朝對節婦貞女的旌表

俞樾《石台仙館筆記》（春在堂全書本）記喬氏一條，很可代表晚清對貞節觀念的立論：

“松江鄒生，娶妻喬氏，生一子名阿九，甫周歲而鄒死。喬守志撫孤，家尚小康，頗足自存。而是時粵賊已據蘇杭，松江亦陷於賊。喬慮不免〔失節〕，思一死以自全；而顧此呱呱者，又非母不活，意未能決。其夜忽夢夫謂之曰：‘吾家三世單傳，今止此一塊肉，吾已請於先亡諸尊長矣，汝寧失節，毋棄孤兒。’喬寤而思之，夫言雖有理，然婦人以節爲重，終不可失，意仍未決。其夜又夢夫偕二老人至，一翁一媼，曰：‘吾乃汝舅姑也。汝意大佳。然爲汝一身計，則以守節爲重；爲吾一家計，則以存孤爲重。願汝爲吾一家計，勿徒爲一身計。’婦寤，乃設祭拜其舅姑與夫曰：‘吾聞命矣！’——後母子皆爲賊所得，從賊至蘇州。

“喬有絕色，爲賊所嬖。而喬抱阿九，無一日離。語賊曰：‘若愛妾者，願兼愛兒。此兒死妾亦死矣！’賊戀其色，竟不奪阿九。久之，以喬爲‘貞人’，以阿九爲公子。——貞人者，賊婦中之有名號者也。”

一日，喬氏“抱阿九登張禿子舟以遁”：

“張〔禿子〕夫婦意喬居賊中久，必有所齎。偵之，無有，頗失望。乃載之揚州，鬻喬於娼家，喬不知也。

“娼家率多人篡之去，喬仍抱阿九不釋，語娼家曰：‘汝家買我者，以我爲錢樹子耳！此兒死，我亦死，汝家人財兩失矣！若聽我撫養此兒，則我故失行之婦，豈當復論名節！’娼家然之。喬居娼家數年，阿九亦長成。喬自以纏頭資爲束修，俾阿九從塾師讀。

“俄而賊平，喬自蓄錢償娼家贖身，挈阿九歸松江，從其兄弟以居。阿九長，爲娶婦。乃復設祭拜舅姑與夫曰：‘曩奉命存孤，幸不辱命。然婦人究以節爲重。我一婦人，始爲賊貞人，繼爲娼，尙何面目復生人世乎？’繼而死。

“俞曲園曰：‘此婦人以不死存孤，而仍以一死明節，不失爲完人。程子云：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然餓死失節，皆以一身言耳。若所失者，一身一名節，而所存者，祖父之血食，則又似祖父之血食重而一身之名節輕矣！’”

可見在舊禮教的桎梏下——

被強姦，是爲不貞；與非法定人有性行爲（不論自動被動），是爲不貞；

被強姦，而不死，是爲失節；改嫁，是爲失節。

*

*

*

對這種毫不近人情的陳腐觀念，在光緒朝時，曾有過激烈的抗議，宋恕在他的《六齋卑議》（頁二十九，敬卿樓叢書本）裡，他曾託古以駁流行的貞節說：

“趙宋以前，大家婦女，不禁再適。名臣名儒，如范文正，其媳亦再適；程正叔雖創餓死事小苛刻不情之說，徒快一時口舌耳！其胞姪女，仍由正叔主持再適。自洛閩餘黨，獻媚元明，假君權以行私說。於是士族婦女，始禁再適。而亂倫獸行，其風日熾；逼死報烈，慘事日聞。夫再適再娶，均爲名正言順之舉。古聖所言，不爲失節。失節古誼，專指淫亂。今嚴禁古聖所許之再適，而陰縱古聖所惡之淫亂，洛黨私說，流殃至此！”

這真是具有歷史眼光的快論！

光緒三十年（一九〇四），嚴復譯孟德斯鳩的《法意》，在案語中，他寫道：

“己則不義，而專責事己者以貞。己之媵妾，列屋閒居；而女子其夫雖亡，雖不足戀，貧不足存，而其身猶不可以再嫁。夫日事夫不可以二，固也。而幽居不答，終風且暴，又豈理之平哉？夫婦之際，以他人之制，爲終身之償。稍一違之，罪大惡極。烏乎！是亦可謂束於禮而失其和矣！”

但是，這些開明的立論，畢竟是空谷中的足音，史乘中的殘酷紀錄，稍一披覽，一件件極不人道的故事，立刻出現在眼前。同治七年（一八六八）的《旌表事實姓氏錄》（採訪局印行），洋洋八冊，只不過是江蘇九個縣的貞節名冊，就足以使我們震駭了！光緒以後，雖然沒出過這類巨帙，但從筆記和“實錄”中，還可以看到不少的鴻爪遺痕。

在“清會典”風教門裡，我們可以看到清政府對貞女節婦旌表的典範；在台南赤嵌樓的碑石上，我們可以看到乾隆十一

年（一七四六）貞烈坊的樣本。從這些典章和實物上，我們知道，光緒朝的一切旌表事實，都是“師承有自”的，都是有所本的，在觀念上有了這種背景，我們就可以正式探討本題了：

李慈銘“桃花聖解齋日記”（丙集二頁十九）光緒元年（一八七五）記道：

“近來婦女之以刲股旌者，累日有書，僂指難盡。蓋格令之外，請必見從。閨闈之中，事無左證。職彤管者，疲於鉛槧也！”

從這段記載裡，可以略窺當時節婦之多！

下面從“大清德宗景皇帝實錄”裡，酌輯此類史料，排比如下：

①卷三百三十五，光緒二十年（一八九四）甲午二月：

“旌表罵賊捐軀烈婦安徽渦陽縣袁旭占妻鄧氏；過門守制貞女直隸清苑縣監生李均聘妻錢氏；節婦大城縣民李柏齡妻陳氏。”（頁十六 a）

②卷三百三十九，光緒二十年（一八九四）甲午四月：

“旌表過門守貞安徽桐城縣張宗翰未婚妻章氏。”（頁六 a）

③卷三百四十四，光緒二十年（一八九四）甲午秋七月：

“以賊至投井，旌表新疆阜康縣濟木薩烈婦郭韓氏，及二女，如例。”（頁十 a）

④卷三百五十三，光緒二十年（一八九四）甲午十一月：

“旌表仰藥殉夫烈婦山東榮城縣候選通判于建基妻梁氏。”（頁八 a）

⑤卷三百五十七，光緒二十年（一八九四）甲午十二月：

“旌表未婚守志江蘇江陰縣候選巡檢夏詒植聘妻陸氏。”
（頁三 a）

⑥卷三百六十，光緒二十一年（一八九五）乙未正月：

“以捐設義學並建橋樑，予貴州思南府節婦楊周氏建坊。”
（頁三 b—四 a）

⑦卷三百七十，光緒二十一年（一八九五）乙未六月：

“以捐助學曰經費，予四川羅江縣文生何自興爲其父母；
暨雅安縣孀婦余氏，各建坊。”（頁十七 b）

⑧卷三百七十四，光緒二十一年（一八九五）乙未八月：

“以捐宅作節孝祠，並籌祭費，予四川郫縣節婦彭鄭氏爲
其故翁姑建坊。”（頁五 b）

⑨卷三百七十五，光緒二十一年（一八九五）乙未八月：

“追予各省陣亡殉難官紳署安徽壽春營外委傅沛霖等，士
民湖北漢陽團長哈清源等，婦女陝西白水縣文童吳凌雲
妻節婦馬氏等，共一千一百二十一員名口，分別旌卹，
並建祠建坊如例。”（頁五 a）

⑩卷三百八十二，光緒二十一年（一八九五）乙未十二月：

“予臨陣傷亡陝西副將唐煥文優卹；妻符氏慟夫殉節，並
予旌表。”（頁十四 a）

⑪卷同上：

“追予各省陣亡殉難官紳婦女等一千一百二十二員名口，

分別旌卹如例。”（頁十六 a）

⑫卷同上：

“以臨難抗節，予奉天復州文童王聖德；暨民人徐廣升妻王氏，旌表。”（頁十八 b）

⑬卷同上：

“追予陝西陣亡殉難官紳婦女等一百六十二員名口，分別旌卹如例。”（頁二十一 b）

這些紀錄沒有一條不是“歿世而名不彰”的記錄，望門寡也好，殉節也罷，這些可憐女子們的一片癡心，只能“彰”了一下他們丈夫或未婚夫的名字，而她們自己那些“芳名”，卻和她們的癡心一樣，——一起擲諸虛牝了！

一九六二、一、十五，夜十一時半動手寫，
七小時寫畢，在碧潭山樓。

參考文獻及實物：

- 一、俞樾：《右台仙館筆記》（春在堂全書本）。
- 二、宋恕：《六齋卑議》（敬卿樓叢書本）。
- 三、嚴復譯：《法意》（嚴譯名著叢刊本）。
- 四、《旌表事實姓氏錄》（同治七年十二月採訪局印行）。
- 五、《清會典》。
- 六、台南赤嵌樓藏蔡偕娘貞烈坊（乾隆十一年十一月奉旨旌表故處士張金生妻蔡氏，丙寅季秋穀旦立）。
- 七、李慈銘：《桃花聖解齋日記》（丙集）。
- 八、《大清德宗景皇帝實錄》（大滿洲帝國國務院發行）。

從高玉樹爲兒子“冥婚”看中國兩面文化

五月廿九號中午，台北市長高玉樹先生的大少爺高成器，在山仔后別墅，突然跟吳家大小姐吳純純雙雙服毒，從容自殺。出事以後，高玉樹先生和女方家長們“悲喜交集”——在喪事中加辦了一樁喜事，爲這兩位青年人補辦一場婚禮。消息傳出，大家只注意這個事件的新聞意義，但它的歷史意義，卻看不見有誰提出來。

“冥婚”有歷史意義嗎？有的，不但有，並且有得源遠流長。中國歷史上最著名的“冥婚”事件，是在紀元二〇八年——一千七百六十年前的曹冲冥婚。曹冲是曹操的小兒子，是個神童。當時孫權送來一頭大象，曹操要知道有多重，誰也沒辦法，虧得曹冲想出了刻舟求“重”的主意，才算把問題解決。曹冲的主意，其實與希臘科學家阿基米德（Archimedes）稱皇冠方法同出一轍，他若早生四百多年，並且生在希臘，一定前途大有可爲。可惜他生在一個權力起伏的世家裡。他死的時候，他的哥哥曹丕（後來的魏文帝）勸他爸爸不要難過，曹操諷刺說：“此我之不幸而汝曹之幸也！”原來曹操太愛這個小神童，曾打算叫他代他哥哥接棒。

曹冲死的時候只有十三歲，曹操難過極了，認為這小孩連婚都沒結就死了，太說不過去了，因此打主意替他來一次“冥婚”。正好邴原有一個女兒早死了，曹操找到很重義氣的邴原，要把兩個孩子“合葬”，不料邴原卻不買賬，邴原說：

“原之所以自容於明公，公之所以待原者，以能守訓典而不易也！若聽明公之命，則是凡庸也！明公焉以為哉？”

你不能不佩服曹操是很有度量的人，他碰了手下人的釘子，並不生氣，可是也不洩氣，他還是要給兒子討媳婦，他並不要守什麼訓典而不易，他終於找到了一位甄家的女孩兒，跟他心愛的曹冲，來了一次合葬。

故事說完了，讓我們來看看理論。

邴原為什麼拒絕曹操呢？他的理論根據冥婚合葬不合於“訓典”，他所指的“訓典”，顯然是指《周禮》這部經書而言。在《周禮》的“地官”媒氏一節，有這樣的話：

“禁遷葬者與嫁殤者。”

再按注解，“遷葬”是指“生時非夫婦，死而遷葬之，使相從”；“嫁殤”是指“十九以下未嫁而死者”，“謂嫁死人也”。兩者統而言之，都是冥婚合葬。而這種冥婚合葬，不管死者成年沒成年，按諸傳統經典，都是違背的，在中國“正宗”思想中，對這些是完完全全明明白白禁止的。

從反面角度推測，中國經典中對冥婚的禁止，正暴露了冥婚的流行。《周禮》這部書，專家結論是戰國的作品，所以，書中禁止冥婚的話，足以反證當時這一現象的普遍。前面所引《三國志》中曹操的例子，顯然曹操是有所本的，只不過他本

的，是民俗中的傳統文化，而不是經典中的傳統文化。

曹冲的冥婚是中國史中第一件最有名的冥婚，在曹冲以後，歷朝各代都不乏顯例，換句話說，歷朝各代都不乏有違背經典的人出來，主持儀式，大結其鬼婚。例如在“大隋左式武衛大將軍吳公李氏女墓誌”碑中，就有這樣的話：

“女郎姓尉字富娘，河南洛陽人。……以大業十一年（紀元六一五）五月十三日，終於京師京宅，春秋以十有八。……母氏痛盛年之無匹，悲處女之未笄，雖在幽媾，婚歸於李氏，共罕无爽，同穴在斯。”

這是曹冲死後四百多年的例子。

到了唐朝，冥婚仍舊流行，甚至流行到皇家。《舊唐書》懿德太子傳：

“中宗即位，追贈太子，諡曰懿德，陪葬乾陵。仍爲聘國子監丞裴粹亡女爲冥婚，與之合葬。”

這是前面那位尉富娘小姐，死了出嫁後九十年的事。

在唐朝，有冥婚不稀奇，稀奇的是還有冥婚後的離婚。唐朝的韋后爲她弟弟，與蕭至忠的女兒結了冥婚，合葬以後——

“及韋氏敗，至忠發墓，持其女柩歸。”

老泰山做了盜墓人，你說怪不怪？

唐朝冥婚流行的程度，不但見之於實事，並且載之於小說。戴君孚《廣異記》中，就有這種“倩女幽魂”式的故事，可見這類思想，早已深入民間。

在宋朝文獻中，更可看到冥婚的細節。唐魯之《昨夢錄》

一書裡，這方面記載最多。元朝以後的冥婚，從《馬可波羅行記》，直到清朝孫樸的《餘墨偶談》、凌揚藻的《蠡勺論》等，都有不少材料，我不再多舉了。

民國以來，冥婚的風俗也相沿不衰。我舉民國十二年《中國民事習慣大全》第四編《冥婚之習慣》裡的兩段，以見一斑：

娶鬼妻（河南河北等處習慣）豫西河北等處，凡子未婚而故，往往擇別姓字而殤之女，結爲冥婚。俗謂之“娶鬼妻”，又曰“配骨”，以結婚後往往合葬也。

冥配（浙江平湖縣習慣）平湖縣，上中下三等社會，凡子弟未婚夭亡，類多擇一門戶相當，年齡相若之亡女，爲之定婚，迎接木主過門，禮節如生人嫁娶，名曰“冥配”。蓋以不如是，則靈魂將無所依歸，不能入祠祭祀，且不能立後。一經冥配，即取得被繼承人之資格，得爲之立後也。

至於台灣，冥婚的風俗，也和大陸各地一樣，除流行死人與死人結婚外，還有活人跟死人結婚的風俗。最有名的前例，是丘念台先生的父親丘逢甲先生跟林家小姐的冥婚（詳情見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二十二號《新生報》丘秀芷的《我的家族中，有關人鬼聯姻的故事》）。關於這方面的研究，有林瑞芳的《台灣冥婚制與記事》最爲生動，這篇文章，收在婁子匡編的《婚姻大事》一書裡。

高市長爲他兒子的“冥婚”，轟動了整個台灣。很多人爲之長吁短歎，卻很少有人爲之左思右想——想這件事在歷史上的意義。因此，我“引經據典”的討論它一番。“冥婚”雖然

也是中國文化中的傳統“巨流”，可是它卻一直“藐視”傳統文化中的經典部份，於是，形成了中國文化的兩個面。這兩個面誰是誰非，就留給大家去爭個面紅耳赤吧！

一九六八、六、十三。

歡喜佛

“歡喜”一個詞，最早見於《戰國策》。《戰國策》秦策記載武安君的話，說“長平之事，秦軍大克，趙軍大破，秦人歡喜，趙人畏懼。”佛教傳到中國以後，翻譯佛經的人，把這個本國語借來用做佛語，例如《法華經》譬喻品中，就有“歡喜踴躍”的話；並且，還把釋迦的弟子阿難陀尊為歡喜。此外有“歡喜海”、“歡喜賢”、“歡喜丸”、“歡喜日”等種種詞彙，歡喜兩個字，佛味很濃。

“歡喜佛”，是性交的佛像，性交姿式，以立姿為主。

為什麼有歡喜佛呢？歡喜佛的意義在哪兒呢？

歡喜佛出自梵語“歡喜天”（Mandikesvara），就是“難提計濕婆羅”。也叫“大聖歡喜天”、“大聖天”。歡喜佛是亂倫的佛，據“大聖歡喜供養法”，性交的當事人竟是“兄弟夫婦”！

“大聖自在天，烏摩女為婦。所生有三千子：其左千五百，毘那夜迦王為第一，行諸惡事；右千五百，扇那夜迦持善天為第一，修一切善利。此扇那夜迦王，則觀音之化身也。為調和彼毘那夜迦惡行，同生一類，成兄弟夫婦，示現相抱同體之形，其本因緣，具在大明咒賊經。”

爲了調合一千五百個做惡事的，才以一千五百個做善事的來配成“兄弟夫婦”，這一千五百個調和派，又是“觀音之化身”，由觀音出面，以性交的方法，來軟化惡行。這種設計，真絕透了。

清朝北京的雍和宮，本來是雍正沒當皇帝以前的住所，當時他是雍親王。他做皇帝後，把這地方賜給活佛章嘉呼土克圖，做爲西藏喇嘛的廟。歡喜佛像就這樣有了租界地。在雍和宮的溫度孫殿的樓上，赫然在焉的，就是大名鼎鼎的歡喜佛。佛像鑄得——照“故都文物略”說法——“窮極醜怪”。我小學時候，親眼看過，只記得要另外給喇嘛錢，他才帶給你看。上樓走的是陰暗的木梯，佛像不大。據我一《京華遊覽記》的描寫：

“殿有歡喜佛十餘，玻璃爲龕，垂以綢幕，揭視之，祕戲雜陳，殆所謂事事無礙者歟！有婦人裸卧，與一巨牛交，更數人伏於牛身者；有男女裸抱，而頂間腰際，懸人頭纍纍者。壁間懸圖，幕以黃綢，去幕審視，亦復如是；且多人與獸合，不知何說？遊客欲觀此，必更納資，又必先扃戶而後出以相示，寺僧殆奇貨居之也。”

“窮極醜怪”的佛像、“頂間腰際，懸人頭纍纍”，正是“其左千五百，毘那迦王爲第一，行諸惡事”的象徵，不了解“大聖歡喜供養法”這些佛經，自然就有“不知何說”的疑問了。

這是歡喜佛的第一層意義——軟化惡行。由調和派出面，大家歡天喜地，敦倫出善事。

這是佛書上的說法。

根據佛書以外的說法，歡喜佛的意義，還有別的。《清稗類鈔》宗教類“歡喜佛”一條，明指歡喜佛的意義在鼓勵生育：

“歡喜佛，作人獸交媾狀，種類甚多。有男與雌獸交者，有女與雄獸交者。相傳出自蒙古。某喇嘛因佛教盛行，人多持獨身主義，而不欲結婚。於是人種日衰，一部落僅有數人，見而大悲，恐人類之滅絕也，遂幻其說，謂交媾本佛所有事，製為各種雌雄交媾狀，名之曰‘歡喜佛’，獨身之俗漸消。後盛行於滿洲，而流弊所及，遂至淫風大甚，男女無別。大內交泰殿，即供奉歡喜佛之所也。”

這是歡喜佛的第二層意義——鼓勵生育。告訴人，獨身是不對的，“交媾本佛所有事”，連佛都性交，你人還清高什麼？

這是一種很動聽的解說。

《清稗類鈔》說歡喜佛“相傳出自蒙古”，是不清楚來龍去脈的話。歡喜佛實在是印度貨，是印度傳到西藏的佛像。它的動物模特兒是象、是牛，都是印度傳統中有神性的動物。《西藏新志》載：

“四月十五日，龍王塘大會，廟在水中，周匝水環，須以舟渡，而正殿旁特塑一大祕戲像，即俗所謂‘歡喜佛’。喇嘛云：‘是佛公佛母’。”

印度思想中，動物在地位上，並不低於人類，甚至有高的一面。這種觀點，不但印度有，從埃及古人到加拿大色里利(Salish)印地安人，很多地方都有。所以，一旦發生了“獸交”(bestiality)，並不認為是可恥或犯罪。(對“獸交”的嚴刑

峻法，是中古以後的事。)甚至印度還把它擬神化，這就是歡喜佛。據《大聖歡喜形像品儀軌》：

“夫婦二天，令相抱立，二天俱象頭人身，白肉色，著赤色裙，各以二手互抱腰上。”

正寫出“觀音之化身”是表現在“象頭人身”的造形上。前面引的文獻中，所謂“與一巨牛交”，所謂“數人伏於牛身”，所謂“多人與獸合”，所謂“作人獸交媾狀”，所謂“有男與雌獸交者”，所謂“有女與雄獸交者”，都是對“獸交”的一種擬神化。

這是歡喜佛的第三層意義——對“獸交”的擬神化。

值得注意的是，神很多，為什麼要選中觀音菩薩來出場，化身成人獸同體甚至雌雄同體的怪相？照上引“大聖歡喜供養法”的描寫，觀音該是女性或雌方。但觀音的性別，一般稍通佛理的人，卻和一般善男信女的想法不同。一般善男信女，都以爲觀音是女的，但一般稍通佛理的人，卻說觀音不是女的，只不過看起來像女人而已，觀音實際“男人女身”，根本是男的。

這個觀音是男是女的胡塗賬，所以發生，是由於一般人不看書的緣故。觀音是男是女，早在《瑯嬛記》裡有了精巧的解釋：

“一人問應元曰：‘觀音大士女子乎’？答曰：‘女子也’。又一人曰：‘經云觀音菩薩，勇猛丈夫，何也？’答曰：‘男子也’。又一人曰：‘觀音一人，而子一男之一女之者，非矛盾乎？’答曰：‘非也。觀世音無形，故普門品述現衆身爲人說

法，既能現衆身，則飛走之物以至蟻蠓醯鷄，皆可耳，豈直男女乎？”

由此可見，高明的解釋是觀音不男不女，亦男亦女，可男可女。不但可男可女，並且可以“現衆身”，上自飛禽，下至走獸，無一不可。因為觀世音本身是“無形”的，佛門弟子卻枉費心機為觀音造像、畫像，當然是可笑的。

說不定發明歡喜佛的人，是一個佛法高深的頑童，他故意用惡形惡相的歡喜佛來移俗、來諷世。這個頑童也許不是別人，就是觀音自己。我大膽的認為，這是歡喜佛的第四層意義。

在《元史》卜魯罕皇后傳裡，有這樣一段記載：

“京師創建萬寧寺，中塑秘密佛像，其形醜怪，后以手帕蒙覆其面，尋傳旨毀之。”

這顯然指的是歡喜佛。這表示了，十三、四世紀的時候，歡喜佛已經流傳到中國的新廟裡，雖然皇族對它還不習慣。到明朝，情形就不同了，明朝時候，歡喜佛已經直奔皇宮。世宗嘉靖十五年（一五三六），有大臣要求除去皇宮中的歡喜佛像，《通俗編》記錄如下：

“留青日札：禁中自來有佛堂釋殿，嘉靖時議除去。大學士李時、禮部尚書夏言入看‘大喜殿’，內有金銀鑄男女淫褻狀者，名曰‘歡喜佛’，傳聞，欲以教太子，慮其長于深宮，不知人事也。十五年五月，夏言題請毀滅。”

明世宗信道教入迷，所以“佛堂釋殿”吃不開了，歡喜佛淪為教太子房事的模型，最後還被“題請毀滅”。這樣看來，清朝

的歡喜佛像，大概是一批新貴，不是早來的那一批。

這段記錄告訴我們，歡喜佛出現的第五層意義，是教長在深宮的皇太子知道“人事”。到了清朝以後，照《清稗類鈔》說法，已達到“淫風大甚”的效果。這麼一來，歡喜佛的哲學意義、宗教意義、歷史意義、民俗意義、諷世意義等等，都給“垂以綢幕”了，——歡喜佛弗歡喜了。

歡喜佛在造形上，雖是外國貨，但在思路上，中外是心同此理的。一千八百年前，東漢桓帝時候的武梁祠石刻（祠在山東嘉祥），刻的就是伏羲女媧人首蛇身的交尾圖像。這種圖像表示了多種意義：血族相姦、人獸同體、天人交感、“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何嘗不跟歡喜佛的意義相像？歡喜佛離開了印度，窩藏在中國，構成了文化交流中的一個怪例，使人好奇，使人責備，使人皆大歡喜。

一九七九、一、三〇。以兩個小時初稿。

五、十。以四個小時修訂。

中國民族“性”

世界上，任何專家都犯一個毛病，就是自己這一行最最重要，人類沒有他這一行，就完了。事實上，他這一行雖非不重要，但沒重要到他所說的那種程度、那種比例。但專家絕對不肯這樣想，他只肯吹牛，不知道他在牛角尖裡。

歷史家也是專家，也自不例外。但歷史這一行縱面橫面比較寬，見識多一點。所以，歷史家吹牛的時候，位置從牛角尖朝下移，在牛角裡。

中國歷史家的專家作品很可憐，他們窮畢生之力，寫的東西，竟大多是“相斫書”，是“帝王家譜”，是“統治者起居注”，卻不是民族的活動史。換句話說，這種專家的毛病，橫批八字可盡——眼有牛角，目無全牛。

歷史本是全牛，專家既無法看這麼全，只好視而不見，只看他們牛角裡的。所以，在他們的作品中，他們只會唯來唯去，“唯物史觀”也，“唯心史觀”也，“唯帝王將相史觀”也，……唯個沒完。一不唯，他們就洩了氣。但一唯，就會過分擴大了他唯的，縮小或根本抹殺了他不唯的，結果牛是吹了，歷史真相，卻還坐牛車。

我願舉一個沒有被唯的例子，一段根本被抹殺了的歷史。
在《易經》的“序卦”傳裡，有這樣一段話：

“有天地，然後有萬物；
有萬物，然後有男女；
有男女，然後有夫婦；
有夫婦，然後有父子；
有父子，然後有君臣；
有君臣，然後有上下；
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措）。”

這是一篇很簡單的演繹，從“條件述辭”（conditional statement）中，我們可以知道，“男女”一項，在我們老祖宗的眼睛裡，究竟佔着怎樣重要的地位。——它是“天地”“萬物”以下，最被我們老祖宗重視的一環。它的地位，不但遠在“父子”“君臣”“上下”“禮義”之上，甚至還是產生這些抽象名詞的必要條件。

在同一部《易經》的“繫辭”下傳裡，又有一段看來跟上段有點矛盾的文字，簡直把“男女”的地位，超過“萬物”以上去了。原文是：

“天地絪縕，萬物化醇；
男女構精，萬物化生。”

這又明明是說，“男女”的“構精”，構成了“萬物”的“化生”。“天地”雖像麻縷（絪）棉絮（縕）般的附著在一起，可是“萬物”在這種附著的狀態下，只是醇醇重重的而已，並不能化而為一種生命體。只有在“男女構精”的條件下，才能把

“萬物”賦予生命。

這種對“男女”關係的熱烈頌讚，是我們兩千多年前，老祖宗的真知灼見，也是見諸於文書記載的最早史料。

除了這種文書的記載以外，還有更早的，那是實物的遺留。這種實物，最足以表示我們老祖宗的早期性觀念是一個什麼樣子。在陳仁濤的《金匱論古初集》（頁六，圖初一、〇九）裡，我們可以看到老祖宗們“生殖器崇拜”（phallicism）的圖片，那在河南安陽侯家莊發現的“石男根”——一條上面刻着三角繩紋饕餮的、青銅文化風格的石做男人生殖器。看過以後，我們可以恍然大悟：我們這個“禮義之邦”的民族，和世界上許許多多的民族一樣，也不例外的崇拜過這個玩藝兒，甚至崇拜得別有天地呢！

文書的記載和實物的證據，都證明了老祖宗們對“男女”問題早有認識，並且這種認識，從某些角度看來，甚至比今天的某些人還來得開明正確。至少老祖宗們沒有把“男女”之事看做卑惡不潔。相反的，他們要把“男女”捧在“父子”“君臣”之上，敬重膜拜，頂禮有嘉！

古史中，最能代表性觀念開通的例子，莫過於《戰國策》韓策中，秦國宣太后的一段話。宣太后對韓國來求救的使臣尚靳說：

“妾事先王也，先王以其髀加妾之身，妾困不支也；盡置其身妾之上，而妾弗重也。何也？以其少有利焉。今佐韓，兵不衆糧不多，則不足以救韓。夫救韓之危，日費千金，獨不可使妾少有利焉？”

這段對外國大臣現身說法，公開描寫性交姿勢的文字，不了解當時性觀念的開通程度，自然看了要大驚小怪。無怪乎清朝的王士禎，在他的《池北偶談》卷二十一“談異”裡，在“秦宣太后晏子語”條下，要歎氣說：

“此等淫褻語，出於婦人之口，入於使者之耳，載於國史之筆，皆大奇！”

其實，若了解當時性觀念開通的程度，這是毫不足奇的。

又如《左傳》宣公九年（紀元前六百年）這段記載：

“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皆〕通於夏姬。皆衷其袒服，以戲於朝。〔按此處在“穀梁傳”中記爲“或衣其衣，或衷其襦”，以相戲於朝。〕洩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且聞不令，君其納之。’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洩冶。”

這種不分君臣，一塊兒把大家共有的情婦的內衣，在廟堂上相互炫耀、大開玩笑的做法，不但呈露了“禮義之邦”“守禮謹嚴”的真相，並且十足反證了當時性觀念開通的程度。

性觀念的開通，原本是一種動物性的自然現象的流變，我們的老祖宗，本來是“灑脫”得很的。他們當時缺乏下列這一套觀念：

- 一、他們缺乏性的嫉妬的觀念。
- 二、他們缺乏貞操觀念。
- 三、他們缺乏羞恥觀念。
- 四、他們缺乏親父子的觀念。
- 五、他們缺乏“羅曼蒂克戀愛”（romantic love）觀念。

這五項重要的特徵，我們在古代的文書和實物裡，可以找到許多證據。這些證據，可以為我們描繪出一種景象——一種性開放的景象。

在這種性開放的景象裡，我們可以看到老祖宗們如何在生殖器崇拜、如何重視陰陽的理論、如何公然宣淫、如何“男女雜游、不媒不娉”、如何血族相姦、如何私通野合、如何同性戀和雞姦、如何性變態、如何寫《素女經》《洞玄子》、如何因“性”的因素成為中國歷史的重要一環，並且影響到部份中國民族的歷史。

仔細研究中國民族的歷史，會令人驚訝的發現，直接由於性的因素，直接影響了歷史、改寫了歷史的，例證又多，又層出不窮。夏桀是以“熒惑女寵”妹喜亡了國的，商紂是以“熒惑女寵”妲己亡了國的，性的原因使人亡國，不能說不重要。趙嬰的私通，引出趙氏孤兒；齊莊公的私通，引出臣弑其君，性的原因造成政變，不能說不重要。呂不韋的奇貨可居，禍延秦皇顯考；呂后的人彘奇跡，禍延劉家命脈；唐高宗的倒扒一灰，禍延武后臨朝；楊貴妃的順水人情，禍延安史之亂，性的原因鬧出君權爭奪，不能說不重要。白登的美女圖片，可以使匈奴不打漢家；漢家的美女自卑，可以使漢家要打匈奴；昭君出塞，香妃入關，一一都牽動戰爭和平大計，性的原因，不能說不重要。齊襄公亂倫，出來了毋忘在莒；陳後主好色，出來了井底遊魂，慕容熙的跣步送亡妻，出來了回不去；花蕊夫人的被劫入宮，出來了送子張仙；咸豐的天地一家春，出來了禍國殃民四十七年的西太后。……

這樣隨手寫來，好像大可“唯性史觀”一下了。其實我並

不這樣想。做爲一個“非唯主義者”，我不承認“唯性史觀”可用來解釋所有的歷史現象，如同我不承認“唯物史觀”或“唯心史觀”或“唯什麼什麼史觀”可用來解釋所有的歷史現象一樣。因此，我看這類事，也只是就中國歷史現象中，可從“性”的觀點來觀察的爲限。有均衡感的人，當然該知道，除了這種性的觀點與對象的歷史以外，還有許許多多“性以外的”丟人歷史和光輝歷史。

在中國許多“肯定‘性’的”（pro-sexual）歷史現象以外，另有一種“反對‘性’的”（anti-sexual）歷史現象，這種現象的表現是對“性”的規律、約束、乃至壓抑。它的發生，約有四種原因：

一、對“性”生神秘與恐懼

老祖宗們缺乏生理知識，他們對異性相交而產生的結果，感到神秘，也感到恐懼。

二、對“性”的疲乏

“性的疲乏”（sexual fatigue）是由性滿足後或過度後而生的現象，這種現象，很容易導致一種反動，——對性感到憎惡或厭倦，走向節慾或棄世絕慾的信仰。

三、嫉妬心和佔有心

在古代，女人只是男人的財產的一部份。由於對產業的佔有心，引發嫉妬心，再配合家庭、子女等觀念，慢慢建構出許許多多規律、約束、乃至壓抑“性”的理論。

四、精神因素

由於有人不能滿足現狀，要尋求精神上的慰藉來彌補塵世上的空虛，因而有“禁慾主義”（asceticism）或類似禁

慾主義的思想產生，於是，不得不宣揚“性”的罪狀，誇大或栽誣有關“性”的一切。

上面四種原因，構成了“反對‘性’的”條件，因而老祖宗們開始說明什麼是“惟禽獸無禮，故父子聚麀”了，什麼是“防隔內外，禁止淫佚”了，什麼是“婦道”“女誠”了，什麼是“男女不通衣裳”了，什麼是“富貴不能淫”了，什麼是“坐懷不亂”“秉燭通宵”了，什麼是“去勢”“幽閉”了，什麼是“絕房事”的好處了。……

這些“反對‘性’的”歷史現象，跟前面所說的“肯定‘性’的”歷史現象一樣，同樣成爲中國歷史的重要一環，並且也影響到中華民族的歷史。

從歷史角度來看，中國歷史上，“反對‘性’的”現象，至少在表面上佔了上風，所以規律、約束、乃至壓抑“性”的理論與事實，總是層出不窮。而經典、政府、理學、教條、迷信、教育、輿論等所層層使出來的勁兒，大多是在“解淫劑”(antiaphrodisiacs)上面下工夫，在這種層層“解淫”之下，善於掩耳盜鈴的人們，總以爲“沒有‘性’的問題”“中國是禮義之邦”！流風所及，一涉到“性”的問題，大家就立刻擺下面孔，道貌岸然的緘口不言，或聲色俱厲的發出道德的譴責。因此，“性”的問題，終於淪爲一個“地下的”問題。這樣重大的問題，居然千百年不見天日，怎麼能不發霉呢？

正因爲“性”的問題，被不合理的規律、約束、乃至壓抑，所以，我們的中華民族，才有了數不盡的“性”的“發霉”現象：從變童到“御女車”，從“螢幸”到“蝶幸”，從“肉台盤”到“肉屏風”“肉雙六”“肉吐壺”，從人狗交到姦屍

案，從纏小腳到丐戀，從老年癲狂到性戾換，從貞節牌坊到“冒恥求種”，從花旋風到壯陽藥，從自閹到閹人。……試問那一件不是中華民族歷史的一部份？試問有那一件我們敢說：“這不是我們中華民族幹的事？”

我們的歷史書，傳統寫法總是一派忠貞、英烈、聖賢、豪傑的歷史，搭配上貳臣、叛逆、奸佞、巧宦的活動，交織成歷來的衆生相。但是，受過現代方法訓練的人，他們不能承認這種“春秋之筆”“忠奸之判”能夠解釋整個歷史現象，也不承認單靠一些相殺相砍的政治史、耀武揚威的軍事史、仁義道德的思想史、四通八達的交通史等等就能了解過去。有現代方法訓練的人，他們嘗試用新的方向和角度、新的輔助科學（像性心理學、行爲病理學、記號學、行爲科學、團體動力學、統計學等等）來解釋歷史現象，來從夾縫中透視歷史。在這種新的方法的光照之下，以前所視爲神奇的，如今可能化爲朽腐了；過去所看做朽腐的，現在可能又化爲神奇了；過去當做不重要的或忽視的，現在我們要“無隱之不搜”了；過去當做不能登大雅之堂的，現在我們不再“見笑於大方之家”了。

有了上面所說的種種認識，我們必然發現：“性”在中國歷史上，是一個何等被有意忽略的大題目！我們必然關切：我們老祖宗們的“性”生活，到底是一個什麼樣子？他們的“性”行爲，怎樣成爲中國歷史上重要的一環？我們必然提出：“性”的因素，對中華民族的部份歷史，究竟影響到什麼程度？

能夠滿足這些聲音的，很顯然的，起碼是心理學家和歷史學家的責任。但是，事實上，我們的心理學家和歷史學家始終在“迴避”(?) 這個重大的研究主題，我們不能在這個主題上

做一次“科際整合”的示範，也不能在烏煙瘴氣的“性”的暗流裡做一次學理的澄清，為小百姓和大官人做點指示迷津的依據。……這些因“迴避”而生的缺憾，十足證明了我們在真理面前的萎縮，證明了我們在尋求真理上面的無能和膽怯。

這篇文章的用意，是嘗試用現代的方法，提出一些確定的解釋和“解釋草案”（explanation sketch），求出歷史上中國人“性”生活的真相和可能的真相，至少我提供的，是一種可供討論的合理懷疑，也許值得真的專家和學者的評判。

在現代方法的妙用下，歷史萬象雖多，其實不乏理路可尋。例如真的專家，一眼就可以看出《易經》中的“咸卦”等卦是描寫性交姿勢的；《詩經》中“褰裳”裡說的“且”字是男人生殖器；《周禮》中“地官”裡“令會男女”“奔者不禁”的話是一種“交配季”（mating season）、一種“節期雜交”（feast promiscuity）；《老子》中的“元牝”是女人生殖器；《論語》中孔夫子罵女人的緣故是因為他離過婚；伶玄“趙飛燕外傳”中的漢成帝有“足戀”；常璩“華陽國志”中的關雲長背離曹操是因為他吃醋；徐應秋“玉芝堂談薈”中“女子男飾”裡的六朝女子裝逞是性戾換；柳宗元“柳河東集”中“河間傳”是寫唐朝一個女人的花旋風；徐士鸞的“宋艷”中“殘暴”裡記宋朝的王繼勳是一種虐戀（虐待狂）；陶宗儀“輟耕錄”中“奇遇”一篇是寫元朝人性愛的白日夢；明朝張岱“瑯嬛文集”中“魯雲谷傳”是描寫潔癖；清朝薛福成“庸盦筆記”中“入相奇緣”裡寫和坤“對影談笑”是一種影戀。……所有的大量歷史文化，都禁不得真正專家的一雙法眼，用這種法眼來“復興中華文化”，才夠資格，否則只是口號。

關於這類性質的寫作，在西方很多。性質近的像泰勒（G.Rattray Taylor）的“Sex in History”（一九五三倫敦 Thames & Hudson 版）就是一例。西方過去，在基督教的禁慾主義籠罩下，對性的禁忌，跟歷史上的中國，真可說是老兄老弟。可是他們在近幾十年的努力之下，終於擺脫了傳統上對性的不合理的規律、約束與壓抑，終於使他們逐步走上一個開放的社會，建立一種“約定俗成”的性道德，培養了風俗，修正了法律，使他們的青年男女，又恢復了在“伊甸園”裡沒吃蘋果前的歌唱。

反觀我們中國，相對起來，我們不得不慚愧我們還是一個老大的閉鎖社會。對“性”的不合理的規律、約束與壓抑，還是這個閉鎖社會的主要閉鎖項目之一。從電影檢查到出版管制，從教條宣揚到性教育的空白，從警察的衝動到道德家陽萎以後的陰謀，已經把我們的“性”空氣攪得極不清潔。在這些不清潔的空氣裡，我們呼吸到的，是禁忌、是媽媽跟在屁股的後面的戀愛、是買賣式的婚姻、是手銬式的離婚、是情殺與毀容、是通姦的殘忍懲罰、是電影接吻的禁止、是情書的火葬與公佈、是春藥廣告、是春牛橫行、是廉價的初夜權、是文壇的新鴛鴦蝴蝶派、是姨太太第一號第二號、是婚姻法律的莫名其妙、是靈肉分裂、是衣服暴露的管制、是政府縱容的公娼、是私娼的七折優待、是節育的反對、是李敖這類先知式專題討論的完全缺乏。……

所謂“禮義之邦”的“國情不同”，以及所謂“有傷風化”的管制法令等等，都不是做為上述這些“性空氣不清潔”的護符，一切的護符，都更會增加我們恥辱的標記，——那跟西方

文明社會比起來，“性水準低落”的恥辱標記。

漫無心肝的中國知識份子，漫無心肝的日子太久了，實在應該認清自己，振作一下，洗洗這些恥辱的標記。

人能感動蝙蝠論

研究中國人想什麼，怎樣想，一定得注意中國人的怎樣想什麼。中國人有時候會發偉大的奇想，這種偉大的奇想，想人非非，使人怎麼也想不透人為什麼要這樣想，能這樣想，這樣想又何苦來。

中國人怎樣想什麼，七想八想，其中妙的很多。最妙的一則是，中國人相信“人事感天”，相信自然現象有時是受了人的感動而生，感動到火候十足的時候，可以“驚天地，泣鬼神”，可以“天雨粟，烏白頭”，可以“天地含悲，風雲動色”。

別以為這是中國民間愚夫愚婦的迷信，別以為這是我開玩笑，中國的第一流的知識份子，的的確確把這種怎樣想什麼，鄭重其事的認真處理。我舉一代大儒顧炎武為例。顧炎武在《日知錄》中有一篇《人事感天》，就公然胡扯如下：

“易傳言先天後天。考之史書所載，人事勤於下，而天象變於上，有驗於頃刻之間，而不容遲者。宋武帝欲受晉禪，乃集朝臣宴飲。日晚坐散，中書令傅亮叩扉入見，請還都謀禪代之事。及出，已夜，見長星竟天。拊髀歎曰：‘我常不信天文，今始驗矣！’隋文帝立晉王廣為皇太子，其夜烈風大

雪，地震山崩，民舍多壞，壓死者百餘口。唐玄宗爲臨淄王，將誅韋氏，與劉幽求等微服入苑中。向二鼓，天星散落如雪。幽求曰：‘天道如此，時不可失。’文宗以右軍中尉王守澄之言召鄭注，對於浴堂門。是夜拜出東方，長三尺。然則荆軻爲燕太子丹謀刺秦王，而白虹貫日；衛先生爲秦昭畫長平之事，而太白食昴。固理之所有。孟子言氣壹則動志，其此之謂與？”

這就是第一流知識份子滿紙荒唐言的第一號證據。

其實不怪顧炎武。顧炎武只不過師承前代那些大儒和大理論。前代那些大儒和大理論認爲“人事感天”，所謂“天”，從廣義理解，上自老天爺，下至一條豬，都無一不可以感動，無一不受人的“掌風”。

最早的感動文獻是《易經》。易經裡“中孚”卦說：

“豚魚吉”

意思是說，人類的誠信所及，那怕像豬那樣蠢的，像魚那樣冷血的，都可以一一感化，這種感化，有專門成語，叫“信及豚魚”。

既然豬也可以，魚也可以，理論上，什麼動物都應有“同感”。於是，感動的範圍就擴大到無所不包。於是，就出來鼎鼎大名的《祭鱸魚文》。

唐朝的韓愈到潮州，看到鱸魚爲患，他居然寫了一篇《祭鱸魚文》，給鱸魚一隻羊一隻豬，要鱸魚搬家，“其率爾醜類，南徙於海”！如果“冥頑不靈”，人類就要把你們殺光，你們不要後悔啊！據說鱸魚看了他的文章，就都搬走了。這篇千古妙

文，《古文觀止》就有，實在值得一讀再讀：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使軍事衙推秦濟，以羊一豬一，投惡谿之潭水，以與鱷魚食，而告之曰：‘昔先王既有天下，烈山澤，罔繩擲刃，以除蟲蛇惡物爲民害者，驅而出之四海之外。及後王德薄，不能遠有，則江漢之間，尚皆棄之，以與蠻夷楚越，況潮嶺海之間，去京師萬里哉？鱷魚之涵淹卵育於此，亦固其所。今天子嗣唐位，神聖慈武；四海之外，六合之內，皆撫而有之。況禹跡所揜，揚州之近地，刺史縣令之所治，出貢賦以供天地宗廟百神之祀之壤者哉？鱷魚其不可與刺史雜處此土也！刺史受天子命，守此土，治此民；而鱷魚睥然不安谿潭，據處食民畜、熊、豕、鹿、麋，以肥其身，以種其子孫，與刺史抗拒，爭爲長雄。刺史雖駑弱，亦安肯爲鱷魚低首下心，佞佞睨睨，爲民吏羞，以偷活於此邪？且承天子之命而來爲吏，固其勢不得不與鱷魚辨。鱷魚有知，其聽刺史言：潮之州，大海在其南，鯨鵬之大，蝦蟹之細，無不容歸，以生以食。鱷魚朝發而夕至也。今與鱷魚約：盡三日，其率醜類南徙於海，以避天子之命吏。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是終不肯徙也，是不有刺史聽從其言也。不然，則是鱷魚冥頑不靈，刺史雖有言，不聞不知也。夫傲天子之命吏，不聽其言，不徙以避之。與冥頑不靈而爲民物害者，皆可殺。刺史則選材技吏民，操強弓毒矢，以與鱷魚從事，必盡殺乃止。其無悔！’”

大家讀了《古文觀止》，以爲韓愈的神通只在寫這篇文章，就錯了。韓愈還有別的神通呢！別的神通，一看張讀寫的《宣室志》便知。張讀《宣室志》裡記泉州南面有山潭，“中有蛟螭，

嘗爲人患。”有一天，山崩了，山石填塞潭水，水流出來，其中有蛟螭的血。“而石壁之上，有鑿成文字一十九言，字勢甚古，郡中士庶無能知者。”後來這十九個字給韓愈看到了，他認出是“詔赤黑視之鯉魚天公卑殺牛人壬癸神書急急”，字體是“蝌蚪篆書”，“詳究其義，似上帝責蛟螭之詞令，戮其害也。”這個故事，表示了不但韓愈能夠同鯉魚說話、談判、寫文章，甚至老天爺也和他同感，不但對鯉魚的水友蛟螭說話、談判、發命令，還讓韓愈夾在其中，做了翻譯官。

這篇文章，寫到這裡，題目應該是“人能感動鯉魚論”，可是我害怕，不敢這樣寫。因爲前一陣子，剛發生了“誹韓案”，韓愈的後人(?)到法院控告寫文章批評韓愈的人，而妙不可言的法官大人，居然判了被告的罪。這是典型的一場文字獄。我李敖剛坐完了“叛亂罪”的大牢，黑獄亡魂，浩劫餘生，實在不敢惹韓愈（和他的鯉魚），只好另想題目。

幸虧我學富五車，居然被我找到好題目，叫做“人能感動蝙蝠論”。爲什麼又來了蝙蝠呢？請看明朝柳應聘的大文便知。

柳應聘在《先師廟驅蝠記》大作裡說，一座孔廟裡，因爲有容乃大，結果容來了許多蝙蝠，“醜類實繁，無慮千百，歲月滋久，勢不可驅。”大家“咸爲積憤，而無如之何也！”於是有“學正詹先生”來，十天齋戒，“又遣投蝠以食，而誓之一似昌黎（韓愈）諭鯉之旨。”於是，蝙蝠飛走了。還有個“學正黃先生”，也在這類廟中學韓愈方法，“以文諭之”，蝙蝠看了他的文章，也通通飛走了。

柳應聘這篇驅蝠記中，對這種行爲，提出“人能感動動物論”。他拿蝙蝠飛走事件，跟“徙鯉之功”比較：

“雖顯微巨細，事有不倫，然精誠所通，有感斯應。則曠百世而同符也！所謂誠能動物，而信及豚魚者，非耶？”

他認為這種現象，一點也不是偶然的，他說：

“夫氣盛者化神而績異者傳永，蓋自古志之矣！故魯公作宰，而蝗避；劉昆出牧，而虎渡；韓退之在謫籍，而鱷徙，雖時異事殊，而精誠之極，感通無間，其致一也。則其所以實著當時，而聲流後世者，豈偶然之故哉！”

看了這種妙論，再回頭核對“曠百世而同符”的《祭鱷魚文》，那篇文章，一再聲聲呼喚鱷魚的芳名，同牠交談，一次與牠約定，三次要牠聽話。全篇又講理、又講情、又哄、又勸、又賄賂、又罵、又挖苦、又威脅。韓愈費了那麼大的勁兒，前提當然是基於“鱷魚有知”，可以看懂他的大文章，可以曉以大義。這種由於動物有知，與人文相通，人的精誠，自然可以和牠們“感通無間”，可以“有感斯應”，最後自然構成了“人能感動動物論”。

在韓愈小的時候，一個“人能感動動物論”的先進馮希樂，一天，去拜訪縣太爺。縣太爺請他吃飯，酒席上，馮希樂拍縣太爺馬屁，說你太偉大了，你“仁風所感，虎狼出境！”縣太爺聽了，很高興。正在這時候，有小的跑來報告，說不得了了，昨天晚上有老虎吃了人！縣太爺一急，轉過頭來質問馮希樂：“你不說‘仁風所感，虎狼出境’了嗎？”馮希樂不慌不忙，回縣太爺的話，他說：“我們縣裡虎狼是出境了。這頭老虎，一定是別的縣裡過路的！”

一九七九、五、十四。三小時寫成。

人能感動老虎論

校對《人能感動蝙蝠論》的時候，意猶未盡，再寫一篇。

中國書中，關於這類記錄極多。大體上說，這都是一種“動物汎靈信仰”（zoological animism）的流變。鱷魚問題，並不是韓愈以後就完了，照《歐陽文忠集》的說法，好像鱷魚又回國了。歐陽修“陳文惠神道碑”說：

“潮州惡谿，鱷魚食人不可近。公命捕得，伐鼓於市，以文告而僇之，鱷患屏息。潮人歎曰：昔韓公諭之而聽，今公戮之而懼。所爲雖異，其能動異物醜類，革化而利人，一也。”

足證韓老一死，鱷魚又率其醜類，北歸中國了。歐陽修筆下的陳文惠就是陳堯佐，他在潮州，也寫過大作《僇鱷魚文》：

“己亥歲，予於潮州，作昌黎先生祠堂，作招韓詞，載鱷魚事以旌之。明年夏，郡之境上，地曰萬江，村曰硫黃，張氏之子，年甫十六，與其母濯於江浹，爲鱷魚尾去。其母號之勿能，披乎中流，則食之無餘。予聞而傷之，命郡邑李公，將郡吏往捕之。前後力之者，凡百夫，曳之而出。緘其

吻，械其足，檻以巨舟，順流而至。”

從內容看，全篇一律動武，我奇怪爲什麼歐陽修硬要說“以文告而修之”？大概鱷魚留學方歸，不好意思一下。

還是手裡有刀的人比較聰明，《清史稿》列傳第一〇八曹孝先傳裡，記有乾隆皇帝一段話說：

“蝗害稼，惟實力捕治，此人事所可盡。若假文詞以期感格，如韓愈祭鱷魚；鱷魚遠徙與否，究亦無稽。”

真比文人“天縱英明”得多了！

我寫了半天《人能感動鱷魚論》、《人能感動蝙蝠論》，卻忘了寫《人能感動老虎論》，現在補寫如下：

《後漢書》童恢傳，記循吏童恢做地方官的時候——

“民嘗爲虎所害。乃設檻捕之，生獲二虎。恢聞而出呪虎曰：‘天生萬物，唯人爲貴，虎狼當食六畜，而殘暴於人，王法：殺人者死；傷人則論法。汝若是殺人者，當垂頭伏罪；自知非者，當號呼稱冤。’一虎低頭閉目，狀如震懼，即時殺之；其一視恢鳴吼，踴躍自奮，遂令放釋。吏人爲之歌頌。”

這次比較簡單，沒寫文章，只是對老虎用嘴巴“曉以大義”而已，結果，一虎不能馬虎過關，一虎竟得人口餘生，公正廉明，一樣不少，真好！

這種人虎恩仇記，主角只是童恢和兩隻老虎嗎？才不呢，多得很呢！

一、《後漢書》宋均傳：“虎相與東渡江。”

二、《南史》杜慧度傳：“猛獸伏，不敢起。”

三、《南史》孫謙傳：“先是郡多猛獸爲暴，謙至，絕跡。”

四、《南史》傅昭傳：“郡多猛獸，常設陷阱，昭命去陷阱，猛獸竟不爲害。”

五、《南史》蕭曄傳：“舊多猛獸爲暴。曄爲政六年，此暴遂息。”

六、《南史》蕭象傳：“舊多猛獸爲暴，及象任州日，四猛獸死於郭外，自是寧息。”

七、《唐書》李紳傳：“霍山多虎，擷茶者病之。治機牢，發民跡射，不能止。紳至，盡去之，虎不爲暴。”

八、《明史》胡儼傳：“縣有虎傷人，儼齋沐告於神，虎遁去。”

九、《明史》張曷傳：“有寡婦止一子，爲虎所噬，訴於曷。曷於婦期五日，及齋戒告城隍神。及期，二虎伏庭下。曷叱曰：‘孰傷吾民？於法當死。無罪者去。’一虎起，斂尾去；一虎伏不動，曷射殺之。”

十、《明史》謝子襄傳：“郡有虎患，歲又旱蝗。禱于神，大雨二日，蝗盡死，虎亦遁去。”

夠了，夠了。

以上所寫，都限於一般人（文人、循吏等）對動物的感動，其中我有意做了一個重大的遺漏——不含孝子在內。爲什麼？因爲一扯上孝子，這種文章再也做不完了。中國歷史上，孝子和動物的關係，極爲錯綜複雜，從虞舜孝感動天，使“象爲之耕，鳥爲之耘”起，“涌泉躍鯉”也，“負土成墳”也，“虎即避去”也，“猛獸下道”也，“豺狼絕迹”也，“羣雁俱

集”也，“慈烏銜土”也，“雙鶴來下”也，“烏亦悲鳴”也，“犬乳鄰貓”也，“禱河鯪得”也，“水獺獻魚”也。……怎麼寫，也寫不完。換言之，每個孝子都可以開個動物園，他所感動的，又豈是蝙蝠、老虎而已！所以，我聲明在先，不含孝子在內。孝子一來，只有寫書，不能寫文章了。

一九七九、五、二四。一個小時完工。

鼓聲皦皦的中國之音

鼓是人類最早的樂器。從埃及到亞述，從印度到波斯，到處都有鼓的存在。世界各文化區，鼓的出現是不謀而合的。像西歐、英國那樣，連鼓的出現都要仰仗外來的那種情形，實在少有。西歐、英國的鼓，是羅馬傳過去的。

中國的鼓，遠在有文字以前就出現了^①。隨着文化的進步，鼓的演變，也越來越複雜。開始有管鼓、教打鼓的官，叫“鼓人”^②，以八面^③“雷鼓”祀天神，以六面“靈鼓”助社祭，以四面“路鼓”享宗廟，以及打仗有“鼙”鼓^④，做工有“鼗鼓”^⑤，前者聲音又大又快，可助軍威；後者聲音又小又慢，有工慢慢做，因為“用民之力，宜緩不宜急”所以這種鼓，是種磨洋工的鼓。在日蝕月蝕的時候，要用“王鼓”，中國古人認為，日蝕月蝕都是“陽為陰所勝”，必須由皇帝親自出馬，“鼓以救之”。鼓官這個時候，看皇帝打，他休息^⑥。照這個標準看，鼓官平時只是代皇帝勞而已，緊要關頭，鼓手就是皇帝。鼓聲本是一種強烈意願的傳達，這種意願，當然當權者最多。所以，最早的鼓聲，都是替當權者表達意願的。五代時候，兒皇帝石敬瑭請一個老道來講經，老道叫張薦明，石敬瑭

拜他爲師。那時候，已是十世紀，鼓聲已經用來表示幾點鐘^⑦。老道聽了鼓聲，向石敬瑭說，鼓聲雖然只是一種聲音，但把許多聲音統一起來，就是它。“夫一，萬事之本也。能守一者，可以治天下^⑧。”這就是出家人逢迎兒皇帝的鼓聲哲學。

鼓對當權者而言，既然這麼密不可分，它就成爲一種權威的象徵。漢光武皇帝抓起韓歆，“置鼓下，將斬之”^⑨。要殺人爲什麼放在鼓下面？鼓聲響起和人頭落地，是此起彼落的關係啊！

鼓的作用這麼大，所以，什麼時候擊鼓，什麼時候不該擊，學問很多。傳說裡大禹治水，叫他太太即塗山氏大小姐送飯，約定一聽鼓聲，就送來。於是大禹化做一條熊，開始做工。挖石頭的時候，不小心一塊石頭擊中了鼓面，塗家大小姐以爲打鼓了，送飯過來，見到丈夫竟是熊，一扭就走了。到了嵩山之下，她變成石頭，生了大禹的兒子夏啓^⑩。夏啓是中國君主世襲制的大老，是家天下的禍首，追根究柢，天下爲公的讓賢傳統被斷送，原來出在那塊可惡的石頭敲在那張可惡的鼓皮上。

這個是不該擊而擊，擊出了禍；還有該擊而不擊，也出了禍。春秋宋國、楚國作戰，楚軍渡河時，人勸宋襄公迎擊；他不肯；等楚軍登陸了；人又勸他迎擊，他還不肯；直等到楚軍上岸後，把陣勢擺好，他才下令打，結果大敗，受傷而死。死前還大講原則，說“君子打仗，不打受了傷的，不捉頭髮白的。古人用兵，不佔地利險阻便宜。就是亡了國，我也不向沒擺好陣勢的敵人鳴鼓而攻^⑪。”

中國歷史上，有個最能把握擊鼓時機的記錄：魯國、齊國

之戰，齊軍一到，魯莊公就要擊鼓，曹劌說別忙。等到齊軍擊了三次鼓以後，魯軍才擊第一次鼓，最後把齊軍打敗。曹劌的理論是：“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齊軍已經衰竭時候，魯軍才開始一鼓作氣，可以佔便宜^⑫。

在戰場上，鼓有鼓舞士氣的作用，人人都相信。鼓舞不起來，就表示有了別的毛病。漢朝時候，李陵打匈奴，發現鼓不靈了，他奇怪“吾士氣少衰，而鼓不起者，何也？”他判斷部隊中有了女人。大搜之下，證明判斷正確^⑬。笑話中女人能使老和尚小和尚紛紛打鼓，卻使李陵的軍人，鼓不起來，真是顛倒衆生了。難怪女人親自出馬打鼓，仗一打就贏，——宋朝韓世忠夫人前京口妓女梁紅玉是也^⑭。

鼓的用途，除了前面說的祭祀、示威、作戰、督工、報時等以外，它在中國，還有一個特殊的作用，就是傳達“下面的聲音”。

傳說在唐堯的時候，就設置了“敢諫之鼓”。“路史”上記：

“帝堯陶唐氏置敢諫之鼓。”

這種敢諫之鼓，表示大臣如果對皇帝有所諫諍，皇帝歡迎。爲什麼歡迎呢？王起“諫鼓賦”裡說：

“先王懼五諫之或替，恐四聰之有蔽，爰立鼓於朝，得爲邦之制，臣之擊也。”

這說出了，立敢諫之鼓的目的，就在怕皇帝聽不到該聽到的聲音，而變得聽覺有遮蔽了。白居易在“敢諫鼓賦”裡，把用鼓的原因進一步說明：

“大矣哉！唐堯之爲盛！鼓者，樂之器；諫者，君之命。鼓因諫設，發爲治世之音；諫以鼓來，懸作經邦之柄。”

“得爲邦之制”，“經邦之柄”，都說明了這種諫鼓的重要。白居易認爲，諫鼓是上下交通的一種管道，它的好處是：

“用之於朝，朝無面從之患；行之於國，國無居下之訕。洋洋盈耳，幽贊逆耳之言；坎坎動心，明啓沃心之諫。”

有了它，大家就可以有話直說，皇帝可以聽到逆耳之言，臣下背後的訕謗，也就沒有必要了。

唐堯時代到底有沒有設置諫鼓，不可確知。但這種設置諫鼓的記錄，在古書中倒也經常出現：

《大戴禮》保傳：“於是有進善之旌，有誹謗之木，有敢諫之鼓。”

《管子》桓公問：“禹立諫鼓於朝。”

《呂覽》自知：“堯有欲諫之鼓，舜有誹謗之木，湯有司過之士，武王有戒愼之鞀^⑤。”

《鄧析子》轉辭：“堯置敢諫之鼓，舜立誹謗之木，湯有司直之人，武有戒愼之銘。”

《路史》：“禹……立諛幡，陳建鼓。”

《漢書》賈誼傳：“太子旣冠，成人，則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

《淮南子》主術訓：“堯置敢諫之鼓，舜立誹謗之木。”

《後漢書》楊震傳：“臣聞堯舜之世，諫鼓謗木，立之於朝。”

《晉書》元帝本記：“太興元年六月戊戌，初置諫鼓謗

木。”

這些古書中的記載，都證明諫鼓是臣下向皇帝進逆耳之言時的一種道具。所以，諫鼓本身，有一種象徵作用，象徵皇帝給臣下一種“勸他”的機會。有了這些忠臣勸他，他就不會“四聰之有蔽”，就可以推行好的政治。所以白居易說：“鼓因諫設，發爲治世之音。”鼓之爲用大矣哉！

中國人用鼓來傳達“下面的聲音”，除了諫鼓以外，另一種是“登聞鼓”。諫鼓是給做官的勸皇上用的；登聞鼓是給小百姓喊冤用的，兩者雖然都傳達“下面的聲音”，作用卻不一樣。登聞鼓可算是一種非常上訴。

中國古代小百姓，有了冤，要想法使上面知道；知道的方法，要寫狀子；一寫狀子，就參加了文書政治，一參加了文書政治，就有被歸檔的危險，石沉大海。何況，小百姓大多是文盲，不會寫狀子。所以，直接的辦法是喊出自己的冤枉，叫“喊冤”，叫“青天大老爺，小的有冤上訴！”

由於官官相護，小百姓的冤喊不上去。“冤”字在中國文字裡，是象形文字，上面是個罩子，下面是個兔子，把兔子罩住，兔子被困其中，當然無辜，正好叫做“冤”。如今小百姓變成兔子，無法免脫，又喊不上去，統治者“天下無冤民”“民自以不冤”的美夢，自然就大大打折扣，殊非統治者所願。

於是，聰明人出來，發明了一種人權道具，就是“登聞鼓”。

登聞鼓是皇宮外面擺設的一種大鼓，鼓一敲，理論上，皇帝可以直接聽到，要想官官相護，也護不住。這種敲鼓請皇帝注意的法子，傳說出自唐堯時代。但最初敲鼓是大臣勸皇帝用

的，不是小百姓喊冤用的。小百姓喊冤，還得等四千年。

最早的登聞鼓雛形，勉強可算夏禹時代的“揮鞞”。《通志》上說夏禹時候“有訟獄者揮鞞”。直到一世紀漢朝元帝時候，爲了開城門的問題，曾有過小百姓敲鼓上書的例子，但不是常例。三世紀魏世祖曹丕（曹操的兒子）以後，正式出現了“登聞鼓”。據《魏書》刑罰志：

“世祖闕左懸登聞鼓，以達冤人。”

“以達冤人”，目的明顯是給老百姓喊冤的。

接着，司馬懿的孫子、司馬昭的兒子晉武帝，也繼承了這種傳統。在晉武帝時候，有個叫邵廣的，他偷了政府東西，被判死刑。他的兩個小兒子，“搥登聞鼓乞恩”，請皇上許他們做奴隸，代父親贖罪。皇帝同意，於是小偷改判五年，小偷之子做奴隸。這個故事，說明了登聞鼓的用途，不但可以申冤，還可以“乞恩”求情。

但登聞鼓不是可以亂敲的。《晉書》武帝本紀記載：

“泰始五年六月，西平人麴路伐登聞鼓，言多妖謗。”

向皇帝說話，內容被認爲“言多妖謗”，下場可想而知。據《明外史》青文勝傳：

“文勝爲龍陽典史，龍陽瀕洞庭，歲罹水患，積逋賦數十萬，敲扑死者相踵。文勝慨然詣闕上疏，爲民請命；再上，皆不報。復具疏，擊登聞鼓以進，遂自經於鼓下。太祖憐其爲民殺身，詔寬龍陽租。邑人建祠之。”

這就是說，做官的“詣闕上書”達不到目的，也可以“擊登聞

鼓以進。”但是下場是可想而知的，乾脆先在鼓下自殺，反倒省事。

登聞鼓可能有言論自由，但沒法擔保有言論以後的自由。

到了六世紀，隋高祖時候下命令，老百姓有冤上訴，經過各級官府仍舊得不到公平的，可以“詣闕申訴”，就是到宮闕前面告御狀。至於如何告法，沒有細節可查。隋高祖是一個很苛待百姓的皇帝，老百姓偷一升邊糧或一塊錢的，都要殺頭，這樣兇來兮的皇帝，究竟有誰敢去告御狀？

《唐會要》裡記高宗“顯慶五年八月，有人齎鼓於廟堂。訴上，令東都置登聞鼓，西京亦然。”這是七世紀六六〇年的事，明明指出由於“有人齎鼓於廟堂”，才有登聞鼓的設立。反證以前的登聞鼓制度，早已中絕。

唐朝的女皇武則天時候（七世紀），也有“登聞鼓”的記錄。據《玉海》：

“垂拱元年二月，勅朝堂登聞鼓、肺石不須防守，令御史台受狀爲奏。”

這個記錄告訴我們，雖然有“登聞鼓”，可是已是令御史轉達民意了，不是直接“上干天聽”了。

到了十世紀，五代後周世宗時候，有“抱屈人”帶着鼓到皇宮敲鼓喊冤，皇帝知道了，“遂令東西都各置登聞鼓”。周世宗是五代最開明的皇帝，但是很短命，第二年，他三十九歲，就死了。一死就被趙匡胤“黃袍加身”，創立了宋朝，趙匡胤變成了宋太祖；宋太祖又被弟弟趙匡義“燭影斧聲”，搶去老大一支的繼承權，成了宋太宗。他把“理檢司”這衙門改成

“登聞院”。“又置鼓於禁門外，以達下情，名曰‘鼓司’。”這是十世紀尾聲的事。登聞鼓又出現在宮庭門外了。當時最有名的一個故事，是《宋史》刑法志裡所載的張反鳴冤。張反的丈夫王元吉，被他晚娘誣告想毒死晚娘，如此不孝還得了，被捉將官裡，大事修理。修理的花樣很多，其中有一種叫“鼠彈箏”，毒刑以後，手指全不能動。王元吉吃不消，只好誣服。張反遂去擊登聞鼓鳴冤，居然被皇帝知道了，下令追查，查出晚娘原來有姦情，被王元吉撞破，所以才誣告他下毒。於是，皇帝把修理人的抓起來，也來一番“鼠彈箏”，讓他享受。最後，皇帝向宰相感慨說：“在首都裡，竟都有這樣無法無天的刑求和冤獄，首都以外的四方，還得了嗎？”

十一世紀，宋太宗的兒子宋真宗，改“鼓司”為“登聞鼓院”。《玉海》記載：“景德四年五月，改登聞鼓院於闕門之前”。再據宋朝人寫的《燕翼貽謀錄》：

“真宗景德四年，詔改鼓司為登聞鼓院，登聞院為檢院，應上書人並詣鼓院，如本院不行，則詣檢院以朝官判之。院判名始於此。”

可見登聞鼓直接向皇帝登聞的本意，已經開始打折扣、變質，變成了衙門，還是落入了官官相護，皇帝又很難聽到鼓聲了。

不但皇帝聽不到，連衙門自己甚至都聽不到了。宋朝人寫的另一部書——《齊東野語》，轉記過這樣的笑話：

“今登聞鼓，初供職吏，具須知單狀。稱本院元管鼓一面，在東京宣德門外，被太學生陳東等擊碎，不曾搬取前來。此類可資捧腹。”

登聞鼓的制度，一直到清朝還有^⑩。清朝阮葵生寫“茶餘客話”，卷七“登聞院”條下，還有這樣的一行：

“登聞院，在西長安門外街之東。舊設滿、漢科道各一員掌之。雍正二年統於通政司。”

“通政司”是一個管下情上達的衙門，管“內外章疏敷奏封駁之事”，也管“四方陳情建言、申訴冤滯、或告不法等事。”但是，它不能算是一個直接使下情上達的衙門，它攔在中間，使下情變成間接的。一變成間接的，還登聞什麼鼓聲呢？

最後，在光緒二十八年（一九〇二），通政司廢除了，登聞鼓當然也沒了，這麼一點象徵性的下情上達的道具，也在中國歷史上消失了。

二十世紀以後，法院裡出現一種“申告鈴”。根據“刑事訴訟法”第二百四十二條的解釋是：

“告訴、告發，應以書狀或言詞向檢察官或司法警察官爲之；其以言詞爲之者，應制作筆錄。爲便利言詞告訴、告發，得設置申告鈴。”

這種“按鈴申告”的制度，依稀是登聞鼓傳統的一項小小規模的電氣化。

人民有冤，直接碰到的還是官官官。直接碰不到統治者。即使他願意付出敲登聞鼓的代價，他也沒鼓好敲了。

鼓聲在朝上面傳達“下面的聲音”，但當“下面的聲音”傳達不到的時候，鼓聲也就遺之草澤，化成了民怨。最有名的鼓聲中的民怨，就是“鳳陽花鼓”。“陔餘叢考”有“鳳陽丐者”的記述，裡頭說：

“江蘇諸郡，每歲冬，必有鳳陽人來，老幼男婦，成行逐隊，散入村落間乞食，至明春二三月間始回。其唱歌則曰：

家住廬州並鳳陽，
鳳陽原是好地方。
自從出了朱皇帝，
十年到有九年荒。”

這個花鼓歌，從明朝太祖朱元璋皇帝開國以來，一直流傳在民間，成為民間向黑暗統治者的一種抗議，一種普遍的抗議。這種抗議，跟不得志的知識份子合流，更出現了深度。明朝亡國以後，跟新政府不合作的知識份子賈堯西，曾用他寫的鼓詞，質問縱容統治者的天道：

“忠臣孝子是冤家，
殺人放火的天怕他。
倉鼠偷生得宿飽，
耕牛使死把皮剥。
河裡游魚犯了何罪？
刮了鮮鱗還嫌刺扎。
殺人的古劍成至寶，
看家的狗兒活砸殺。
野鷄兔子不敢惹禍，
剁成肉醬加上蔥花。
殺妻的吳起倒掛了元帥印，
可怎麼頂燈的裴瑾捱了些嘴巴？
玻璃玉盞不中用，
倒不如錫鐵壺瓶禁磕打。

打牆板兒翻上下，
運去銅鐘聲也差。
管叫他來世的鶯鶯醜如鬼，
石崇託生沒板渣。
海外有天，天外有海，
你腰裡有幾串銅錢休浪誇。
俺雖沒有臨潼關的無價寶，
只這三聲鼙鼓走天涯。”

鼙鼓就是皮鼓，就是北方流行的大鼓。寫這鼓詞的人，是明朝的進士，他用深入民間的鼓詞，有深度的傳達了他的否定天道、否定宿命、否定愚忠、否定黑暗統治者的思想。從禰衡“擊鼓罵曹”以來，鼓聲代表了一種抗議，跟雷鼓、靈鼓、路鼓、鼗鼓、鼙鼓分道，也跟諫鼓、登聞鼓分道，它不再是官方的聲音，也不再是勸告官方、乞求官方的聲音，它終於變得屬於了自己，屬於了小百姓自己的聲音。

一九七九、五、十一。

注：

- ① 應劭《風俗通》說：“謹按易稱鼓之雷霆，聖人則之，不知誰所作也。”《黃帝內傳》說黃帝伐蚩尤，元女做鼓八十面，當然不可信。
- ② 《周禮》地官：“鼓人，掌教六鼓四金之音聲，以節聲樂，以和軍旅，以正田役，教爲鼓而辨其聲用。以雷鼓鼓神祀，以靈鼓鼓社祭，以路鼓鼓鬼享，以鼙鼓鼓軍事，以鼗鼓鼓役事。……救日，則詔王鼓；大喪，則詔大僕鼓。”
- ③ 所謂幾面，事實上是幾個一組的意思。八面就是八個一組。詳細討

論見“雲麓漫抄”。

- ④ 鼗唢填。
- ⑤ 鼗唢高。《周禮》鄭鍔注說“用民之力，宜緩不宜急。……其聲尤緩，故宜用以鼓役事。”
- ⑥ 《周禮》項氏注：“日爲月勝，故食於朔；月不受日光，故食於望。是皆陽爲陰所勝，故鼓以救之，助陽氣也。王親鼓之，鼓人詔之耳。”
- ⑦ 古代人用鼓報時，據《唐書》馬周傳：“先是京師晨暮傳呼以警衆，後置鼓代之。俗曰鑿鑿鼓。《靈異小錄》：‘馬周上言：令金吾每街隅懸鼓，夜擊以止行李、備竊盜。時人遂呼爲鑿鑿鼓。’《五代史》司天考：‘顯德元年正月庚寅，有大星墜，有聲如雷，牛馬皆逸。京城以爲曉鼓，皆伐鼓以應之。’宋敏求《春明退朝錄》：‘京師街衢置鼓於小樓之上，以警昏曉。太宗時命張洎製坊名列牌於樓上。按：唐馬周始建議置鑿鑿鼓，惟兩京有之。後北都亦有鑿鑿鼓，是則京師之制也。’但因迷信的緣故，有的不打晚上的一道。據《暇日錄》：‘成都不打晚衙鼓，劉仲、張潛夫皆說，云蜀多以晚鼓戮人，埋毬場中，故鳴鼓則鬼祟必作。自是承例不打鼓。’
- ⑧ 《五代史》張薦明傳：“薦明爲道士，晉高祖延入內殿講道德經，拜以爲師。薦明聞宮中奏時鼓，曰：‘陛下聞鼓乎？其聲一而已。五音十二律，鼓無一焉，然和之者，鼓也。夫一，萬事之本也，能守一者，可以治天下。’高祖善之，賜號通元先生。後不知其所終。”
- ⑨ 《後漢書》岑彭傳：“光武徇河內韓歆議，欲城守，彭止不聽。既而光武至，懷歆迫急，迎降，光武知其謀，大怒，收歆，置鼓下，將斬之。召見彭，彭因進說，光武深納之。”
- ⑩ 《誠齋雜記》：“禹治水，過轅轅山，化爲熊。謂塗山氏女曰：‘聞鼓聲乃來餉’。禹排石，誤中鼓，塗山氏往，見禹作熊，慙而去。至

嵩山下，化爲石，方孕啟。”又據《列女傳》：“啟母者，塗山氏長女也。”

- ⑪ 《左傳》僖公二十二年：“宋公及楚人戰於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及濟，司馬請擊之。公曰：‘不可。’宋師敗績，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爲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子魚曰：‘君未知戰，勍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猶有懼焉。且三軍以利用也，金鼓以聲氣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盛致志，鼓儻可也。’”
- ⑫ 《左傳》莊公十年：“齊師伐我，戰於長勺。公將鼓之。劄曰：‘未可。’齊人三鼓，劄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劄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
- ⑬ 《漢書》李陵傳：“陵將步卒五千，出居延，與單于連戰。陵曰：‘吾士氣少衰，而鼓不起者，何也？軍中豈有女子乎？’搜得皆劍斬之。”
- ⑭ 京口是江蘇丹徒。
- ⑮ 鞀念陶，是有柄的小鼓。
- ⑯ 金朝海陵正隆二年（一一五七）置登聞鼓院；元朝世祖至元十二年（一二五七）立登聞鼓；明朝十三道御史輪值登聞鼓；《大清會典》卷三十七說：“狀內事情必關軍國重務大貪大惡奇冤異慘，方許擊鼓”；又說：“設登聞鼓於都察院門首，每日輪流御史一員監值。”

一種失傳了的言論道具

中國歷史上是專制王朝，偶而也有網開幾面的時候，網開幾面有的見之於制度，有的見之於實物，這種實物，是網開的一種象徵，可叫做“言論道具”。因為本質上、實際上，這都是戲。既然是戲，配合它的，不是“道具”是什麼？

專制皇帝爲了廣開言路，第一種道具是“鼓”，包括“諫鼓”和“登聞鼓”，關於它們，我已寫在“鼓聲鼕鼕的中國之音”裡。這兒要寫的是另外一種，叫“誹謗之木”，或叫“謗木”。

“誹謗”兩個字，現在成了一種壞字眼，成了“刑法”第二十七章“妨害名譽及信用罪”的罪名，這真是對“誹謗”兩字的誹謗。

中國的許多名詞，像人一樣，都淪落了。“風流”本來是好字眼，後來淪爲壞字眼了；“烏龜”本來是好字眼，後來淪爲壞字眼了。“誹謗”也一樣。

《大戴禮》保傳裡說：

“忠諫者，謂之誹謗。”

可見誹謗的原始意義是“忠諫”，是好意義。專制皇帝爲了要臣子“忠諫”，設了一種“誹謗之木”，以廣招徠。看看古書吧——

《大戴禮》保傳：“有誹謗之木。”

《呂覽》自知：“舜有誹謗之木。”

《鄧析子》轉辭：“舜立誹謗之木。”

《史記》孝文紀：“古之治天下，朝有……誹謗之木。”

《漢書》文帝紀：“誹謗之木。”

《淮南子》主術訓：“舜立誹謗之木。”

《後漢書》楊震傳：“臣聞堯舜之世，諫鼓謗木，立之於朝。”

《晉書》元帝本紀：“太興元年六月戊戌，初置諫鼓謗木。”

太多了，不抄了。

“誹謗之木”什麼樣子，怎麼用呢？

照《呂覽》自知注中的說法是：

“欲諫者，擊其鼓也，書其過失以表木也。”

照《淮南子》主術訓注中的說法是：

“書其善否於華表木也。”

這表示使用的方法，是“書”寫。

但照梁武帝時候，任昉“天監三年策秀才文”，問“朕立諫鼓設謗木，於茲三年矣”那一段注，卻是：

“良曰：立鼓於朝，有欲諫君擊之；設謗木於闕，有誹

謗，使人擊之，武帝立之已三年。”

則使用的方法卻是“擊”敲。

歷史上記梁武帝蕭衍開國後，置謗木、設肺石，各附一函，說，若有在位莫言而下有欲言的，也就是布衣處士，欲陳清議的，可投謗木函中；有功勞才器，冤沉莫達的，也就是功臣材士，欲伸屈抑的，可投肺石函中。則使用的方法，既不是寫在木上，也不是敲在木上，而根本是朝“意見箱”投書了。

這樣看來，“誹謗之木”可能已在造型上一改再改，它的原始造型，應該是一塊木。

據《中華古今注》中“堯誹謗木”條下，有這樣的說明：

“程雅問曰：‘堯設誹謗之木，何也？’答曰：‘今之華木也。以橫木交柱頭，狀如華也。形如桔槔，大路交衢悉施焉。或謂之表木，以表王者納諫也。亦以表識衢路。秦乃除之，漢始復修焉。今西京謂之交午柱也。’”

“華”就是“花”，“狀如華”就是“狀如花”。桔槔是一直一橫，很像十字架，也像十字路口的路牌，所以說“大路交衢悉施焉。……以表識衢路。”這種路牌式的指向作用，是從“誹謗之木”變出來的。“誹謗之木”本來可能只是落地的一塊大木，後來升高了，放在柱子上，變成“以橫木交柱頭”，高到可望而不可即，高到只有容納忠言的象徵，卻不允許你進忠言了。更進一步，爲了粉飾，爲了壯觀，爲了宮門外面這個十字架不給瓊樓玉宇的宮門丟人，於是，皇家建築師的恩澤，也廣被於它，索性把它做成雕龍刻雲的擎天大柱。這種柱，叫做：“華表柱”；一直一橫的全套稱呼，叫做“華表”。華表不但立

在宮門口，也立在城門口，甚至專制皇帝死了，還要立在陵墓門口。在白居易的詩裡，可以看到

“江迴望見雙華表，
知是潯陽西郭門。”

在李遠的詩裡，可以看到

“華表柱頭留語後，
更無消息到如今。”

在鄭燮（板橋）的道情裡，可以看到

“豐碑是處成荒塚，
華表千尋卧碧苔。”

這些描寫，古書裡有得是。

宋朝范公偁《過庭錄》裡有一段故事說：

“元符庚辰，蔡京出，韓師璞當軸，下詔求言。其略曰：‘言之當者，朕有厚賞；言之不當，朕不加罪。朕言唯信，無慮後悔。’於是四海之士，莫不慷慨論蔡京之失。時忠宣在永州，聞之，驚曰：‘師璞果能辦此乎！’未久，京復相，舉言者竄嶺外，善類於是盡矣！”

這裡紀錄的皇帝的話，所謂“言之當者，朕有厚賞；言之不當，朕不加罪。”是中國傳統上設立“誹謗之木”的一番美意。只有“言之不當，朕不加罪”的大前提能保障，才有真話可言，這就是漢朝路溫舒說的“誹謗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否則大鳴大放一陣，結果卻“善類於是盡矣”！這種“不加罪”，是無條件的，不能先立下“要相忍爲安”“要動機純正”

“要善意批評”“要有建設性意見”等等條件。因為一有了這些條件，就沒有了真的言論，就失掉了“求言”的根本意義。

“誹謗”兩個字，從好字眼變到壞字眼，說不定正是唐堯皇帝的先知。唐堯設立“誹謗之木”的時候，也許清楚知道，真正的“求言”，必須做到放開度量，不惜讓人“誹謗”他，讓不安份的、不肯忍的份子，動機不純正的、惡意批評的、只有破壞性意見的，一齊朝他“誹謗”。然後，從大量“誹謗”中認識他自己、檢討他自己、顯示他自己。腓特烈大帝爲了鼓吹法治，甚至鼓勵人民去告他；傑佛遜總統爲了鼓吹民主，甚至縱容政敵去罵他；李敖先生爲了鼓吹言論自由，甚至開放“文星”示範，讓所有的混蛋去造謠中傷他。從鼓勵的角度看，從先知的角度看，唐堯選用了“誹謗”字眼留給後人去玩味，真太偉大了。中國人只注意到唐堯不肯家天下的禪讓遺澤，卻忽略了他在言論開放上留下的微妙遺愛。我小時候，經過天安門，望着那高聳入雲的華表，只覺得它美，不知道它的意義。現在，我“讀書破萬卷”，我懂了。我知道它是一種淪落了的象徵，一種失傳了的言論道具，它是中國的眼淚，中國人的十字架。

一九七九、五、十一。三小時寫成。

記一個不合作主義者

李二曲，生在一六二九年，死在一七〇五年，一生正當明末清初（明朝崇禎二年到清朝康熙四十四年），活了七十六歲。

李二曲名叫李顥，字中孚，別署“二曲土室病夫”。爲什麼叫這麼個怪名字呢？因爲他是陝西盩厔人，水曲叫盩，山曲叫厔，所以就變成二曲。

但他爲人，卻一點也不曲。

李二曲的父親叫李可從，身體很好，慷慨有大志，外號叫“李壯士”。李自成打到河南，一個叫孫兆祿的小官，約他一起去打李自成，他告訴了太太彭孺人，太太聽了，說：“吾向慮君無由爲人出死力、建奇功、立名當代，不意其有今日。急行，毋以妻子戀！”李可從拔了一顆牙，給太太做紀念，說：“倘相憶，顧此〔牙〕如見汝夫。”就騎馬走了。不久，在襄城出戰李自成，孫兆祿被打死在地上，李可從不知道，還騎馬趕過來救他，也同時被打死。

消息傳回來，太太要自殺，李二曲那時候十六歲，說：“母殉父固宜，然兒亦必殉母”，這樣一來，爸爸絕後了，於是，他母親停止殉情。母子兩人，帶着一顆牙，相依爲命，有

時候，窮得一連幾天沒飯吃。

李二曲上學，沒錢繳學費，老師都不收他。他母親氣起來，說：“無師遂可以不學耶？經書固在，亦何必師！”她不信邪，叫李二曲在家自己唸，李二曲終於自修成為大學者。

他三十六歲，母親死了，他把母親和父親的一顆牙埋在一起，守了三年喪後，四十一歲那年，徒步向河南出發，到襄城四周找他父親遺骨。當然找不到。但這種精神，感動了襄城的縣太爺張允中，縣太爺爲他父親立了烈士祠，又在舊戰場上蓋了一座招魂塚，以安慰他。

這時候，已是清朝康熙九年（一六七〇）的冬天了，明朝崇禎皇帝已殉國二十六年了，也就是說，清朝已經統治二十六年了。對這個他所不贊成的政權，李二曲始終不肯合作。當道的大官人禮賢下士，到他家裡拜訪他，他拒絕不掉，勉強見了一面，可是他不肯回拜，他說，他是老百姓，“庶人不可入公府也！”大官人再去拜訪他，他不肯見了。送他的“餽遺”，送了十次他也不收。有人問他是不是太無禮、太過分了？並暗示他不合孟子之道，勸他：“交道接禮，孟子不卻，先生得無已甚？”他卻回答說：“我輩自不能學孟子，即此一事，稍不守孟子家法，正自無害。”可見他雖然那麼過分的遵守傳統的孝道，卻在出處、去就、辭受的大節上，公然“不守孟子家法”。

有一次，他爲了一個人，同意了大官人到“關中講院”，還寫了“關中書院會約”一卷。很快的，他便後悔，認爲做錯了，“合六州鐵，不足鑄此錯也！”就趕緊不幹了。

可是，統治者對這樣一位大儒，自然不肯放過，自然千方百計徵召他，以隱逸薦他，前後十多次，糾纏不清；李二曲也

千方百計，辭徵回絕。他在拒絕的信裡，所用的詞句，因為格於環境，是很委曲的、很勉強的，例如他有一次回信給總督大人，說：

“僕少失學問，又無他技能，徒抱鰥魚之至痛，敢希和靖之芳蹤哉！古人學真行實，輕於一出，尚受謗於當時，困辱其身；況如僕者而使之應對殿廷！明公此舉，必當為我曲成；如必不獲所請，即當以死繼之，斷不惜此餘生，以為大曲之辱！”

這是軟中有硬的話，說得很謙虛，但是堅決的表示了他的消極抵抗。

在他的遺著裡，這種文字留下不少，他消極抵抗的理由，也層出不窮：

“顥幼孤失學，庸謬罔似，浮慕曩哲，浪招逐臭，誠所謂純盜虛聲，毫無實詣者也。前當事體朝廷，旁求盛懷，誤加物色，逐塵宸聽，蓋以顥或有微長，可充葑菲；而不知顥學不通古今，識不達世務，上之即不足以備顧問，次之又不足以任器使，儻不審己量力，冒膺榮命，不亦辱朝廷而羞天下士哉！”

這是以自己學問不夠做藉口，實行不合作主義。

“顥父喪時，遺顥隻身，再無次丁，母彭氏守寡，鞠顥艱難孤苦，蓋不啻出萬死而得一生。顥後雖成立，然無一椽寸土之產，三旬九食，衣不蔽形。顥母形影相弔，未嘗獲一日之溫飽，竟以是亡！亡之日，無以為殮，縣令駱公鍾麟聞而傷之，捐俸具棺，始可喪事；使爾時稍有意外之遇，顥當

如毛義捧檄，顯母之苦，豈遂如此其悽愴！顯風木之感，豈遂永抱於終天！今九原不可作矣！昔賢云：‘祭之豐，不如養之薄；殺牛而祭，不如鷄黍之逮親存。’顯每念及此，未嘗不涕泣自傷，不孝之罪，終身莫贖。今上方以孝治天下，豈可使不孝之人忝竊祿位耶？昔朱百年之母以冬月亡，亡時身無棉衣，遂終身不復衣棉；孫侔早孤，事母志於祿養未遂，及母病革，自誓決身不仕，後客江淮間，劉敞知揚州，特疏薦聞，不赴；既而沈邁、王陶、韓維連薦之，終不赴，時當亦憐其情而曲全之，史策至今傳爲美談。顯雖無二子之孝，而心則二子之心，今日之事，顯母既不及見，顯亦何忍遠離墳墓，獨冒其榮？”

這是以自己母親做藉口，實行不合作主義。

“先儒謂士人辭受出處，非獨一身之事，乃關風俗盛衰，故尤不可以不慎也。今既以顯爲隱逸矣，若以隱而叨榮，則美官要職，可以隱而坐致也。聞天下以飾僞之端，必將外假高尚之名，內濟梯榮之實，人人爭以爲終南捷徑矣。顯雅不忍以身作俑，使風俗由顯而壞。”

這是以不能用隱居干祿做藉口，實行不合作主義。

“方今高賢大儒，濟濟盈廷，亦何須顯一人而使之內違素心，外滋罪戾，恐非所以保全之也。況自古聖帝明王，莫不嘉幽隱、獎恬退，故堯舜之於巢許，湯武之於隨光，西漢之於四皓，東漢之於嚴光，及周黨徐穉，及至宋之陳搏邵雍林逋魏野翁，元之許謙劉因杜本蕭剡，皆安車蒲輪，屢徵不起，從而褒之，以端風化。蓋以其道雖未宏，志不可奪，足

以立懦夫之骨，息貪競之風，所謂以無用爲用，乃激勵廉恥之大機。顛昏愚庸陋，懿修固不敢望古人，而絕跡紛華，亦不敢自外於古人；若隱居復出，是負朝廷之深知，翻辱闡幽之盛典，其爲罪豈不大哉！”

這是以中國有讓人隱居傳統做藉口，實行不合作主義。

但是，清朝政府是不願就此罷休的，還是跟他糾纏不休。不但跟他糾纏不休，也跟其他第一流知識份子糾纏不休。孔尚任《桃花扇》裡，寫皂隸入山，“訪拿”山林隱逸，用皂隸的口吻說：“大澤深山隨處找，預備官家要，抽出綠頭籤，取開紅圈票，把幾個白衣山人嚇走了。”正好寫盡了當時不合作主義者的困境。

有一次，大官人特備車馬，接他去見皇上，他不肯去，躺在牀上裝病。大官人叫人抬他的牀，一起出發，李二曲氣得不吃飯，相持了六天，最後逼得他要拿刀自殺，大官人才算死心，放棄送他去“召見”。

李二曲死前那一年，康熙皇帝西巡，想見見他。他死也不肯，又裝病，叫他兒子李慎言代表，送了皇帝幾本自己的書，潦表不傷和氣。康熙皇帝懶得再跟這個七十五歲的老頭子糾纏，寫了“關中大儒”四個字送給他。

大官人看到御筆題字，又逼他寫謝表，李二曲說他不會做“廟堂文字”，大官人說不寫會失禮，不行，逼他寫。他故意寫了一篇像鄉下人寫的作文敷衍，大官人看了，不敢往上呈，不了了之了。

李二曲晚年閉戶不出，不見客。四方之士老遠跑來看他，都吃了閉門羹。有見識的高人，了解他爲什麼這樣做；不識大

體的俗人，自會罵他“懦種”。俗人當然不了解李二曲的大勇、李二曲的遠見、李二曲的決絕、和李二曲在淫威之下辛苦抱持的不合作主義。

一九七九、五、十八。

中國這個龐然大物，還在霧裏。

做為一個中國人，要想了解中國，簡直沒有合適的書看。
中國沒能被了解——全盤的了解。中國被誤解了。中國被
瞎子摸象。

寫這本書的目的，是幫助中國人了解中國，幫助非中國人
——洋鬼子、東洋鬼子、假洋鬼子——別再誤解中國。

——李敖



聯合出版集團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HK\$48.00

ISBN 962-04-1891-3



9 789620 418914